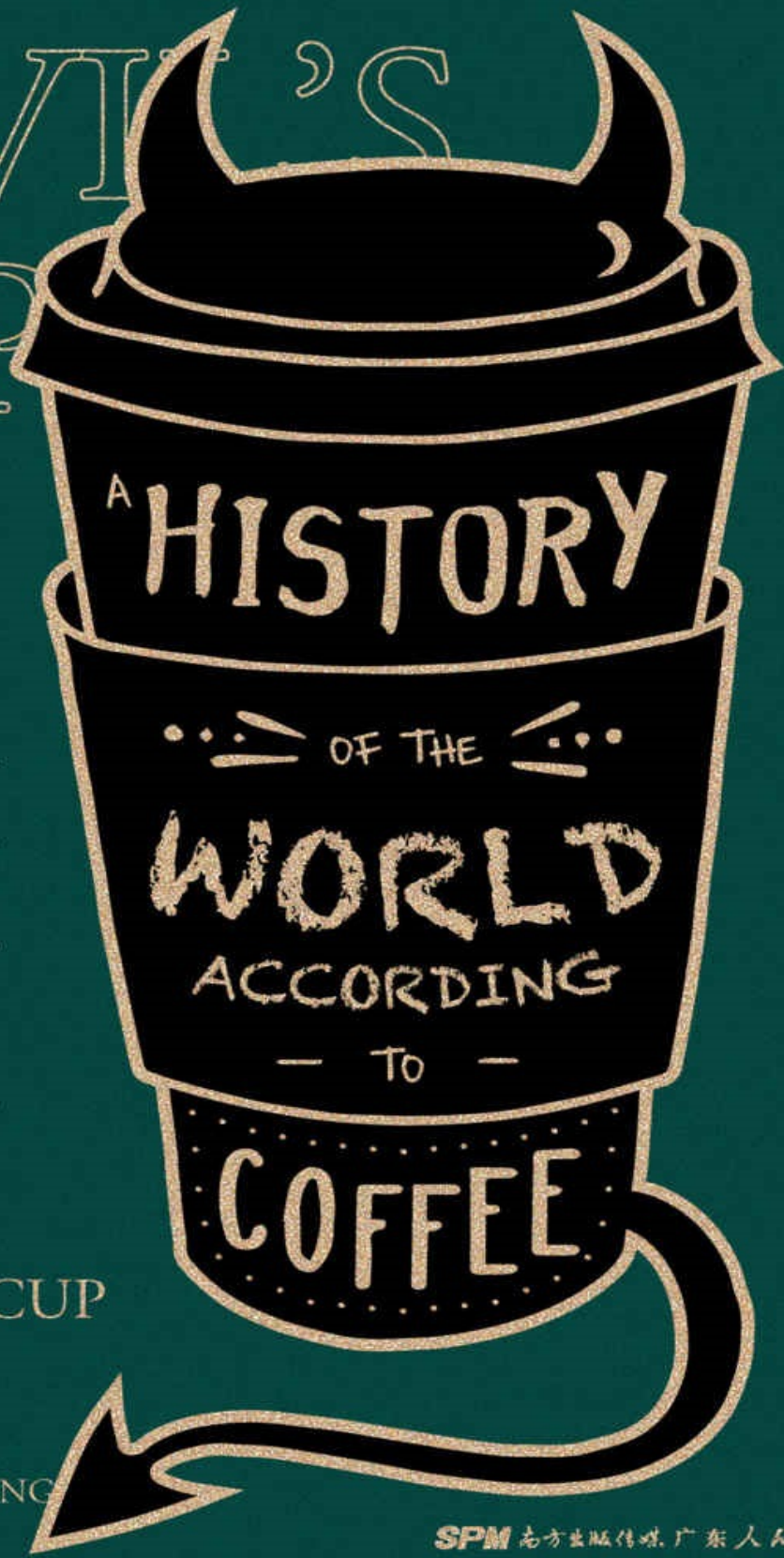


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

走遍 $\frac{3}{4}$ 个世界 | 啜饮2920公升咖啡
探索咖啡浪漫史的奇妙旅程

THE DEVIL'S CUP



「美」斯图尔德·李·艾伦 Stewart Lee Allen

著 简瑞宏

译

咖啡 一场穿越800年的 冒险

咖啡 瘾史

ETHIOPIA

EUROPE

THE DEVIL'S CUP

A HISTORY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OFFEE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目录

- [推荐序一 小小咖啡豆，魔力无边](#)
- [推荐序二 一场追寻咖啡的冒险之旅](#)
- [导言 第一杯咖啡](#)
- [01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源头](#)
- [02 咖啡的祈祷](#)
- [03 也门的古老咖啡港](#)
- [04 咖啡与卡特草](#)
- [05 也门咖啡](#)
- [06 咖啡在印度](#)
- [07 守信用的骗子](#)
- [08 土耳其咖啡帝国](#)
- [09 战争与咖啡的传播](#)
- [10 欧洲革命运动的推手](#)
- [11 巴黎咖啡馆](#)
- [12 咖啡与新世界的相遇](#)
- [13 航向巴西圣多斯](#)
- [14 巴西奴隶王国](#)
- [15 非洲老奴隶的幽灵](#)
- [16 咖啡上瘾之国：美国](#)
- [17 尾声](#)
- [致谢](#)

书名：咖啡瘾史：一场穿越800年的咖啡冒险

作者：（美）斯图尔德·李·艾伦

译者：简瑞宏

出版方：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ISBN：978-7-218-12779-8

The Devil's Cup: A History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Coffee by Stewart Lee Allen Copyright . 1999 by Stewart Lee Allen By agreement with Felicia Eth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rough Inbooker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 Ltd.

本书中文译稿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同意经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转载。

KAFEI YINSHI: YICHANG CHUANYUE 800 NIAN DE KAFEI
MAOXIAN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推荐序一 小小咖啡豆，魔力无边

这是一本寓教于乐，探索咖啡趣史的壮游记，作者斯图尔德·李·艾伦是重度咖啡嗜者，也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作家兼咖啡冒险家。

19世纪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将西方文明的启蒙归功于欧洲从烂醉如泥的酒鬼国度成功转型为喝咖啡的理性社会：“文艺复兴抒发的新思潮，部分归因于一件足以养成新生活习惯，甚至改变民众气质的大事件，那就是咖啡的出现。”作者为了证实此论点，不惜自掏腰包，上穷碧落下黄泉，从香醇的源头——阿拉比卡的原生地埃塞俄比亚起程，走访 3/4 个世界，探索咖啡真理。

有文献记载的世界咖啡史，滥觞于 15 世纪的阿拉伯世界，距今不过短短七八百年，却也波澜壮阔，血泪斑斑，堪称一部欧洲列强侵略史。而阿拉比卡咖啡树的传播路径，从旧世界的埃塞俄比亚和也门，传播到新世界的印度、印尼和拉丁美洲，恰好与殖民帝国的扩张足迹不谋而合，直到 1714~1720 年以后，荷兰人和法国海军军官德·克利才将咖啡树引进加勒比海诸岛与中南美洲，一举打破伊斯兰教世界（也门与奥斯曼帝国）垄断咖啡产销数百年的局面。

换句话说，目前阿拉比卡产量最大的中南美洲，在 18 世纪初叶以前，并没有半株咖啡树。荷兰、法国、葡萄牙等殖民帝国洞悉了咖啡黑金的庞大商机，在扩张属地的同时，也引进非洲黑奴到亚洲和拉丁美洲种咖啡，堪称无本生意——因为土地与苦力全是武力掠夺而来。但咖啡因与咖啡馆确实有助于欧洲人开智与排便，摆脱酗酒、便秘的生活形态。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志士在攻陷巴士底狱前，就是在咖啡馆誓师，而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军事家拿破仑、作曲家贝多芬等历史名人，也都是咖啡因的受益者。

作者寻找咖啡真理的壮游，大致也是依循此路线探秘探险。虽然 15 世纪以前是咖啡的“史前时代”，并无文献可考，但据史学家考证，最早的咖啡不是喝的，而是通过嚼食咖啡果子与叶片，获取提神物。居住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卡法（Kaffa）森林的奥罗摩族（Oromo，俗称盖拉族）是最早利用咖啡因的勇士，有嚼食咖啡果提神的习惯。他们甚至将咖啡果捣碎，混以油脂，揉成圆球，是征战或打家劫舍前必吃的“铁粮”。

卡法森林随处可见野生咖啡，不但是阿拉比卡原产区，也是咖啡基因庞杂度最高的地区，因此语言学家认为“咖啡”的语音源自卡法。但另有学者认为咖啡语音源自阿拉伯语“美酒”（qahwa），这两字的读音近似咖啡。

作者也来到埃塞俄比亚东部古城哈拉进行考察。这里盛产“长身豆”，也是阿拉比卡传进也门的跳板。原来奥罗摩族人与其他部族战争失利被俘后，被辗转从哈拉古城运到也门做奴隶，进而将随身的提神圣品咖啡果子带到阿拉伯半岛，点燃了咖啡浪漫史。

有趣的是，作者发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古音不是“Kaffa”，更不是“qahwa”，而是“布纳”（buna），“咖啡是我们的面包”，埃塞俄比亚语音为：“Bunadabo naw”。万万没想到，咖啡原产地埃塞俄比亚的咖啡发音，竟会和学者所界定的字源不同，又为浪漫咖啡史增添一页趣闻。另外，法国 19 世纪诗坛神童兰波弃文从商，远赴哈拉买卖咖啡，作者也亲访兰波的哈拉故居。由于发音问题，他误以为当地人要带他去看“兰博”电影，令人莞尔。

咖啡从旧世界传入新世界的过程，充满了尔虞我诈，美人计、美男计，无所不用其极。“催生公”德·克利的汪洋历险记太传奇了，作者怀疑是否真有此号人物，亲自杀到法国西北部的迪普尔（Dieppe），居然找到了德·克利的曾曾曾……孙女凯萨琳·伯内·科泰勒，证实德·克利当年以美人计智取凡尔赛宫暖房里的咖啡幼苗，千里迢迢护送到加勒比海马丁尼克岛的事迹，千真万确。

作者也来到维也纳，探索 1683 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王穆拉德四世（Murad IV）攻打维也纳的传奇故事。当年乔装出城，顺利打探土耳其军情的间谍法兰兹·哥辛斯基（Franz Kolschitzky）为维也纳立下大功，但他不要金钱奖赏，只要土耳其军队留下的咖啡豆，并开设蓝瓶之屋咖啡馆，发明了过滤式咖啡加牛奶的新喝法，点燃了欧陆咖啡的热潮，不同于伊斯兰教徒喝咖啡不过滤、不添奶的传统味道。后人尊奉哥辛斯基为拿铁和卡布奇诺的先驱。

最后，作者回到美国，探讨南北战争中联邦政府的北军最后获胜的重要原因，竟然是北军掌控各大港口，以提神的咖啡为军粮，让士兵作战更卖力，一举击溃无咖啡可喝的南军！作者更指出，咖啡因从第一次大战以来就是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武器。

有文字记载的咖啡历史虽只有短短几百年，但小小咖啡豆，魔力无边，让世人为之疯狂，更衍生出许多奇风异俗，值得玩味。多了咖啡趣史调味的咖啡，喝来千香万味，更为甜美！

韩怀宗

“咖啡学系列”作者

推荐序二 一场追寻咖啡的冒险之旅

每一杯咖啡背后，都存在着 9999 个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让我们喝到的赤赭之水更显芳醇。《咖啡瘾史》这本书，引人入胜地带领我们找回了失落的历史桥段。

作者斯图尔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咖啡探险家，为了穷究一杯咖啡的历史演化，亲身寻觅，造访咖啡流传的路径，这对所有的咖啡人来说都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他就像帮助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将他路途中的艰辛与收获点点滴滴地分享给爱好咖啡的人。

从非洲到亚洲，再到欧洲和北美，斯图尔德坐着火车、帆船、人力车，或者骑着骡子，穿越边界禁地与危险区域，参与使用咖啡的传统仪式，经过昔日奴隶走过的路线。在伊斯坦布尔小巷，在维也纳、伦敦与巴黎咖啡馆，都有他的足迹。在异国不同地方的亲身见证，让这场旅行充满了奇趣、冒险和刺激。就像我曾经在非洲布隆迪担任卓越杯评委，当时遇到该国政治动乱，机枪流弹就在我们的杯测场外扫射。以后每每品尝美味的布隆迪咖啡时，我都会回忆起这件往事，颇具别样心情。

在旅途中，斯图尔德从无数相关的人和地点那里，挖掘出了咖啡背后隐藏着的历史碎片，让沉没在时间中的真实片段一一复活，仿佛触手可及。读着书中的文字，似乎喝咖啡时都会想起苏非派的旋转舞画面，或是维也纳公主带给法国的新月型面包——可颂，让所有吃着它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了讽刺土耳其惨败历史的见证人。

让我更喜欢的，是书中提到的一些奇闻轶事。每天都喝咖啡的我们不会知道，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妇女的丈夫如果提供的咖啡豆不够多，她是可以提出跟他离婚的。我们更不会知道，埃及和土耳其都会将龙涎香加入咖啡，以起到催情作用。具体的做法是：“先将一克拉龙涎香放在咖啡壶里，然后放在火炉上融化，再用另一个咖啡壶煮咖啡。要喝的人可以放一些在咖啡杯里，再将煮好的咖啡冲进去。”斯图尔德更在书中介绍了一些对咖啡的新鲜看法，比如作者在和德国《南德日报》总编辑乔菲讨论咖啡的社会文化意义时，乔菲说到：“不好的咖啡就等

于扩张主义、帝国主义与战争；好的咖啡则象征文明、反战主义与懒散。”让人从另一个角度更新了对咖啡的认知。

我也曾经如同斯图尔德一样，走访云南、印尼、非洲和中南美洲各国咖啡产地。对所有热爱咖啡的人来说，不会畏惧穷乡僻壤，只为了追寻到美味的咖啡，让受到创造力局限的人们解放想象力，让生活贫困的咖农们能够有安居乐业时刻，更让咖啡带给人们勇气，改变自己的生命。所以读到这本书，让我有了强烈的共鸣。

在众多关于咖啡的书里，《咖啡瘾史》的视角最为独特。我推荐这本书给所有喜爱咖啡的人，深入了解这些故事和历史，让我们的咖啡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江承哲

折石咖啡创办人，首届世界咖啡烘焙大赛亚军，国际咖啡评委

导言 第一杯咖啡

煮咖啡像在制作一件艺术品，所以也要以艺术的形式品尝。

——阿卜杜·卡迪尔（Abd el Kader），16世纪

奈洛比，肯尼亚，1988年

“埃塞俄比亚最棒了！”比尔的眼睛为之一亮。

“非洲的佳肴当然非埃塞俄比亚莫属了，而埃塞俄比亚的女孩更不必说了……”

“不要再提那些女孩了！”我说。

比尔是伦敦的铅管工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最大的兴趣就是赶快为我找女友。他很积极，却没有原则。上回因他的关系，我还得想办法赶走一位体型大我两倍的肯尼亚性工作者，当时她不断叫嚷：“我已准备迎接你的爱情了！”

“不准再帮我凑合了！”我一再重申。想起上次的惨痛经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你不用再费心了。”

“你又不一定要真的跟她们在一起，”他对我使个眼色，“但我想你会的。”

“我打包票，绝对不会。”

“还有他们的布纳¹，哇！他们的‘布纳’是全世界最高级的！”

“布纳？是什么东西？”

“就是咖啡呀！”他回答，“产自埃塞俄比亚呀！”

○

我们决定到埃塞俄比亚吃午餐。肯尼亚北部的公路几乎看不到公交车，我们只好搭便车。幸运地，我们搭上了一辆载满汽水的塔塔卡车。一路上映入眼帘的是荒凉的景象，约20小时的路程只见被烈日烤得焦黑的石头和一大片枯萎杂草，唯一可见的文明遗迹是一辆被子弹射穿的报废公交车。

我们不担心抢匪，因为车上有两位手持武器的卫兵。约七小时车程后，我们看到早上没能搭上的一辆卡车。可能是因为道路颠簸不平，卡车的车轴断裂，造成了车祸，车身断成两截，司机与半数乘客丧命。逃过一劫的生还者，是身穿传统红袍、身高超过七英尺的马赛武士。这些武士的耳垂因穿耳洞而拉得很长，他们每个人都在哭泣，激动地向天空挥舞长矛，因为有个同伴惨死在一堆破碎的百事可乐瓶罐之下。

我们抵达埃塞俄比亚之后，边境却不通了。在边境看守的唯一的卫兵很和善，却坚持不让我们通过边境——依规定，外国人不准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比尔向他解释，我们并不是要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只是想探访莫亚莱（Moyale）的小村庄，这村子刚好有半边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

“应该没违法吧！”比尔向卫兵据理力争。

卫兵想了一下回答：“没错，外国人确实可以在白天到莫亚莱观光。”但他又摇摇头说，“可是星期日不行！”他提醒我们，埃塞俄比亚是基督教国家。

比尔不想放弃，又问：“莫亚莱有没有埃塞俄比亚旅客接待所呢？”

“当然有，”卫兵回答，“你们想去吗？”

“啊——呜——”比尔用埃塞俄比亚的语气音，慎重地向卫兵表示非常想去。

“那没问题，”卫兵说，“你只要往前一直走，然后左转就到了。”

政府经营的旅馆收费很高，我们找了当地的小旅馆——应该说是用泥巴

涂地板、以干草为屋顶的小木屋。但是餐厅的料理确实美味，有奶油辣鸡煲、发酵过的薄饼与蜜酒。餐后当然是一杯香浓的咖啡。

当欧洲人早餐还在喝啤酒时，埃塞俄比亚人已经在喝咖啡了。几百年前，埃塞俄比亚已有分享咖啡的仪式。他们把青绿的咖啡豆放在桌上用火烤，主人会将还在冒烟的咖啡豆传给在场人士，让大家分享浓烈的咖啡香味，并以祝福或歌唱的方式颂扬友情，然后在灰泥上用石头将咖啡豆磨成粉末，煮成咖啡。

这一天，旅馆女主人以这种分享仪式煮咖啡请我们喝。之前我曾看过这种煮咖啡的方式，但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让人回味无穷。女主人是典型的埃塞俄比亚村妇，身材匀称、优雅且美艳动人。她身穿橘紫色相间的围裙，在微暗而罗曼蒂克的小屋，将有姜汁和草香味的鲜浓咖啡倒进没有手把的小型陶制咖啡杯，风味绝佳。

整个仪式有时会花一个钟头，依据这个仪式的不成文规定，每个人都必须喝三杯咖啡，因为一、二、三代表友谊。很可惜，女主人的咖啡豆只够我们各煮一杯。“明天再来！”她对我们说，明天一定会有更多的咖啡豆。眼看傍晚戒严时刻就快到了，我们只得尽快赶回肯尼亚边境。

但第二天，站岗的卫兵怎么说也不让我们回埃塞俄比亚了。我们在边境僵持了好几个小时，无论讲理或贿赂，都无法动摇卫兵的决定。于是我们始终得不到承诺的第二杯咖啡。

接下来的十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垮台，无数百姓因饥荒丧命，内战连连导致国家瓦解分裂。这段时期，我的人生也是一片混乱。我待过四大洲的11个城市，也曾一年内搬过五次家。我之所以能忍受这种波折，是因为相信自己会在35岁放下一切，恢复我的浪迹生涯。

那是一条不归路，也像我们所常说的“出去散散心”。其实这也是被动式的寻死吧！如果我是佛教徒，或许会说是期待“忘我”的境界。随便怎么说吧！尽管如此，我却不小心陷入情网，竟然跑到澳洲结婚（又是另一种找死的方法），这场婚姻也证实了我的愚蠢。在这里不多做解释了，反正结果是我被送到了特蕾莎修女在印度加尔各答创立的病患收容所。

○

我认为加尔各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那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傲慢、慈悲、聪慧以及贪婪混合在一起的城市，而且24小时不断地发生在你眼前。

有一次，我坐公交车时目睹车外一位女士因为饥饿而不支倒地，当时对街有群孩子欢天喜地地玩着槌球，没有人注意到她；在这之前，我还看到不远处有位女士脖子以下浸泡在泥池里，对着太阳诚心祷告。此外，这个城市也是藏书家的天堂。我就是在这里无数的书摊中找到了一份很奇特的手稿，印在上头的文字已难辨识，写法像是古老的次大陆式英文。我不晓得书名是什么，因为书皮早已朽烂。我想，一定是半疯癫的印度激昂论著，分析西方的营养不均衡是如何导致极度活跃的破坏地球的反社会人士诞生。

书中的文字都在痛批肉食者（印度人是素食者）和屠牛者（因为对印度人来说，牛是神圣的动物）。书中有一句话令我叹息：“来自非洲的邪恶黑豆。”它的大意是：

我想请问读者，那些黑皮肤的野蛮人在祭神的动物牺牲前吃下咖啡豆，你们不觉得很古怪吗？其实只要比较一下爱喝咖啡的西方暴力民族和爱饮茶的东方和平族群，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苦涩的咖啡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害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

在加州有许多人和印度人一样，相信吃什么样的食物就会长成什么样的人。但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越南找到一本法文书籍，那本书里有一段对比强烈的描述，书名叫作《我的札记》（*Mon Journal*），作者是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他是社会评论家兼历史学家。书中，他将西方社会的文明启蒙归因于欧洲人喝咖啡，他说：“文艺复兴抒发的新思潮，部分归因于一件足以养成新生活习惯，甚至改变民众气质的大事件，那就是咖啡的出现。”

我不禁想：真不愧是法式作风，将西方文明的诞生归功于一杯浓缩咖啡。但米什莱的见解与现代科学确实有相同之处，也就是某些食物确实曾经默默影响着历史的变化。有研究人种心理学的专家最近发表论文指出：某些特定的蘑菇或蕈类确实有改变脑部功能的成分，还有许多报道显示，玛雅人描述的“祭祀用美洲虎”，实际上就是祭司在准备迷幻药时所使用的青蛙。最近的研究发现，埃及法老的神圣紫罗兰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有毒（有使人迷幻的作用）。这些食物都是让人上瘾的麻药，而咖啡就是其中一种。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咖啡上瘾者。

或许真的给米什莱说中了。欧洲人到底是从什么时期开始喝咖啡的？咖啡代替了什么饮料？这我一概不知。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探索了全世界 3/4 的土地，全程近两万英里。我坐火车、帆船、人力车、货船或骑骡子。然而，我在写作本书时还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些记录。有时，我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受咖啡因影响的瘾君子乱写的东西；其他时候，它又像是可信度很高的研究。当时我知道，如果要证实米什莱提出的论点，就必须到 2000 年前发现咖啡的所在地，到那个我等十年才可以回去的国家。

我想，现在该是回埃塞俄比亚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了。

[1](#) 布纳，是埃塞俄比亚语的咖啡古音，原产于西南部的卡法森林。

01 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源头

喝完第一杯、第二杯与第三杯之后，我们就是永远的朋友。

——亚的斯亚贝巴的骗子艺术家

寻访兰波豪宅

“你喜欢兰博¹吗？”问我话的是一位瘦小的阿拉伯人，他蹲在白色土墙的阴影下，有敏锐的眼神、稀疏的胡子，头上裹着白色印度头巾。实在看不出他是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影迷。

“兰博？”我不肯定地重复。

他点点头：“没错，是兰博。”他抖了一下肮脏的围巾，把衣角从地上擦起来。“兰博。”他又讲了一次，但无精打采，好像很无趣的样子。

“你是兰博迷？”我感到讶异，因为查尔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在那里比较有名。我伸展了一下手臂，想问清楚他的意思：“你真的喜欢？”

他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看着我：“兰——博，”他固执地再说了一次，“兰博、兰博，”并问我，“你喜欢吗？”

“不喜欢！”我边说边走开，“我不喜欢！”

我刚抵达哈拉（Harrar），这是坐落在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偏僻小镇。经过辛苦而漫长的24小时火车旅程，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到哈拉，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小镇。哈拉弯曲的小巷不但车少，扒手也少，不像亚的斯亚贝巴到处是小偷，像挥不去的苍蝇。有一晚，我从亚的斯亚贝巴的居所外出，参加“友谊的咖啡仪式”后差点遭抢。

我喜欢哈拉的阿拉伯风味，白漆土墙的建筑，还有女孩身穿五颜六色的非洲吉卜赛围裙。看来只有“兰博迷”男子想向我捞点钱，但他却不像大坏蛋。

我走进一间舒适的咖啡厅，选择在有树荫的位置坐下。这家咖啡厅使用旧式咖啡机，煮好深黑色咖啡后再用小杯端给客人。这种咖啡的味道浓烈得令人吃惊。我想应该是埃塞俄比亚特殊的咖啡豆煎烤法产生的焦味。哈拉的咖啡豆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排名只在牙买加和也门之后，可是哈拉的咖啡豆风味很特别……我猜是当地的咖啡豆与扎伊尔（Zaire）的罗布斯塔（Robusta）咖啡豆混合²，才会喝完第一杯就有兴奋感。

我再点第二杯咖啡时，那位“兰波迷”在对街盯着我，我们对看一眼，他耸耸肩，摆出要带路的手势，我则皱一下眉头。

哈拉是非洲唯一有自己传说的古老城镇，曾因一位伊斯兰圣人的预言而对外封闭几百年。那个预言说，哈拉会因为非穆斯林人的进入而崩溃瓦解。封城期间，想进入的基督徒会遭断头，非洲商人也被禁在门外，他们的命运则由当地的狮子摆布。其实当时的哈拉城没有好到哪里，路上到处是猎狗在啃咬无家可归的人民，巫术与贩卖奴隶的风气非常兴盛，尤其是将阉割的黑人男孩卖给土耳其妻妾，作为她们的奴仆。到了 19 世纪，这座封闭的城市由于与世隔绝太久了，因而产生了与外面不同的语言，到现在当地人还在使用。

这些传奇轶事曾吸引欧洲最勇猛的冒险家到哈拉一探究竟，有些人成功闯入，也有许多人失败，直到理查德·伯顿爵士（Sir Richard Burton，发现尼罗河源头的英国人）在 1855 年乔装成阿拉伯人，随人群混入城里，哈拉城才就此瓦解。

让人印象深刻的早期西方访客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兰波到巴黎时只有 17 岁，经过一年追求感官刺激的生活之后，他被称为城里最颓废的人。19 岁时，他完成了杰作《地狱一季》（A Season in Hell）；20 岁时，他已经写下了想表达的全部感情，之后就封笔不再写诗，神秘消失了。这个兰波呀……

“兰波！”我大叫一声，从座位上跳起来。原来那家伙指的是兰波（英文读音是兰波没错），他想要带我去兰波的豪宅。这位天才诗人放弃写诗之后，其实没有真正消失，他只是突然苏醒过来，成为了哈拉城的咖啡商人。此时，那个“兰波迷”男子却已经消失无踪。

兰波会到埃塞俄比亚，不只是为了要进入买卖咖啡的行列，事实上他也想亲身体会《地狱一季》里的一段叙述。他在书中预言自己会到一个并不存在的气候地带，回来后会“有钢铁般坚硬的肢体、古铜色皮肤，以及类似疯狗的凶恶眼睛”。他真正想要的是冒险、刺激，还有金钱，他在哈拉已得到前两样。当时，哈拉族长已被罢黜 20 年了，社会上弥漫着紧张的情势，法国商人需要一位能够为了一颗咖啡豆而牺牲性命的疯狂人物（虽然当时报酬高达每磅 100 美元，还是少有人愿意涉足这项生意）。兰波正是他们想要找的人。

哈拉生产的那种长条形咖啡豆之所以重要，并不只因为气味香浓。有很

多人认为，看似不起眼的罗布斯塔豆，就是在这里升级为进化后的“阿拉比卡豆”，这就是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哈拉的豆子突然冒出头的原因。如果想了解这个重要性，就要先知道这里的咖啡豆的两个种类：一种是来自东非、甘美香浓的阿拉比卡豆，这种咖啡豆生产于海拔较高的地区；另外一种是被视为无物，来自扎伊尔的罗布斯塔豆，这种咖啡豆到处都有生产。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文明之前，还没有发现咖啡因的神秘时代。

大约在1500~3000年前，世界上第一个将咖啡当做食品的族群奥罗摩人，就住在古老的柯法（Kefa）王国³。当时奥罗摩人不喝咖啡，而是吃，有人还将咖啡豆与油脂混合，磨成高尔夫球大小的点心食用。他们喜欢在与邦加人（Bonga）作战前含着这种咖啡球以增加注意力，因为他们几乎每次都被邦加人打败。当时的邦加人最会贩卖奴隶，每年将7000多个奴隶送往哈拉城的阿拉伯市场贩卖。部分不幸的奴隶是被他们俘获的奥罗摩战士。而第一批将咖啡豆带进哈拉城的，就是这些咀嚼着咖啡豆的奥罗摩俘虏。即使现在，埃塞俄比亚巡逻队员仍说古老道路上的树木，就是当时被俘虏的战士吐出的咖啡籽长出的咖啡树。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地区生产的咖啡豆不相同。较低海拔的柯法咖啡豆生长在大树林里，外形像短胖的罗布斯塔豆。罗布斯塔豆可能早在几千年前就产于扎伊尔王国的森林里，而哈拉的咖啡豆呈长条状，有阿拉比卡咖啡豆的美味。也许为了适应哈拉的高原地形，它们自然地产生了神奇变化，但没有人可以确定到底是什么变化，但我们应该庆幸，被带到也门之后又散播到全世界的咖啡豆，是进化后的阿拉比卡咖啡豆。

兰波为何会为了咖啡豆而冒生命危险，甚至牺牲性命，就不难理解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兰波这位诗人兼商人并不很喜爱咖啡。在某一封信中，他曾形容咖啡是“恐怖”、“低劣”，令人“恶心”的东西。这或许是因为他长年饮用苦艾酒造成味觉迟钝，也或许是因为当地人卖咖啡豆时常会沾到山羊粪便。

○

我喝了几杯浓咖啡后找到一家旅馆订好房间，然后出发寻找兰波的豪宅。哈拉城的人口约两万人，曲折小径排列着倾斜的清真寺和小土屋，城里没有路标，但兰波的住宅是城里最容易找到的房子，因为只要外地人来到这里，便很容易被当地“导游”坑一大笔钱。我不打算找人带路找这栋豪宅。首先，我选了一条最隐秘的小路，在没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来

到兰波居住的地区，但它却是死胡同。

我看不到人影，于是小心地喊一声。

“这边！”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我从墙壁窟窿伸出头，看到那个“兰波迷”男子蹲在小石堆上。

“啊哈！”他叫嚷，“你终于来了！”

他就在一栋我看过的最奇特的房子前，跟哈拉城内其他一层楼高的小土屋比起来显得很特别。它是一栋三层高的房屋，有两个西式的尖形屋顶，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屋瓦装饰着鸢尾花，玻璃窗则为鲜艳的红色玻璃，看起来就像格林童话里的房子。令人奇怪的是，这栋楼房却被另一面 12英尺高的土墙围绕着，中间没有开口，只有刚才我爬进来的墙壁窟窿。

那男子惊讶地看着我：“你没有导游？”

“导游？我要导游做什么？”

“没关系。”他取出一张黄色纸在我面前挥动，向我索要10比拉。

“这是什么？”我问他。

“是票。”

“票？是真的吗？”

“你看看！”他似乎受到了侮辱。那张纸写着“票——兰波——10比拉”。“你看，这是真的兰波豪宅。是政府的，而不像其他的。”

“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兰波豪宅？”

“没有。只有这么一个。”

于是我付了钱，他带我爬上室内狭窄的楼梯，进入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约有 3000平方英尺。这个大厅约 50英尺高，围绕着大厅的是一座古老的椭圆形露台。墙上装饰着手绘的图画，但已经又老又旧，几乎看

不清图画中的巴黎庭园与徽章。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大厅里一组家具也没有。

这位伟大的诗人晚年就住在这个超豪华的别墅，除了他最喜欢的男侍，别无他人。他不再写诗，信中充满抱怨，包括孤独、疾病，以及钱财的问题，还提到他曾经将枪支与奴隶献给埃塞俄比亚国王却失败的经验。他从非洲回来时，没有如自己预言的“钢铁般坚硬的肢体……凶恶的眼睛”，而是一身病痛、穷困潦倒地回到法国。他的左腿被截肢，不久就死于不知名的传染病。

我随处走走，从露台往下看，摸摸墙壁。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没人住，却发现身穿破衣的小男孩跟在后头，直到我开口说话，他才快速溜走。此时，残破的墙边传来鸽子在巢中的叫声。

我正要离开时，“兰波迷”突然问我是否要见兰波的子孙。

“他有个女儿，”他说，“是兰波的女儿。”

“兰波有孩子？”我问。

“有，他有很多女儿。个个都非常漂亮……而且很年轻。”他问我，“你不想要兰波的女儿吗？”

跟阿蒂尔·兰波的混血女人共度良宵，一定是个精彩的故事。她一定很美丽，如同这里的女人一样，而且会很骄傲自大，因为她是埃塞俄比亚与法国的混血。的确很诱人，可是兰波不就是得了哈拉的传染病而过世的吗？我当场谢绝了。

“不要在市场烘焙你的咖啡豆（不要把秘密告诉陌生人）。 ”

——奥罗摩流浪者谚语

我在寻找土狼族人时认识了阿伯拉·铁雄。土狼族人时常拿吃剩的食物喂食每晚聚集在哈拉城外的土狼，这种做法起初是为了防止凶猛的野兽跑进城攻击人，今天这个习俗反而变成了很有吸引力的观光点。当然，

看那些穿着破旧衣服的人把吃剩的食物丢给土狼抢食的风景，还是比不上迪士尼乐园。阿伯拉是左腿残废的年轻人，他是带我去看土狼的导游，我们一起喝啤酒时，他问我为什么到哈拉。

“很少人会来这里观光。”他说。

“我知道。我是为了研究咖啡起源而来。”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你不是说，你以前是读农业的学生？你对咖啡的来源了解多少？”

他反问我：“你知道卡狄（Kaldi）与跳舞的山羊的故事吗？”

“当然知道！”我回答。

这是关于咖啡的小小传说。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一个叫卡狄的埃塞俄比亚牧羊人，看到他最好的一只羊突然疯了似地乱跳，好像是吃了某种植物果实才这样。卡狄也尝了那个果实，不久也开始不停地跳啊跳。这时，一位传教士经过，问卡狄为何和山羊跳舞，卡狄解释后，传教士也摘了果实回去，吃了就无法入眠。这位传教士经常要通宵做礼拜，他的学徒因此常昏昏欲睡，所以他命令所有学徒与伊斯兰教托钵僧在外出传道前要咀嚼咖啡豆保持清醒。果然，这些托钵僧的睡意消失了，而这位传教士也被公认为传教最精彩，而且最有智慧的传教士。

我在城市长大，所以很疑惑地问阿伯拉，山羊吃果实不是很奇怪吗？它们比较喜欢吃草或叶子吧？

“或许吧，”他说，“可是乡民还是这样做。”

“用咖啡叶做咖啡？”

“是的。他们称这种饮料为卡提（kati）。”

“真的？我很想试试，或许在咖啡馆就有！”

“喔，不！”他笑着说，“这种煮法在咖啡馆是喝不到的，而且在哈拉已经没人这样煮咖啡了。你得去拜访奥加登（Ogaden）人才喝得到，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喝咖啡。”

“他们住在哪？”

“奥加登人？他们现在住在吉加·吉加（Jiga-Jiga）。”他表情不悦地说着，“可是你不能去，那里非常危险，因为索马里人和奥加登人都很自大，他们非常恶霸！”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反正他们很恶霸就是了！”阿伯拉生气地摇摇头，“前一阵子他们还对一辆巴士做了很不好的事。他们对车上的人都很不好。”

“很不好？有多么不好？”

“非常非常不好。他们杀了那些人。”

“哦！的确很不好。”我同意他的看法。

“外国人到那里很是不好的！”他说，“你为什么想要去那里呢？”

“我只想去喝杯咖啡。”我问：“你到过那里吗？”

“那里像地狱。”他低头往下看，接着说，“我极力劝你不要去。”

我的第二杯咖啡

从哈拉城搭车到吉加·吉加的两小时路程还算平静，在穿越被称为奇观峡谷的路途中，我看不出这河谷有什么特别。我们在早上五点多就出发，因为阿伯拉警告我，开车的司机在下午两点以前一定要离开吉加·吉加，否则途中恐怕会遇上抢匪。他建议我最好早一点去，而且在中午以前回到哈拉，除非我想在那边过夜。可是如果我在那里过夜，那么我借宿的旅馆很有可能会有持枪的歹徒来抢劫。当然，也要看哪一家旅馆会笨到让我去借宿。他是不是会顾虑那么多呢？也许会吧。不管怎样，这天早晨天气非常清凉。可是当我们到了沙漠的边界时，天气已经热到让其他乘客忍不住移动衣服底下的枪。

“人类的头一旦被击落，是不可能像玫瑰花那样再长出来的。”这句话是当年理查德·伯顿爵士于 1854 年提出要探访吉加·吉加时，一位英国军官讲的。此时这句话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伯顿当时的状况与我现在的处境好像相似得有点可怕。我们两人都在寻找非洲中部的“神秘之泉”，而我的神秘液体还包括咖啡豆。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在寻找同样的东西。伯顿还想寻找尼罗河的源头，我则是只想知道它某一部分的去向。伯顿最惨的是被一支索马里的矛穿过面颊，我希望我们的相同点最多也仅此为止。

吉加·吉加是一个灰尘满天的地方，整座城镇到处都是贝壳灰制成的土块盖的小房子。当我看见门外放着一盘碎玻璃的小房子时，便把头伸进房里打探一下。

“卡提？”我用阿姆哈拉语和阿拉伯语问道，“你们有卡提吗？”

一位女士指着我的破旧软呢草帽，咯咯地笑了起来，不发一语。后来我又试了另一家咖啡厅，那家咖啡厅的老板也把我赶了出来，接下来的好几家也都如此。每当我上街，便会看到一个六英尺高的骨瘦如柴的人，以一种既不祥又不屑的样子看着我。在这城镇里，几乎每一个男子都配有枪支，女人则头戴五颜六色的头巾。我猜他们应该就是奥加登人。

突然，有一位瘦削的老太婆对我招手，叫我去她的屋内。

我看见她的脖子上刺着一排基督十字架。她开始对我说听不懂的话，

看起来似乎很害怕的样子。我做了吸食饮料的动作，然后再问她是否有卡提。

“卡提？”她问完便指向一袋装着脏叶片的袋子。她也模仿我喝东西的动作，“卡提？”

“是的！”我从袋中取出一片叶子嗅了一下，心想，难道就是这个？传说中牧羊人卡狄在阿比西尼亚（Abyssinian）发现的，咖啡的老祖宗？老太婆比了手势叫我坐在屋内的角落，接着便转身准备咖啡。只是这屋子的角落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坐，事实上，除了那包叶子之外，屋子里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这真的是一间咖啡馆吗？没有杯子，也没有椅子……而且她到底要在哪里煮呢？我又怎么知道那些是否真的是咖啡叶呢？

老太婆终于停下来，以怀疑的眼光盯着我。

“卡提？”我再次问她。

“噢！”她发出肯定的声音。

好吧，她看起来也算蛮诚实的。我就在泥地上蹲下来，等她煮咖啡。可是如果她对我下药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此时，突然有人敲门，接着有个身穿军服的男子走进屋内。他要求看我的护照，并问我为什么会在吉加·吉加。

“我是为咖啡而来，”我觉得我的借口很笨拙，“我听说要到这里才喝得到。”

军人也对老太婆问了话。老太婆摇摇袋中的叶子。

“你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白人。”他生气地对我说，“这里是禁区，很危险的！请跟我走。”

“可是……她正要煮咖啡……”我知道我的请求没有用。

“军官先生，”我故意说，“我能先请您喝一杯茶吗？”

“茶？”他问。

“不，不。我指的是卡提。”

我要开始解释时，他却打断我的话：“不行，你一定得离开，这个区域现在是军事管辖区。”

当他把我送去搭下一班前往哈拉的车时，我突然回想起有一次，一些爱尔兰朋友在纽约的东哈莱姆区也被两名纽约警察赶出去。当时他们抗议只是要跟朋友会面，其中一位警察一边说“别傻了”，一边把我的朋友带到最近的一个地下铁车站送他们走，然后说：“你们在这里是不可能没有朋友的。”

“因为德国总统要去拜访吉加·吉加，所以他们才会把你赶出来。”阿伯拉向我解释。

但他也有好消息。他曾跟他的女友提过我对卡提有兴趣。很巧的是，她的室友刚好会煮卡提，于是就邀我过去喝一杯。

事实上，用咖啡叶煮成的咖啡饮料有两种：第一种是卡提，也是两者之间较普遍的，它混合着烘焙过的咖啡叶；另一种则像更早期的做法一样将新鲜的咖啡叶晒干但并不烘焙，然后再将它煮成咖啡饮料。我在一个市场向一位女士买日用品时，她说她记得祖母以前都用第二种做法煮咖啡，现在这种咖啡饮料几乎已经绝迹，没有人喝了。她有一包粗麻布袋装的叶片，这种叶子宽宽的，上面呈现着橙色与绿色相间的颜色。

上述两种饮料都非常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咖啡饮料。因为很久以前，当埃塞俄比亚人开始吃咖啡豆的时候，最早提到的咖啡饮料据说就是用叶子煮出来的。“Kafta”是这种饮料的阿拉伯名。有些学者认为咖啡是用一种能上瘾的植物卡特草（qat）⁴煮出来的；在15世纪的时候，一位阿拉伯的神秘主义学家达巴尼（al-Dhabhani）曾见过埃塞俄比亚人饮用咖瓦（qahwa），那是一种酷似咖啡的液体。到底当时的埃塞俄比亚人喝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一种用叶子煮成的饮料，也就是传说中的阿比西尼亚茶。而生鲜的咖啡豆则在这之后才被摩卡港夏狄利神秘主义的苏非派信徒带进也门南部。⁵

不管怎样，卡提确实是一杯美好的茶。它的调制方法很简单：先将干枯的叶子放进一个平底锅，烘焙至深褐色、像柏油一样的状态，然后用水搅拌，放进一些糖和少许盐，再以小火熬煮，大约煮十分钟后便会呈现出琥珀色，有点类似正山小种（中国红茶），有些焦糖味，但是味道比正山小种还要复杂，既甜又咸，喝起来有果冻的口感。

这种干枯的叶子与阿伯拉带给我们咀嚼的卡特草混合起来非常美味。卡特草是咖啡的邪恶亲戚，它一样会使人上瘾，南阿拉伯人和东非人都非常喜爱（不久后，西方社会也掀起了一股热潮）。这两种可以使人上瘾的东西，在历史上一直有着错综复杂的紧密关系，而被咖啡爱好者喜爱的摩卡港的夏狄利的昵称，就是“卡特草与咖啡之父”。卡特草的吃法是将新鲜的叶子嚼一嚼，然后将嚼烂的叶子抹在嘴里，吸吮它所有的汁液。我第一次尝试这个是在肯尼亚，当时我觉得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阿伯拉带来的卡特草味道却很刺激，几乎跟劣质的摇头丸不相上下。摇头丸给人的感觉是身体与心理的兴奋，而哈拉出产的卡特草却是顶级的，它会使人产生类似大脑被催眠的新奇快感，让人顿时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可以让你的对话变成催眠的感官体验。⁶

阿伯拉的家里有个传统式的突起的高台，我们整个下午都待在那里休息。他的几位朋友也来坐坐。我们一边咀嚼一边喝着，就这样天南地北聊了一阵子，谁也不在乎到底聊些什么，有没有看懂对方的表情，或是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那一天实在很热，可是阿伯拉家的泥土小屋却很凉快，屋内也有许多舒适的坐垫。我们聊了洛·史都华（Rod Stewart），以及阿伯拉认为谁的发型比较好看等。之后，当我们很正经地聊到有关卡特草的事时，刚好是所谓的“所罗门时辰”，话题马上转换为巫术。我提到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副主教曾说过，伊斯兰教徒是利用咖啡来诅咒人的。可是阿伯拉却从来没听过这种事，但他说，在哈拉有些人会用咖啡进行神奇的医疗活动。⁷

“许多人来自大老远的地方来，就为了要得到这些人的治疗。”阿伯拉说。

“你看过他们治疗的过程吗？”我问他。

“只有一次，”他又摇摇头说，“我并不认同这些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接着问，“你曾看过扎尔（Zar）吗？”

“你知道扎尔的故事？”

“在亚的斯亚贝巴时，有一位祭司曾告诉过我。它是一个恶魔对吧？”

“不完全是，但扎尔可以附身在灵媒的身上。”他问了一个在联合国某机构服务却又不说英语的朋友，“是的，我的朋友说扎尔会附身于灵媒，

而他也了解这些人。”

听说有一位颇有名气的灵媒刚在埃塞俄比亚神圣的渥拉湖（Lake Wolla）完成了四年修行，回到了哈拉。他现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四都主持这种有神奇疗效的仪式，而今天刚好是星期二。

“你的朋友认识这些人？”

“认识几个而已。”

我停顿一会儿。“外地人有可能参与治疗仪式吗？”

“你想去吗？”阿伯拉有些惊讶，“我不知道呢……”

他又问了他朋友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没有外地人会想去那种地方，但他可以帮忙问问看。”

我们花了一整个下午才找到灵媒住的地方，但那时他正在睡午觉。他手下的人跟我们说今天是假日，最好晚点再来，而且要记得带礼物。

“礼物？”我问。

“是的，这是很正常的，表示尊敬。”

我们的计划变成请阿伯拉去帮我们买礼物，我则先回到旅馆。我们会在傍晚时分再度碰面。在这之前我得先付他一些钱买礼物。我想这会不会是骗局？不过我还是给了他钱。

“你要帮他们买什么？”我给钱之前问了阿伯拉。

“青色的咖啡豆。”他回答，“每次都该给这东西。两公斤应该够了。不要给他们其他东西！你是去观看的，而不是去治疗的。”

[1](#) 史泰龙在著名电影《第一滴血》里饰演退伍军人兰博。

2 罗布斯塔，是颗粒较小、形状大小不一的咖啡豆，产于乌干达、扎伊尔、刚果等国。

3 有些人说“coffee”源自“kefa”，也有人认为是阿拉伯词“qahwa”（q-h-w-y），意思是“对某些东西厌恶”，原意是指酒。但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没有类似“coffee”的发音，他们称“buna”，就是豆子。

4 卡特草也称作 khat、gat、chat或 miraa。新鲜的卡特草有生物碱，在美国被列为一级管制，食用者直接咀嚼叶子、制成香烟吸食，或冲泡饮用。

5 有学者认为，14世纪中国的郑和将茶叶介绍给阿拉伯人，后因中国锁国，阿拉伯人只好以咖啡替代茶叶。

6 有些缅甸人会咀嚼 leppet-so，这是腌制过的茶叶。

7 埃塞俄比亚是基督教国家，而咖啡与伊斯兰教国家关系密切，所以埃塞俄比亚曾经严禁咖啡。

02 咖啡的祈祷

咖啡壶带给我们平安，
咖啡壶让我们的孩子成长，
让我们财源滚滚，
请驱逐所有邪恶，
赐予我们甘露与绿草。

——奥罗摩族祈祷文

奥罗摩族的咖啡仪式

在哈拉，咖啡豆是权力的象征，种植咖啡的族人是哈赖什人（the Harash）。城里的人会将哈赖什人禁足于城门之内，唯恐会失去种植咖啡的秘诀。非洲族长的头号保镖可以拥有一小片咖啡园，以显示他的地位。当然，原住民更是崇拜他们的咖啡壶，就如前面那段祈祷文：

咖啡壶带给我们平安，

咖啡壶让我们的孩子成长，

让我们财源滚滚，

请驱逐所有邪恶，

赐予我们甘露与绿草。

我想我们都会为一大早起来喝的第一杯咖啡祈祷。这是一种无声的祈祷，一种当你精神还处于恍惚状态时而做的祷告。或许也可以这样念：“噢！神奇的咖啡，请让我熬过长途塞车之苦，让我在拥挤的地下铁能保持心平气和的心情，也请你原谅我的上司，就如同你原谅我一样。阿门！”

加利族（Garri）与奥罗摩族的祷告就显得更严肃些。有些祭拜咖啡的仪式叫作“bun-qalle”。这是庆祝与性以及死亡有关的仪式，他们会将咖啡豆装入一只用来祭拜神的肥牛。加利人认为剥咖啡豆代表屠杀，所以祭司会咬掉祭祀用的咖啡豆的蒂头，然后再以奶油煮过的咖啡豆请长者咀嚼，吃后代表他们的力量会增加，之后再念祈祷文，然后将有咖啡香味的神圣奶油涂抹在参与者的额头。接下来，他们将咖啡豆与甜牛奶搅拌在一起，大家一边念着祷告辞，一边把它喝掉。

如果你对这个过程感到有点熟悉，那是很正常的。有谁曾参加没有提供咖啡的商务会议呢？咖啡的作用不但是脑力催化剂，也像加利族人的祷告辞，可以使我们的财富增加。因此准备商务会议时，提供一壶咖啡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看来，现代的商业办公室也只不过是部落的形态罢了，而 bun-qalle 仪式也像我们喝咖啡闲聊时的聚会，也就是我们所知的

最普遍的社交仪式。

在这里，bun-qalle仪式的两个特征，标志着它可能在世界上最早把咖啡作为神奇的提神饮品。第一个特征是，咖啡豆是煎过后才食用的，这种做法源于柯法王国附近的奥罗摩族人吃咖啡球的方式。同样住在哈拉以南几百公里的加利人，与奥罗摩族有很近的地缘关系，而且他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第二个特征是，他们将烘焙过的咖啡豆加入牛奶之后再饮用，这说明此种做法是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的事（公元600年），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咖啡和牛奶混合会导致麻风病。

另外一点更能显示出这项仪式的古老，就是加利人将bun-qalle和天神Waaq连在一起。或许我们对这位天神的名字感到陌生，但是祭拜这位天神的仪式应该属于人类史上最早的宗教活动。至于他们是否在祭拜天神的仪式上食用咖啡豆，就不得而知了。但我相信，加利族是最早食用咖啡豆的民族。通常，原始的人类发现可以使精神产生变化的药物时，都会拿它用来祭拜（今天被视为滥用药物的嗜好）。所以我认为，加利人将食用咖啡豆这项仪式应用到祭拜天神的活动中也不为过。

在埃塞俄比亚西部奥罗摩族的文化里，咖啡豆象征女性的生殖器，因此产生了另一种含有性象征的bun-qalle仪式。完成仪式后，人们必须禁欲一个晚上。这些都是人类学家兰伯特·巴特尔（Lambert Bartel）搜集资料研究出的成果。奥罗摩族的长老伽玛朱·玛加沙（Gammachu Magarsa）曾经告诉巴特尔：“我们将咬开咖啡豆的动作，比拟为婚后第一次性交，因为丈夫必须分开妻子的大腿，才能进入她的阴道。”

当咖啡豆的外壳被剥掉之后，人们将剥好的咖啡豆丢进奶油中，再用木棍搅拌。这根木棍是男性阳具的意思。有些人认为，一根死掉的木头不会“传递生命”或给予咖啡豆新生命，因此又将木棍换成一捆新鲜绿草。

搅拌咖啡豆时，人们还要朗诵另一种祷告辞，直到咖啡豆因加热而爆开，产生嗒嘶嗒嘶的声音为止。爆开的咖啡豆象征着婴儿出世，以及即将往生的人的最后一口气。此时，负责搅拌咖啡豆的人必须念：

Ashama，我的咖啡，

裂开吧！

将平安带给我们。

当你张开口时，请将所有邪恶的言语带走，远远离开我们。

咖啡豆被吃掉时便会“死去”，可是它也会带给那人新希望与新生命，这是奥罗摩族自古以来的传统。吃完咖啡豆后，仪式便会转向当天要讨论的大事，也许是割礼、婚姻大事、土地纠纷，或是危险的旅途。

在 bun-qalle 仪式中，有一件事必须注意：咖啡豆要被整颗加入牛奶里，并不敲成碎片。如果想要让咖啡的成分完全溶解出来，就必须先将咖啡豆磨成粉末，然后再加入水这样的中性液体，这样就可以使咖啡豆释放所有魔力。而这种做法是留给比较黑暗、可怕的法术使用的，例如魔咒，或是晚上从事的驱邪仪式。

○

“听起来你应该是被骗了！”亚伦如此说。

亚伦是美国卫生专家，我是在等阿伯拉时认识他的。

“40比拉，那是很多钱哩！希望你没被骗。”他指的是我给阿伯拉买礼物的钱。

亚伦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评价很低，就像其他官员一样。他找到了一些可以证明他论点的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埃塞俄比亚闹饥荒时，因为得到太多外国的支持，使得埃塞俄比亚人向外国人乞讨的习惯成为家常便饭。依据亚伦的说法，乞讨对于这些人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不管是真是假，我不能否认埃塞俄比亚的郊区到处充满了只有在美国才碰得到的乞讨方式，就是明显并不急需用钱的人前来跟我搭讪，为的只是想骗取几个比拉。

“嗯，我想你不会再看到你的朋友了。”亚伦肯定地说，“不如你跟我到房间看看我买的篮子，一个只要 70 美元。”

就在这时，阿伯拉准时出现，而且一切都安排妥当，我确定可以参与这次仪式。

“可是不要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了。”他再次告诉我，“这些已经够了。记得不要喝他们在仪式中提供的饮料。”

唯一扫兴的是阿伯拉不能去，因为他得为准备学校考试苦读，但他有一

位虔诚的天主教朋友答应带我去。

“天主教朋友？他会来吗？”我问。

“他已经答应我了。”阿伯拉的话听起来并不是很肯定的样子，“斯图尔德，我得问你，你今晚 would 戴帽子去吗？”

阿伯拉指的是我那顶又老又旧的草帽，之前在吉加·吉加被一位女士取笑的帽子。我想你也曾有过这种经验，当你真的喜欢某件衣物时，你会喜欢到爱不释手的感觉，我对这顶帽子正是如此喜爱。

这是一顶澳洲款式的草帽，是我在美国一家连锁大超市找到的。它陪着我经历了无数风雨，当我到埃塞俄比亚时，草帽已经破旧得必须用布料缝补才行。它不但破旧，而且还很脏。我不敢洗，因为怕放入水中会马上溶解。尽管它已经破旧不堪，但我还是很喜欢它。我在每个国家遇到的人，都会对我的帽子有不同且特别的反应，尼泊尔人就曾幽默地出高价要把它买下，印度人也笑着赞扬它的独特价值，埃塞俄比亚人则认为它不卫生。

“你不能戴那顶帽子，”阿伯拉说，“至少今晚你不能戴，因为那会显得你不够尊重仪式。”他说着便拿出一条伊斯兰风格的丝巾：“你就用这个吧！来，我帮你绑上。”

“好吧。”我想他说得对，况且这条掺杂着白、蓝、红花纹的丝巾蛮好看的。阿伯拉用穆斯林信徒的方式，帮我将丝巾缠在头上。

“还不错，”他说，“你这样看起来还蛮像穆斯林人！”

“你要我乔装进去？”

“或许吧！反正你要走哈拉的夜路，这点子应该不错。”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我邀他共进晚饭，他谢绝了。我还劝说他允许我寄《时尚》杂志给他，因为他正在为学校的校刊撰写文章。他离开之后，我在旅馆大厅坐下来等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很快到了晚上 8 点，9 点，10 点，但还是等不到人，旅馆的警卫也正在准备他的睡袋，这时前门突然传来敲门声。没错！是阿伯拉的朋友。我向他道谢，感谢他愿意陪我去。我也问他仪式

是否已经结束，毕竟我们大约迟到了两小时，他说不会有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快步走过哈拉一条漆黑的小巷。一路上，有许多蹲在路旁的男子向我们打招呼，还有一些羞怯的女性以微笑问候。

“他们以为你是穆斯林！”那朋友指着我的头巾说。

当我们远离市中心后，周遭变得异常安静，我的朋友也随之安静下来。据说，这条哈拉的路上到处游荡着以前各部族奴隶的鬼魂。也有些人相信，曾经被认为是雌雄同体的土狼，身上附有以前因为穷困而必须割除阳具、卖身为仆的小男孩的灵魂。根据 18 世纪法国旅行家安托万·阿巴迪（Antoine Abladie）的记载，土狼被认为是会攻击和啃食扎尔灵魂的狼人。

扎尔仪式中的咖啡

当我们走近举行扎尔仪式的房子时，我听到一阵歌声，表示驱邪仪式已经开始了。那位朋友对我表示要保持安静，然后我们溜进一间只有一盏小灯的狭窄房间。约有 20 人蹲在门口附近，一条肮脏的白布从天花板垂挂下来，将整个房间的一大半遮住。我们隐约看见白布里灵媒的影子倚靠在一张宽大的床边。白布前站着第一个病人，因为我们来迟了，不清楚那男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灵媒表现得好像已认出附在男子身上的灵体是什么，且开始说服灵体，如果他奉献三只脖子上有特殊颜色羽毛的公鸡，灵体便得离开男子的身体。

在房间里，大家互相传递着一杯淡色的液体，并且低声闲聊。我很庆幸自己没被发现。很显然，我乔装得很成功，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外国的穆斯林了。有些蹲在墙边的人开始前后摇摆，重复唱起有切分节奏的奇怪旋律，也有人把香丢到火盆里。

传统的扎尔仪式的开始可能是牺牲一对鸽子，或服用大麻、饮用酒类饮料，但一定少不了烘烤青色的咖啡豆，咀嚼完后再煮成汤汁。这便是所谓的“将盒子开启”，以便释放灵媒的力量，好让他能与扎尔的靈魂沟通。有人形容扎尔的靈魂没有脚趾，而且手上有洞，如果往洞里看，便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也有人说扎尔的靈魂有许多不同种族的美丽面孔，有阿拉伯人、白人或中国人。有些人认为扎尔（zar）这个词来自“Jar”，也就是阿高族（Agaw）的库施特语（Cushitic Language）中由天神 Waaq 所取的名字。

埃塞俄比亚的扎尔祭司通常来自渥托族（Wato）或渥罗族（Wallo），与今晚祭司的训练地渥拉湖，也是埃塞俄比亚最古老最神圣的地方名字相似。渥罗族号称是奥罗摩人的后裔，有一个时期，他们的魔法强大到让其他族人都望之却步。直到最近他们还维持着一种习俗，就是在特别厉害的法师坟上种植咖啡树。奥罗摩人说：世界上第一棵咖啡树便是天神的眼泪掉落在一位法师的尸体上生长出来的。

虽然这是驱邪仪式，但人们相信它是扎尔的靈魂和灵媒的一种谈判。他们认为只有灵媒可以接触扎尔，在必要时，灵媒会跟扎尔协商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在这里，咖啡的角色与印第安人用于宗教仪式的皮约特仙

人掌所含的迷幻药一样，有异曲同工的效果，这点因为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的《知识系统三部曲》（Ways of Knowledge Trilogy）而得到广泛认知，而咖啡豆精灵的魔力有多大，还要看吃咖啡豆那人的体质与能力而定。

此时，一个女子站出来，在灵媒的影子前献上更多礼物。她饱受头疼折磨，这些严重症状会持续好几天。她一边说，灵媒的影子也一边颤抖。说完，女子就安静站立不动，换她的男性亲属开始说话。从他所说的话可了解到，女子受的苦不只是单纯头痛。

“是脑部问题。”阿伯拉的朋友悄悄对我说。

她常常发作，导致她有暴力倾向，破坏家具。有一回她发作时，还试图咬掉母亲的手指。她家人最后决定求助于扎尔祭司。在场的人也都为她的不幸悲叹，认为她的病情是典型的邪恶扎尔灵附身所为。扎尔比较会附在女性的身体，像骑马一样骑在她们身上，指使她们做出反常的动作，譬如以铁棍自残，可是伤口一到早晨都会神奇地消失。

这时，女子突然扑在地上呐喊，抱头颤抖，像是遭到了剧烈疼痛。灵媒盘问扎尔灵时，女子也跟着越来越痛苦。我的天主教朋友从头到尾都难以置信地摇头，表示对此无法认同。他们终于达成协议，也就是女子家人必须奉献一头牛给扎尔。接着，扎尔又提出不寻常的要求，他要求女子必须剪掉头发，独自带着剪下的头发到有土狼的原野，将头发撒落在地。

这时有人拿一把剪刀过来。可是当他们剪女子头发时，她突然指着我们的方向说，不希望外国人目睹。看样子我的打扮还是不够好。

于是我们蹒跚地走回旅馆，一路上阿伯拉的朋友向我解释，他对这种仪式抱有鄙视的态度。我对他说，在美国的电视上也曾有过类似的医治者。

“他们也用咖啡？”他问。

“咖啡的确很受这些人重用，”我说，“但他们通常要求以信用卡付款。”

隔天我就听说，那名女子前一晚撒在原野的头发，到了清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往摩卡港

埃塞俄比亚人发现咖啡能引起幻觉后，与他们比邻的国家也跟着爱上了这些令人着迷的豆子。有记载说，埃塞俄比亚北边的埃及人是最早染上咖啡瘾的。有些激进的学者更将埃及传说中的忘忧药（*nepenthe*）——特洛伊（*Troy*）王妃海伦为了减轻痛苦而服用的药物——视为早期的咖啡。

哈拉的咖啡最主要的转运方向是往东到红海，再以海运转运到也门的阿玛卡港（*Al-Makkha*），也叫摩卡港。在第一个千年，哈拉与摩卡港之间曾有大量交易，大多数的交易项目是鸵鸟羽毛、犀牛角和乌龟壳等一些必需品，当然，奴隶也是其中一项。阿拉伯人是恶名昭彰的奴隶贩卖者，他们会大张旗鼓地买入奴隶制度的牺牲品，这些人被称作辛吉（*Zanj*）。可是辛吉人很喜欢阿拉伯人，或者说，是喜欢阿拉伯的甜食。根据中古时期一位阿拉伯作者的说法，辛吉非常敬畏阿拉伯人，敬畏到会拜倒在地上高喊“欢迎你们，来自枣子国的人们！”阿拉伯人会以甜美可口的枣子拐走辛吉的孩子，诱引他们到阿拉伯。

1000年前，这里的奴隶从哈拉前往红海沿岸需要花 20 天。要卖到土耳其做奴仆的男孩，在路上已经被阉割了，有近一半奴隶在前往红海的途中死去，而咖啡树就会从他们留下来的物品中出现和生长出来。

现在我只花了三天就到达红海。我在哈拉城搭上了一辆便车，到达埃塞俄比亚唯一有铁路车站的德雷达瓦。我要搭的那班火车迟了一天才来，但还是很值得。这列火车有 20 世纪的法式浅蓝色车厢，头等舱的座位是老式的折叠椅，椅子的布套旧到只剩肮脏的碎布条。因为机器老旧，这趟原本 12 小时的旅程延长至两天。我之前曾在印度待过，对于这种延误也就见怪不怪了。通常在这时，我会闭上眼装死（或说，我希望自己真的死了）。

终于到了终点站，也就是吉布提（*Djibouti*）的港口。一位 13 世纪的伊斯兰教朝圣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如此形容吉布提：“是世界上最肮脏、最不友善，而且最臭的城市。”吉布提人喜爱吃骆驼肉。从现在的认知来说，吉布提是个国家，其实它也是个到处有酒吧和妓院的法国军事基地。我的第一个停留地是一家咖啡厅，于是我点了一杯冷饮

来喝。

“你讲英文吗？”问我的的是一个肚子大大的、穿着格子裙的男子，他坐在隔壁桌。

“是的。”我说。

他研究了 my 帽子，然后说道：“喔，美国人！太好了！我会说 12 种语言。”他继续说：“我到过全世界的港口，像开罗、亚历山大、威尼斯、纽约、雅典、悉尼、香港……”他不停地说，原来他是个退休水手。

“现在我终于回到了吉布提。你喜欢这里吗？”

我扬起眉毛表示喜欢。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他问。

我表示要找一艘船到摩卡港。

“摩卡港？你为什么想去那里？”他惊讶地看着我。

“为了咖啡！”

“你要去也门喝咖啡？”他将我的话翻译给其他人听，接着便是哄堂大笑。“朋友，今天没有船会去摩卡港。”

他向我解释，昨天厄立特里亚（Eritrea）侵略了也门位于两国间的小岛。现在红海到处是双方的军队，听说也门的飞机与军舰已经开始轰炸可疑船只。

“但你很幸运，我一位朋友的船今天正好要离开吉布提。有些人已经等了两星期，他们并不担心被炸，都急着要去摩卡港。如果你想去，就快一点！”

他朋友的船大约 30 英尺长，看得出之前是以鲜艳色彩漆成，但现在已经变成灰色了。船上除了船尾有个像茅舍的简便小屋、一根最基本的桅杆（上面没有帆布），其他空无一物。没有收音机、没有电灯，也没有任何紧急医疗箱或急救设备，厕所则是一个悬在海上的木箱子。这艘船连甲板都没有，只是一块绿色的大帆布盖在一堆箱子上面。船上坐着

15位索马里难民。

虽然不像样，不过这艘船还是可以航行。我与阿布都·哈格船长迅速谈好价钱（30美元），跳上船，五分钟后便出发了。这时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天空充满金黄色的夕阳余晖，大海则变成深紫色。我心想，明天就要到也门了。当我们接近港口时，船只慢下来，接着只有溅水的声音，因为船只引擎已经关掉。

“今天风太强了，”在我旁边的一位14岁索马里男孩说，“我们明天才能启程。”

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和他的姐姐阿莉一起被送往也门亲戚家，可能要住到战争结束。他长得很秀气，身材纤细，眼神温柔，还有性感的厚嘴唇，如果他穿女装，我会误认为他是女孩。他问我，美国也有军阀？“喔！当然有！”我回答，每个大城市都会有一个军阀。他和阿莉有些惊讶。他们又问：“美国那些军阀会有坦克和枪支吗？”我回答：“坦克没有那么多，但是枪支可多哩！”我认真地告诉他们，美国许多地区跟摩加迪沙并没有两样。

我们聊了几分钟，不太会讲英文的穆罕默德（但比其他索马里人讲得要好）给我一个礼物。

“这个给你，”他将一叠索马里纸钞放进我手里，“拿去！”

但我拒绝了。索马里难民不应该给美国旅客钱，应该是反过来才对。我也没打算给他们美元答谢。

“不！不！不！”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要，一定要！”他又把钱塞回我的手里。

“拿去！”

“这些钞票的确很漂亮！”我说。这些纸钞差不多值1500多索马里先令。“我不能拿，你疯了！”

另一个英文比较好的埃塞俄比亚人插嘴说，现在索马里政府已经不存在了，这些纸钞已经不值钱了。我才勉强收下那些漂亮的纸钞。穆罕默德对我知道纸钞不值钱后才肯接受他的礼物感到非常讶异。

阿莉也很烦恼，因为她到也门后就必须戴面纱。她开玩笑似地将长袍围到脸上。

“不好看，不好看！”她说，“我的国家不用戴面纱。”

她美丽的脸蛋有阿拉伯与非洲的混血血统。她一直给我茶和饼干，最后我也将我的阿拉伯英文辞典给她。

大约凌晨两点多，他们将珍藏的宝贝物品拿出来，是卡西欧电子琴。我为他们弹了一曲莫扎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但他们好像只对电子琴的自动节奏控制比较有兴趣。我听着金属般的巴西新爵士在微风中奏响，回想起咖啡被送往也门的时期，在那个时代，这两个孩子绝对会被转卖为奴，而现在他们只不过是难民，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算不算是进步了？

03 也门的古老咖啡港

旅途中经过一处咖啡树林，他宛如虔诚的教徒一样摘取咖啡果实补充身体养分，发现这种果实可以让头脑灵活、清醒，精神充足地完成传教使命。

——纳吉姆·阿丁·阿盖兹（Najm al-Din al-Ghazzi, 1570~1651）

海上旅程

早上，我从马达的引擎声中惊醒。吉布提已经不见踪影，从栏杆看过去，只看见蓝绿色的海洋与一层又一层白浪，天空像是一面碎掉的镜子，看起来风暴好像还没有结束。其他人将携带的物品全都移到船尾，我决定还是待在原来的位置比较安全。

突然一个巨浪打过船头，把我弄得全身湿淋淋。不久又是一个接一个浪花不断地打过来。当我要换位置时，发现甲板开始倾斜，约有 20 度。这时我们的船“卡希德号”（Qasid）突然不再前进。只见船员努力将船舱的积水倒出去，试图控制这艘船。大家忙着将箱子搬来搬去，但我认为问题在于没有将货物平均分散。此时有一艘钓鱼船从我们船边快速驶过，我发现那艘船高出我们许多。“卡希德号”行驶在那艘船后面约七英尺的地方，我感觉我们的船严重超载。

当我们再度出发时，又一个巨浪朝船头打了下来，于是我们再度靠岸，以便倒出船内的积水。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整天，最后船员开始担心海水会损坏贵重的货物——酒和 AK-47 步枪。

酒是来自吉布提，而枪支据说是因为在另一地卖不出去，要退回也门。这些武器和酒都很重，使船身下沉，无法航行。

船员最后决定将船停靠在小岛，等强风过后再出发。在这里我总是提到船员，而没有提到船长，是因为我到现在根本没有看过船长阿布都到过甲板，所幸船上的三名少年和两名老年人很顺利地将轮船停靠在小岛岸边，船上的乘客纷纷将自己的衣物拿出来晾干。风还是很强，强到可以把衣服吹得与地面呈 90 度直角。我想象这里是红海的洲际休息站，但其实是我们遇到船难被迫停泊在荒岛上。不过我宁可保持乐观，反正轮船还有一个引擎在运转，我们应该可以抵达也门。

可是其他乘客就没这么乐观了。譬如波里司，他是埃塞俄比亚人，一个卡特草瘾君子，习惯于咀嚼这种叶子，如果没得嚼，他会害怕受到恶魔侵扰。波里司对于受困在一座没有这种叶子的荒岛上感到不安。

“事情不太妙喔！”他发着牢骚，“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这艘船的第一场争斗是由一个较年长的水手引起的，我叫他“没牙齿的老人”，他和一位想偷他的卡特草的乘客打起来，其他人赶紧将他们拉开。当时“没牙齿的老人”只是用拖鞋威胁年轻男子，但这已经是不好的预兆。当我看到“没牙齿的老人”在一个石磨里磨着一种煮烂的绿色食物时，我就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是他宝贵的叶子。因为他没有牙齿，所以必须先以这种方式让汁液流出来。

还有另外一位成员是年约 16 岁的卷发男孩，我发现他经常盯着我看。他看起来一副老实样，行动却像猴子，也许他一直在船上过日子，习惯摇晃的感觉。我与其他人聊天时提到美国，那个男孩正坐在我们上方的一个板条箱上，一副困惑的表情指向摩卡港。

“他是从阿美卡（al-Merica）来的吗？”他问其他人，“那是在摩卡附近吗？”

”其他人听了哄堂大笑，波里司笑得最大声，他笑着说：“他连美国都不知道呀！”

“那也是一个小岛吗？”男孩问。

我指向西北方向：“在那边！”

他回应：“在厄立特里亚旁边呀？”

其他人又笑了。

“不，不！它在很遥远的地方。如果你去那里，会先到厄立特里亚，接下来是埃塞俄比亚，然后经过非洲和土耳其，再来是欧洲，接着还有一个地方叫英国，最后是一片海洋，那是一片很大的汪洋大海，在大海之后就是美国。”我解释后，其他人也帮我向他翻译。

男孩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搞不懂怎么会有那么遥远的地方。

“其实也没那么远啦！”我笨拙地说。

他看起来更加不解，眼睛突然现出不悦的表情，但其他人还在取笑他。我想他一定以为我是在骗他，害他成为大家的笑柄。他带着又气又不解的表情走开了。我突然想到，其实他是对的，这个旅途实在太遥远了。如果可以选择，有谁愿意离开家乡那么远呢？

这个男孩从小就住在这里，或许一辈子都会住在这艘船上。这艘船、摩卡港，这里的沙滩、大洋、海风，还有等待，这一切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天他会像那个“没牙齿的老人”一样坐在桅杆旁边，或是偷仓库里的橘子酱饼干，而且会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要苍老。

之后我对男孩微笑，他便马上走开。他跟其他人一样，只称我是“那个美国人”，一整个下午我只好一个人坐着。

我们前往的也门的摩卡港口，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地区。但当咖啡由被俘虏的非洲人带进也门之后，至少在西方人眼里，摩卡港就变成了相当传奇的地方。在1世纪的希腊，有一位作家曾经形容摩卡港“是一个连经过都觉得很健康的地方”。又说“那里是一个吃鱼的族群，会将遇到海难的人掳为奴隶”。当时的希腊人还相信阿拉伯人会吃大蜥蜴，从大蜥蜴体内取出肥油加以运用。他们甚至相信，有许多带有恐怖病菌的飞龙帮他们守护阿拉伯海域。

有许多传说是阿拉伯人为了保护生产没药（myrrh）¹的田地而散播的，因为这对阿拉伯帝国的交易实在太重要了。阿曼（Oman）的水手当时早已开始运送来自印度的靛青染料、钻石与蓝宝石，他们会从穆札阿玛卡（Muza al-Makkha）带来当地用特殊方法制作的武器到非洲交易，以获取当地原住民的善意，然后再从非洲带回麝香、龟甲与犀牛角。

部分奴隶把咖啡带进阿拉伯，不知道这些奴隶的数量有多少，但辛吉人奴隶早在1世纪前就已经出现在中国。在1474年，就有8000名非洲奴隶被运送到东印度孟加拉国。大约在1800年，这种贩卖奴隶的交易达到高峰，当时阿曼王国的黑人办事处将葡萄牙人赶了出去，并在桑给巴尔（Zanzibar）设立总部，那时的奴隶人口几乎占东非沿岸斯瓦希里（Swahili）总人口的一半。

我们在船上的晚餐有米饭。我往哈尼什群岛（Hanish Islands）方向看过去，发现一闪一闪的火花在闪耀，我问其他人是否战斗机在轰炸，他们说不是，不必担心。除了波里司，全体人员都沉默下来。波里司可能因为没有卡特草可嚼而格外聒噪，不断地对我说一切都会顺利，又说风浪减弱了，还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再出发。小岛的山丘上出现了小型风暴，看起来像是从天而降的银色星光。

“那是阿希强。”他说。阿希强是埃塞俄比亚语中小风暴的意思，代表有

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隔天风势稍弱，于是我们继续上路。到了黄昏，我们已看到陆地，再过几个钟头便可停泊在摩卡港外。可是隔天早上，当我们准备开进船坞时，也门海关却不让我们入境。原因是船上的乘客多为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文件。也门海关命令我们在离码头约 15 码外的区域停泊，不得入境，也不得离开。就这样，我们在码头与其他被遗弃的船只一起漂泊了三天三夜。在等待期间，大家的情绪都不稳定，打架的事件不断发生，曾经建立起的友谊也因为不安的心情而破裂。那位索马里男孩也变得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看着天上的星星，喃喃地说：“好美哦！”

他说对了。白天时，摩卡港清真寺的白色尖塔忽隐忽现地出现在漩涡状的风暴之间，到了夜间，我躺在船上一边看星空，一边跟着船只摇晃。晚上比较寒冷，我又没有棉被，只能靠唱歌来保暖。“没齿的老人”也喜欢听我唱歌，当我唱歌时，他都会犒劳我一包小饼干。他最喜欢的曲子是《神佑孩子》。

我开始回忆许多往事。一首圣诞曲子在风中响起，某段性幻想一再出现在我脑海中，有时真实到几乎可以触摸到对方的发丝。我们漂泊海上的最后一晚，我发现邻近一艘废船里似乎有动静。那艘船的船身有一半沉在海里，因此我以为船里不会有人。可是那天晚上我看见船窗发出微微的光芒。为了要看清楚，每当船被海浪带到那艘船的旁边时，我会以手肘撑着，伸头往里面瞄。结果我看到确实有人在那艘破旧的船里看迈克尔·杰克逊的录像带，可还是不敢确定，也许是因为船只在海上不停地晃动，或者是眼镜因为海风不停吹袭而结上一层盐巴，但我认为那晚确实看到迈克尔·杰克逊在海上走他那一段有名的“月球漫步”，就这样走过来又走过去，走过来又走过去……

第三天我醒来时，发现船只正好靠上码头，岸边的索马里女人都戴上了面纱。除了我，船上所有人都会被带上一部小货车，我则被带到另一个小木屋。小木屋的外面围绕着许多站岗士兵，每个人都戴着格子花纹的阿拉伯头巾，小木屋内则摆着一张桌子，前面坐着一位军官。

“护照。”

我把护照交给那位军官，他很生气地将它翻开。

“你从哪里来？”他头也没有抬起就问我。

“埃塞俄比亚。”

“护照上写的是吉布提。到底是哪里？”

“对，对！是吉布提没错。我忘了！”我说。

他哼一声，说：“你忘了是吉布提。难道你也忘了有战争吗？”

“战争？你是说也门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吗？我当然没忘。”

“当然没有？”他从椅子上往后躺，“很奇怪的是，你一个美国人会在这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吗？”

看样子战况不是很乐观。也门人被厄立特里亚人从哈尼什群岛逼退，死了大约 50 人，情况非常不乐观。根据这位军官的看法，整件事的起因是厄立特里亚将海床的石油采探权签给了一家美国石油公司，而海床位于哈尼什群岛与厄立特里亚之间，厄立特里亚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因此攻打也门。

现在，那位军官面前竟然会有一个戴着奇怪草帽的美国人。在他们眼里，我一定是中央情报局派来的间谍。

“你到了摩卡港。”他一边点头一边对着我笑。

“你有看到我的签证吗？”我问他。

“哦！签证？当然有。”他轻蔑地说，然后指着墙边桌上的东西。那些是我来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被他们放在桌上。“那是你的相机吗？”

“是的。”

“你有照相吗？”

我假装很生气地说：“当然没有，我知道这里是军事基地！”

“啊！那你为什么会来摩卡港？”

“为了咖啡。”我向他解释。

“咖啡？在摩卡港？”

“是的。你应该知道夏狄利（al-Shadhili）吧？”

“清真寺？”他翻开我的护照，然后说，“你不是穆斯林啊！”

“不是。但是……”

“只有穆斯林可以进入清真寺。”

“我只是想看……看一看而已。”

“是吗？你原先说你是为了咖啡而来，现在却又说你是旅客。”

他对我说的话不信任：“然后你又跟一群厄立特里亚的违法者来到也门，身上还带相机。”

他们打算以间谍的罪名将我关起来。我想，也无所谓，只要有一张床和自来水就好了。观察也门政府的行政效率也是蛮有趣的。他会送一份报告，上面会有许多问题要问，之后又会送走报告。接着又是更多问题与答案，来来去去，但我们都很清楚，最终我还是会被释放。

那位军官一直观察我。或许他已看到我脑子里的这些想法，突然觉得我根本不值得他花那么多时间调查。他比了个手势。这手势好像是也门的特殊文化，只看到他将右手举至耳朵旁，然后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向外撇一下，同时还翻了个白眼。接着他命令两个拿着机关枪的士兵带我出去。

“欢迎来到也门，不要忘了你的护照。”他说着就把护照递给我，“如果你真的是为咖啡而来，你已经晚了 300 年。”

第一个用咖啡豆煮咖啡的人

1000多年前，摩卡港与咖啡几乎是连在一起的。非洲的咖啡豆最先就是被带到这里，阿玛卡港之后就改名摩卡港并闻名于世。大约在 1200 年，有一位伊斯兰隐士夏狄利成功地煮出了第一杯摩卡咖啡。虽然埃塞俄比亚人早已在咀嚼咖啡豆，或是将咖啡叶煮成茶来喝，但是要说第一个将咖啡豆制成咖啡的人，还是非夏狄利莫属了。

法赫尔·阿丁·摩卡曾经说：“我们通过很多人才获得咖啡资源，第一个将咖啡介绍给我们，还将它的用途教导我们并加以普及的，就是伟大的夏狄利。”

关于夏狄利发现咖啡煮法的故事，流传着许多版本，就像他的名字有众多写法一样。有个版本说，是他在某晚拜神祷告后，步行回家的途中发现的；另一个版本说，他在野外修行时无意间发现了咖啡的特殊效用。还有些人说，他曾经 20 年只吃咖啡豆过活；更离谱的说法是，天使向夏狄利透露，如果只吃咖啡豆，可以引导他至圣徒的地位。但最有趣的版本应该是：我们的主角夏狄利因为被诬陷和国王的女儿有奸情，而被驱逐至荒郊野外，他在野外靠咖啡豆生存，直到天使向他透露国王染了皮肤病，只需要一杯咖啡便可以治好，夏狄利借此将功赎罪。

有些历史记载，夏狄利或他的一个教友曾拜访埃塞俄比亚，观察人们喝咖啡的习惯，由此将咖啡带回也门。之后又有些记载说，葡萄牙水手因为晕船而停靠在摩卡港，他们身体染病又饥饿，奄奄一息，直到夏狄利告诉他们咖啡的神奇效力。葡萄牙水手试喝这神奇的饮料后，真的在几天内都痊愈了，而且可以立即上路。他们离开时，据说夏狄利曾向他们大喊：“记住这神奇的饮料：摩卡！”就这样，改变历史的摩卡咖啡传到了西方社会，从此闻名于世。

无论这些传说怎么说，其实夏狄利派也是苏非派的一个派别。1200~1500 年间，一群有和咖啡相关的宗教经验的夏狄利派托钵僧，走遍了阿拉伯半岛。这群人最远还到过西班牙，接触到了一个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融合的宗教，叫作“夏狄利亚”，它至今仍然存在。夏狄利亚与咖啡的关系非常密切且深远，如果你去阿尔及利亚（Algeria），现在还可以点一杯夏狄利亚咖啡。目前我们只知道，夏狄利亚派中的一个教徒将咖啡

传播于世，也知道他们其中有位住在摩卡港，还知道他们喝的东西应该不怎么美味，因为他们还不懂得要先烘焙咖啡豆。他们只用新鲜的咖啡豆、卡特草，以及小豆蔻煮成汤汁。确实有证据证实摩卡港的夏狄利教徒只是将卡特草煮成茶汁而已，后来另外一位亚丁（Aden）的苏非派教徒才开始以咖啡豆代替卡特草。

这些微小的开始，启动了一个小小的帝国。在 15 世纪，当土耳其人征服也门时，摩卡（阿玛卡）咖啡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家人民普遍饮用的饮料。到了 1606 年，大约欧洲开设第一家咖啡馆的半世纪前，第一位来到摩卡港的英国商人曾经描述：港口里有超过 35 艘商船，全都在等着领取码头上堆积如山的咖啡货品。和现在的货币交易相反，一位英国商人形容摩卡港充满“各式各样的货物买卖，可是他们卖给开罗商人的天价，几乎超出我们的能力……”沿岸是一座又一座咖啡城堡，王子坐在金丝绸缎制作而成的垫子上，身边有许多奴隶拿着扇子伺候，还有私人军队保护珍贵的咖啡，以免被无宗教信仰的扰乱分子窃取。

在那时，过世已久的夏狄利被封为咖啡的守护圣徒，他的墓碑则被放置于摩卡港的清真寺里，成为伊斯兰朝圣之旅的必经之地。

我被摩卡港政府扣留在港口时就已经看到了那座尖塔，等我被释放后就立即前往清真寺探个究竟。结果发现，原来现在的摩卡港是我所看过的最肮脏、苍蝇最多的地方。每个男子都穿着破烂的衣服，两脚又油又黑，坐在被秃鹰啃得残破不堪的摩托车上，大家聚集在当地所谓的“出租车帮”地盘。

城里有几间鱼腥味很重的咖啡厅，还有一家旅馆，每间房都挤了 30 多人。我们在海上遇到的印度季风也在这里造成了风暴。不到一分钟，我就被风沙与汗水覆盖了全身。细沙夹杂着汗水在我衣服里混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小沙河，从身上慢慢往下流。

我好不容易到达古城区时，突然想起以前在印度读过的一本书中提到：“这座城市把自己展现得亮丽壮观。城市里有许多椰子树与城堡……这种美景让我们感到非常快乐。”²那是 300 年前写的。我知道事隔多年或许会有改变，可是当我站在摩卡城唯一道路的尾端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一眼望去是一片无穷无尽的沙漠，点缀着残破不堪的大宅。左边是一道碎裂围墙，那里曾经是咖啡商人住过的城堡，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

里的建筑物，满是带状雕刻的装饰与阳台，窗户形状类似洋葱，后面则是一座设有雉堞的小塔，我想以前一定是一个小堡垒的角落。这个废墟延伸好几公里，现在剩下的只有已经破碎不堪的围墙。这些荒废的住宅之间隔着许多小沙丘，后来我才发现，在这些小沙丘里还埋着更多废弃的建筑。

唯一存在的生命迹象只有一位年老的男子，他蹲在一面倒塌的围墙旁边，只是他无视我的存在。

我向他问好，他只是继续抽着水烟筒。我想他也许是聋子，于是就往前站到他身旁，但他仍然没反应。我曾看过许多人物，而这位老兄远胜过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他的破旧衣服沾满了油，像是刚从机械厂走出来，他的头巾也结着一层厚泥沙与油污。黝黑的皮肤使他看起来酷似木乃伊，脸上布满了类似蜘蛛网的皱纹，又像是被太阳晒伤的感觉。流出的汗水在他覆盖着尘埃的脸上留下几条痕迹，手上的水烟筒脏得跟它的主人一样。他的水烟筒有独特的设计：生锈的烟筒插在一个已经破掉的水瓶里，另一个沙丁鱼锡罐头则被用来做烟斗的底部。

我指着清真寺问：“这里是夏狄利吗？”

只见他又抽了一口烟，还是没反应。于是我走到清真寺附近，试探能否找到出入口。清真寺是由六座矮小的圆顶屋组合而成的，中间耸立着一座40英尺高的白色光塔，上面刻有宰比德（Zabid）³学派高雅的几何形雕刻。我绕到另一边，发现一道装有黄铜手把的门，还没敲门，一个老头子就跳出来，对我笑了一下，然后又转过身把门锁上。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就消失在了风沙暴中。

我看了一下清真寺，又看着废墟，还有那位抽水烟筒的老人，突然嗅到一股恶臭。我猛然发现那股恶臭是来自我的身体，此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一礼拜没有洗澡了，现在我又饿又累，额头也剧烈疼痛。我决定马上离开。

“再见了。”我对老人说。

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前方，依然抽着水烟筒。我往风暴走去，离开了摩卡港。

1 没药，是从凤仙花（生长在西非干燥地区的矮小多刺的植物）的裂缝中渗出的浓稠液体。索马里人将树皮劈开，以利汁液流出。黄白色油状汁液干后会变成红色，就是没药。没药是珍贵物质，曾与黄金和香同为三王朝圣时献给婴儿耶稣的礼物。在古代药典中可以找到没药的条目，它和香膏混合后能润泽肌肤与强化指甲，涂抹在局部，能消炎与愈合伤口。

2 这是作家珍·拉罗科（Jean de La Roque）所写的《阿拉伯快乐之旅》（Voyage to Arabia the Happy）中的一段。

3 宰比德：摩卡港附近的村庄，是代数的诞生地。

04 咖啡与卡特草

伊斯兰教祭司不满清真寺空荡荡，

咖啡馆却挤满了人。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咖啡的邪恶姐妹

我搭车抵达也门首都萨那（Sana'a）时，已经将近午夜 12 点。我对于自己能活下来感到非常庆幸。有一张小纸片被风吹到空旷的广场，上面印着“万岁”。这时车子也停下来了。

司机年幼的儿子问我：“睡觉吗？”他指着街上唯一亮着灯的一户人家。

“是旅馆吗？”我问。男孩点点头。

男孩的父亲戴着有方格图案的阿拉伯头巾，往我这边靠过来，再次向我强调也门确实是首屈一指的观光点。“是的！”我说，然后把车费交给他。司机对我竖起大拇指，接着就在黑夜中轰轰地开走了。

我开始爬上旅馆的楼梯。也门真是最棒的地方吗？虽然我对司机表示了强烈的认同，可内心却不是很肯定。事实上我对也门完全不了解，因为我在埃塞俄比亚找到的旅游书已有九年没更新了。那本书里说也门是伊斯兰国家中国际关系最差的，当地人都是毒瘾者，首都萨那则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建筑物。当我在楼梯间转弯时，瞧见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男孩从二楼往下盯着我看。那个男孩手中拿着一根蜡烛，另一手则拿着一捆树枝。我们在谈价钱时，男孩一直咀嚼树枝上的嫩芽——卡特草。男孩发现我看着那片叶子，便伸手给了我一片，但我没接受。他带我经过长廊走到我的房间。房间还可以，我单击开关试试，可是没有电源。

“灯？”我指着天花板。

男孩敞开双臂望着天空说：“Bismallah。”

我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但愿阿拉许可。”真是的！把男孩打发走之后，我坐下来回顾这一天的经过：算是很不错的开始！离开夏狄利的墓地之后，我在摩卡港的主要道路上找到正等着要离开的一辆旅行车。当时车内已有 11 人，还剩下一个位子。

“我们走！”司机用英语大喊，我也在后座坐下，可是他接着说，“把那些山羊带过来。跟这个美国人放在一起。”

我瞪大眼睛一看，哇！有六只山羊！司机大笑一声，然后把车门关上。

“哈哈！”他大声嚷着，“开玩笑的啦！”

很不幸，他估计的六小时车程也是错误的。整趟路程共花了超过 12 个小时。一路上我现场证明了也门最重要的社交礼仪：卡特草的食用。

“这是发生在也门的最不幸的事情，”一位叫做葛拉尔的乘客对我说，“比英国还惨。”

“比英国还惨？真叫人难以置信。”我回答。

我先前已经从埃塞俄比亚获得信息，可是现在听曾住过欧洲和麦加的葛拉尔说，有太多也门人沉迷于嚼食卡特草而导致全国经济衰退，因此卡特草有可能遭到政府禁止，虽然也门本身是出产这种叶子的国家。

“也门人从下午开始咀嚼卡特草。人们在午饭后咀嚼一小时后才会回去工作，之后一小时会延长为三小时。当你咀嚼一下午的卡特草之后，就不要再想回到工作岗位了，尤其是政府官员。也有人因为前一天都在嚼食卡特草，把精神与体力都耗损光了，根本就不想工作，一心只想嚼卡特草。每天早上十点，他们会赶去市场，确保可以买到顶级的卡特草，买后开始嚼，如此一天下来当然一事无成。”

我们的车子经过雄伟群山之间，以及山崖顶端的村庄和城堡。在也门南端的塔伊兹（Taiz）和伊卜（Ibb）交界的纳斯穆莱得山（Nasmurade，今名 Nakil Sumara），传说 800 多年前咖啡最初就是种植在此地，所以这座山又叫作咖啡山。也门人曾告诉欧洲人，咖啡只能生长在纳斯穆莱得山，根据英国旅人约翰·乔丹（John Jourdain）于 1616 年的记载：“这是阿拉伯境内海拔最高的山脉，山顶上设有两座堡垒，以便保护他们最珍贵的咖啡安全运往开罗。”

不过现在已不再如此。放眼望去，到处是成群的山脉，有些山脉已经坐落在那里非常久，甚至在耶稣基督降临前就有。此时此刻山上除了卡特草，什么也没长。这个悠久的历史显示了咖啡豆和卡特草在历史上的关系。事实上，有些人认为夏狄利调制出的咖啡，就是卡特草煮成的茶，另一位苏非派教徒达巴尼则是以咖啡豆代替，因为他居住的亚丁并没有卡特草。这两种物品都是兴奋剂，但经常被视为咖啡的邪恶姐妹——卡特草也是一种麻醉剂。因为它的特殊性质，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七类毒

品中，它就独占一类。美国政府将它与海洛因归为同样危险的毒品。

靠近伊卜的地区被公认为也门生产卡特草最好的地区，品质仅次于哈拉城的叶子。在马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抱着一堆卡特草的小男孩。我们的司机每见到一个就停下来向他们购买。葛拉尔为我介绍各种卡特草，有一种咀嚼时会有可怕的爬虫在皮肤上爬行的感觉，还有一种是以香蕉叶包住一束嫩芽，此外，据说生长在坟墓上的，会使人产生幻觉。

葛拉尔曾在迪拜当过银行雇员，他对我说，我们的司机今天大约赚进了1200里亚尔，可是他至少花了800里亚尔购买卡特草。他还说，许多人每个月赚的钱有1/3都花在这上面。我发现每个村庄的市场都有卖卡特草的摊位，而且摊位面积大约是其他摊位的两倍。

“噢，对了，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会自己种植卡特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卡特草的新鲜。”葛拉尔说。

到了傍晚，除了我和一个正在歌唱《古兰经》的苏丹人，车上其他人都早已沉醉在咀嚼卡特草的梦境中，就连一开始就把卡特草批评得一文不值的葛拉尔也是。我问他，既然他认为卡特草不好，为何还要嚼呢？他的解释是，因为他打算搬回也门居住，他说：“我不希望其他人把我当成怪人。”

还好已经结束了，我一边想一边爬进被窝。这家旅馆的床垫出奇的舒服。吹熄蜡烛后我又想到，就算也门到处是嚼卡特草的瘾君子又怎样呢？在也门的首都萨那，咖啡豆显然占绝对优势。我闭上眼，念出我唯一知道的一句阿拉伯语，意思是“豆之酒”。

隔天一早，我跑到萨那的市场苏克，也就是阿拉伯的购物中心。萨那有全世界最古老的东西，迷宫一样的中古小巷里到处是蜜枣（还记得“欢迎，来自枣子国的人们！”）、葡萄干、没药、香火、备用胎、枪支、货币兑换商、韩国少女服饰、古龙水、鞋带、男性刮胡水、伊斯兰念珠、水烟筒，以及用老旧锡罐做成的茶壶。当地人有句话：买到你受不了为止。当然市场里也卖咖啡，咖啡色与白色的麻布袋里都装满了咖啡豆。

但是我所经过的每个咖啡摊子都说：喝咖啡？现在是不可能的。他们都叫我隔天再来。我心想，在也门市场怎么会那么难喝到一杯咖啡呢？难道是我的发音不标准？于是我开始以不同的发音对着自己练习，这该死

的词到底有几种念法呢？

萨那城像是小孩在黄金地上堆成的沙堡城市。状似迷宫的道路根本看不到车辆，七层楼高的大型建筑竟是用泥土建造，上头还覆盖着白色胶泥做成的带状雕刻，样式稀奇古怪。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欣赏了好一阵子后才回过神。

突然间，我嗅到一股强烈的味道，它穿梭于市场中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味道之间，是一股烘焙咖啡的香味。我被这无法抗拒的芳香吸引，跟着味道来到一个巨大的中庭，看到一群商人悠闲地守着几百个袋子，袋子里就装着小小黑黑的果实，仔细一看，原来是葡萄干。我立刻冲到市场的主要巷子，重新又跟着咖啡香来到另一个市集，这次是堆积如山的生姜、丁香、小豆蔻和肉桂。我叹了一口气，原来是卖香料的市場。走到这里，我更不可能有机会找到咖啡香味的来源了。

后来我又问了一个商人，不久之后我就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庭，中庭内有三道由鹅卵石筑成的矮墙，和一袋有 50 公斤重的咖啡豆。有位蓄着及腰长胡的男子跷着二郎腿，正在核对一份厚厚的账单。一个小男孩站在门口盯着我。不久，中庭一个角落的门口传来有节奏的微弱轧轧声。我好奇地往里面看，发现两个男子坐在堆到肩膀高的咖啡豆上面，全部的咖啡豆都还没有剥壳。他们把烘焙过的咖啡豆丢进一个大型铁网，以便区分剥好的和还未剥壳的咖啡豆。房间里唯一的文明器具是一台几乎已报废的咖啡烘焙机与一盏灯。

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市场。我脱掉鞋子，坐在门前的石阶上观看两个男子工作，他们脸上都挂着笑容。我向他们表示想要摸摸那些咖啡豆，接着我就把手伸进乌黑发亮的咖啡豆中。当我的手臂伸进咖啡豆堆时，感觉这些咖啡豆的质感很好，而且这种触摸的感觉远比喝了它的感觉还要好。于是我把另一只手也伸进这堆咖啡豆里，一直伸到我的手肘为止。真的比喝咖啡的感觉还要舒服，况且还不用杯子呢！

先前站在门口盯着我的男孩忽然出现在我眼前，他手中拿着三杯还冒着热气的黑色液体。那两个工作中的男子立即将手上的篮子丢在一旁，快乐地将杯子接了过去。男孩最后把第三杯递给我。我拿起杯子，心想，终于可以尝到梦寐以求的咖啡了！尤其是在这个圣地里最神圣的地方，眼前就是堆积如山的咖啡豆，喝着预言者的最爱：接受过三次祝福的伊斯兰豆之酒。但是.....

“茶？”那男孩手指着杯子问我，“你喜欢喝茶吗？”

恶魔的饮料

《圣经》里提到：希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想用难解的问题提问所罗门。跟随她的人很多，还有骆驼驮着香料……希巴女王赠送给所罗门王的香料，是前所未有的珍奇物品。

很可惜，《圣经》里没提到希巴女王给所罗门王的是什么香料。那些香料里必定有乳香和没药，因为希巴王国是也门最早期的王国之一，而这些香料正是这个国家最有名的出口货品。不知道咖啡豆是否也是珍奇物品中的一项？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相信当时的希巴王国应该包括埃塞俄比亚。目前唯一的证据是那晚所罗门王强行带走了女王，也因此有谣言说，咖啡豆其实是一种春药。值得一提的是，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曾提到咖啡与所罗门王的关系，据说希巴女王拜访后不久，所罗门王就利用也门的咖啡豆拯救了一个被瘟疫感染的小镇。

最普遍的说法是，伊斯兰教出现几世纪以后，阿拉伯人才开始饮用咖啡。伊斯兰教的巅峰时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光荣景象。当欧洲的基督徒处在黑暗时代时，伊斯兰教徒则正在研究亚里士多德、发明代数数学，以及创造史上最高雅的文明社会之一。

但谁又在乎这些呢？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徒都是禁酒主义者。因为被禁止品尝葡萄酒的美味，也难怪这个新的社会对咖啡会如此热爱。尤其是神秘的苏非派，他们最先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咖啡。

“胡说！真是荒谬！苏非派！”跟我一起在咖啡馆的伊须玛说话了，他是逊尼派教徒。很显然，他对苏非派嗤之以鼻，甚至对伊斯兰教都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成天只会嚼卡特草。”

萨那是伊斯兰教流亡者的家外之家，城内的咖啡馆里都是伊拉克人、伊朗人、阿富汗人与索马里人，他们都沉溺于外来人士最爱做的事，就是寄生在他们目前所在的国家。伊须玛随着他的父亲在 20 年前来到萨那，现在的他已完全被同化了，甚至在皮带上系着也门双刃弯刀¹，唯一的破绽是他的胡子有些红褐色，还有他一长串的盗窃记录。

我对他说，我对人类如何开始饮用咖啡非常有兴趣。他告诉我一则我没

听过的山羊故事的版本。他说，从前有一个阿富汗牧羊人，他有一群特别活跃的山羊。牧羊人不懂为什么他的山羊会如此活蹦乱跳。有一天，牧羊人发现他最活跃的山羊嘴里总是啃着某种小小的红果实，牧羊人感到好奇就尝了果实，突然全身的疲劳都消失了，而且也开始兴奋。他突然抓住山羊中最漂亮的母山羊，然后……这是卡狄故事的翻版，只是多加了一些限制级内容。

“喔，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食用卡特草后，会把你变成撒旦的崇拜者的原因。”我说。

“不，那是为什么也门人会喝那么多咖啡的原因，只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山羊。”他眨眨眼。

“阿富汗的牧羊人不爱他们的山羊吗？”我开玩笑地说。

“爱，但不是像也门人那种爱法。你可以随便问一个阿富汗人，问他是要英国女孩还是要山羊。他一定会要你去问也门人，而也门人会说：‘要怎么比较呢？我又没有试过英国女孩。’”

“嗯，嗯，嗯！这个我听过了，说点新鲜的吧。”

“你要大麻吗？”

我回绝了。我需要换钱。在萨那这地方，想换钱还真困难，并不是找不到黑市，有一整条街都是带着钱的年轻男孩，坐在人行道上等客人来换钱，一点也不担心有危险。我头痛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是旅行支票。我试过将一张支票换成现金，但经过一番争执之后，支票马上又被退还给我，只因为我在支票背面签了字，使它失去了价值。

伊须玛说他认识一个朋友可以兑换旅行支票，还可以弄到欧洲护照，于是我们去找他的朋友。有一群穿着传统服饰的也门男子蹲在一堆杂物之中，一边数着钞票一边啜饮着茶，满嘴却都是卡特草。比较有钱的沙特阿拉伯客人会趾高气扬地阔步走，两手拉着他们的西装袖口，好让其他人看见他们怀中挂着的沉重而昂贵的金表。我把支票交给一个陌生人，他再把支票传到里面一群人手中，大家争相传着。忽然一阵兴奋爆发了，货币兑换商将支票从一个男子手中抢过去，然后丢到一个箱子里面，却又马上把它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再随手抓了两把钞票，然后将支票和钞票都拿给我，要我在支票上面签字，但没有人要看我的护照。

此时有位男子做手势要我跟他一起坐在地上。我开始数钱，但因为灯光不够亮，我看不清楚钞票的面值。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子点着他的打火机，开始帮我计算总共有多少钱，他不时停下来，跟我们附近的人交谈。接着又有一堆单子从人群中被传送到我这边。这一切过程全都在奇怪的节奏中完成。

钱是搞定了，可是伊须玛的朋友并不知道有关欧洲护照的事情。

“我去问另一个朋友。”伊须玛说完后就走出去“做生意”了。他指的是帮我数钱的那个陌生人。原来他才是护照专家。他可以提供两种国籍的护照：新的希腊护照或旧的德国护照。于是我向他问了护照的价钱。

他耸耸肩说：“随便。你帮我一个忙，我也帮你。”

我还没看清楚这个朋友的长相，但在昏暗的房间里，我能看到的只是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又是阿富汗人。

“帮忙？”我问他，“什么意思？”

原来制造假护照只是他的副业，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偷渡政治流亡者到比较高薪的国家。如果我要护照，就必须帮他做偷渡的工作。我必须飞到法兰克福，中途在迪拜停留。有个难民想要去往德国，他得跟我搭同一班飞机。可是他的机票只到迪拜，所以到迪拜的途中，我需要和他交换登机证，然后我在迪拜下飞机。他在飞机上用我的登机证即可去到德国，也可以避免被查看护照上有没有德国签证。等他到了德国，会把我的机票以及所有的证件销毁，然后他会向德国当局自首，要求被送往收容所。在德国宪法的保护下，他一定会被收留。

“这些都是事实。而且在印度，他确实是难民。”为了让我安心，男子还向我保证。

“所以他想在德国工作？”

“当然！他要养妻子、儿女。”

“好吧！希望我可以帮上忙。你要付我多少钱？”我说。

“300美元。”

我心想，300美元虽不多，但可以拥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护照将会更方便。“还要护照，最好是用法文写的。”

他点点头。

我又多加一句：“你付机票钱。”

“当然！再加一张机票，让你到迪拜后再去想要去的目的地。”

我心想，听起来那么简单，一定有什么不对劲。

“如果我被抓会怎样？”我问。

“会怎样？什么意思？”

“被警察抓到啊！”

“警察？什么警察？犯什么罪？你买机票，你把机票转让给朋友？”他耸耸肩说，“我们有一句话说：‘没有明文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

天啊！这是什么社会。早在16世纪初期，固执的宗教人士就把喝咖啡的行为定为一种罪行，而上面那句话就是爱喝咖啡的人最喜欢的辩论话题。听起来或许荒谬，但我们要记得，咖啡与神秘的苏非派关系非常密切。摩卡港的夏狄利和亚丁的达巴尼都是苏非派人士。苏非派虽然属于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但还是跟其他伊斯兰教派不同。传统的伊斯兰教仪式不使用音乐或舞蹈，但苏非派则两者都有。苏非派是具有特殊异质的宗教，表面上是伊斯兰教，但实际上源自更早的原始宗教。有许多人曾尝试记录和介绍，不过想要了解它的最好方法就是下列这则古老的中东故事：

有一个波斯人、一个土耳其人、一个希腊人和一个阿拉伯人正在讨论该如何花掉他们的最后一个银币。希腊人大叫：“我会用来买酒。”波斯人抢着说：“我要买葡萄酒。”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也都用着自己的语言说要买酒。他们吵到快要大打出手，这时有位苏非派教徒正好走过，他听了他们的争执后，要求他们把那个银币交给他。于是他们把钱交给苏非派教徒，过不久，他带着一堆闪闪发亮的葡萄回来。

“我的酒！”希腊人大叫。“不，那是我的！”波斯人也大声叫着，而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也是同样的反应。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自己要的东西，只是以更高级的形式。

这个寓言中所说的苏非派寻找的是神赐美酒的最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同时也暗示苏非派偶尔喜欢喝酒。基本上，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嬉皮士。所以大约在 1480年，当他们在圣洁的麦加举行仪式，率先使用咖啡时，造成的反弹就像在罗马教廷梵蒂冈抽大麻一样。麦加第一次对咖啡施压是在 1511年 6月 20日。麦加的宗教警察局长，一个叫贝戈的马穆鲁克穆斯林发现，麦加的大清真寺旁有一群人在深夜里喝某种饮料，好像是在喝酒一样。当他上前调查时，那些人马上把灯笼熄灭。贝戈不久后得知那些人喝的饮料在一般的酒馆都可以买到。

隔天，他召集宗教学者会议，目的是要讨论这种新的饮料是否可以在伊斯兰法律下贩卖。反对咖啡的理由有三：一、它会造成醉意，所以跟喝酒是一样的，应该不被容许；二、泛神教在祷告前会用手传递一杯咖啡，这种动作跟喝酒有密切关联；三、要把咖啡豆烘焙到“氧化”的程度，是《古兰经》禁止的行为，伊斯兰教的教规特别严禁含有酒精成分的发酵饮品。咖啡并不是发酵过的水果饮料，所以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宣称咖啡是违法的，因为它会“刺激神经”。他们甚至带了一壶咖啡给评判人亲自尝尝。但这些证据对评判人来说似乎太简单了，他们当然不肯品尝那壶可怕的“酒”。

贝戈事前料到会有这种结果，因此他带了两位医生证明咖啡的恐怖。原来这两位医生与贝戈早就说好，如果能取缔咖啡，事后可以得到“很高的荣耀与奖赏”，因此那两位医生做了虚假报告，证明喝咖啡会给人带来精神变化。这个结果迫使咖啡被归类为酒的一种。其他在场人士也作证，说喝了咖啡判断力会减弱。有一个傻瓜还说他分辨不出咖啡与酒的不同，结果马上被拖去鞭打，因为那表示他尝过酒。

咖啡是否合法，正方所用的理论就是阿富汗证件伪造者给我的那句话：只要《古兰经》没有明确禁止的东西，就不算是违反神的旨意。当保守派争辩说，穆罕默德是要严禁所有会使人醉的东西时，他们又指出，虽然咖啡会影响心理，可是大蒜也会，况且传统伊斯兰教的说法中，喝醉酒的定义是：“当一个人已分辨不出男人或女人、天堂或地狱的时候。”

其实整个事件是由于政治权谋而安排好的。警察长和两位医师都是马穆鲁克保守派统治同盟的一部分，他们不赞同苏非派的信念，反对宗教有任何心醉神迷的现象，或是跟上帝感应时怀有“醉意”。而苏非派却用咖

啡实践了这种信念。将咖啡从灵媒或祭司手中传递给全场的信徒，就代表咖啡已成为神圣的酒精饮料。在苏非派，还有一个词隐含着宗教执政高层与咖啡之间的密切关系，那就是“marqaha”。这个词的涵义是“不需要伊斯兰教的祭师或清真寺”，这是宗教执政高层所不乐见的。

所以咖啡最后在麦加遭到严禁。一袋又一袋的咖啡豆当街被烧毁，如果有人当场被抓到正在喝咖啡，便会遭到毒打。这条禁令之后曾被推翻，可是到了 1525 年，麦加又再度恢复这条禁令。之后开罗也在 1539 年严格禁止卖咖啡。但每次镇压只会带来更多暴力，直到 17 世纪发生土耳其暴力镇压事件为止。

当然，如果国际刑警组织发现我偷渡人口，我虽然不敢说中古时期的伊斯兰教理论是否有说服力，但应讯时应该是个不错的说辞。

1 是也门男子自幼携带的微弯小刀，代表身强力壮和荣耀，也是阳具的象征。

05 也门咖啡

喝一点咖啡的人，不会下地狱。

——16世纪泛神论神秘教谚语

现代咖啡的前身

从我抵达萨那的第一天到离开为止，找不到咖啡的惨痛经验一直跟随着我。萨那有许多小杂货摊和简陋的小屋子，都是由疯狂的阿拉伯人在看管，可是并没有卖什么特别的咖啡，至少跟我想象中的阿拉伯咖啡不大一样。我以为这里的咖啡会与土耳其咖啡一样又浓又烈，没想到也门的咖啡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咖啡味道很强烈，但特色是丁香、小豆蔻、糖，以及与开水混合后的淡淡滋味。西方人一开始或许会觉得味道太淡，但我已爱上它那清淡的芳香。制作这种咖啡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叫作“粉碎法”，做法是将一汤匙添加过香料和磨成粉的咖啡豆浸泡热水。这种做法一般人比较喜欢用在下午。早上的做法是将咖啡与糖一起放在长柄锅里煮沸，趁它刚煮好时饮用。最后煮出来的饮料跟传统的土耳其咖啡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也反映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土耳其咖啡可以比喻为一个在杯子里握紧的拳头，又浓又黑又苦。也门的咖啡则是一杯金黄色的液体，有少许奇怪的味道，且香甜可口（除非是用于不能加糖的葬礼），一般很少会用牛奶。

也门人喝的不是咖啡，是一种叫作“咖许”（qishr）¹的饮料。这种饮料不是用咖啡豆煮成，而是用它的外壳。这就是也门的传统咖啡。珍·拉罗科曾于1715年写过：“较厉害的人并不是用咖啡豆煮咖啡，他们有另外的方法，就是利用咖啡豆的皮与肉。倘若煮的方法正确，他们就会声称世界上没有比这种饮料更好喝的饮料。”

从埃塞俄比亚的卡提到也门的咖许，这种并行的进化方式不禁使我们怀疑，现代用咖啡豆煮咖啡的方法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是否因为早期使用的咖啡壳太脆弱，不易保存，而且运送也困难，所以无法普及？我觉得咖许无味，如果添加了姜就是玛佐（mazghoul）咖啡，风味还算可以。在西方社会，与玛佐最相似的咖啡要算是德国最难喝的花杯（blümchen kaffee），它之所以获此称呼，是因为淡到可以让你一直看到咖啡杯底的花样。

“可是你一定要喝品质好的咖许。”艾伯拉罕说。他随意地指着面前的一杯饮料，“我儿子刚煮好。现代年轻人已经不会这种方法了。”

我们就在他家客厅，坐在散落一地的软垫上。也门传统的家庭客厅都设在楼上，是专门招待客人的地方，但艾伯拉罕家的客厅却在一楼，还装了卫星电视，因为他最近才把房子改建为旅馆。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造访。他再次描述传统煮咖啡的方法，应该用不同的咖啡壶和咖许，有些苦，有些甜，有些经过长久的熬煮，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混合，做出一杯完美的咖啡。他说，有一个家庭的女人们就是因为制作特殊的咖许而闻名于也门。

我问他是否可以让我与她们见面，他说不可能。可是他知道还有一家咖啡馆的咖许做得不错，不过还是远不及那家人。也算不错了，至少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已经算是很好了。

“你一旦尝过就会知道。”他又告诉我该如何到这家传说中的咖啡馆。结果还是与前两次一样，他画了一张地图，可是没有一次让我看得懂，我还是找不到那地方。

“我看你是永远找不到那地方的。”这是他的结论。

“要不然你带我去。”我乞求他。

“不可能。”他指一下电视机，“今天很忙，明天吧。”

“可否告诉我可以找到的地名？”

他找了一位阿拉伯人讨论。突然，艾伯拉罕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我怎么没想到！我的朋友知道的。你一定要先去找一群老人。”

“什么？”

“早上第一次祈祷过后，你到清真寺附近看看。只要你看到哪里有一群老人在喝东西，哪里就会有最棒的咖许。”

寻找老人，而且又是在清真寺附近，我心想，还算合理，因为可以让信徒在礼拜中保持清醒，所以咖啡就这样在清真寺周围传播开了。

“最好的咖许都是在第一次祈祷过后煮好的。记住，人越老，他喝的咖许就越好喝。”他说。

“第一次祈祷是几点开始？”

“不会太早，大约清晨五点吧。”

清晨五点！值得吗？为什么是礼拜之后呢？如果咖啡是为了让人在聆听神的教诲时保持清醒，为什么是做完礼拜后才饮用呢？有人向我解释，这是对反对咖啡者的最后妥协，至少在也门是这样。有信仰的人要在礼拜过后才能喝咖啡，这样喝下邪恶的刺激饮料之前，神的旨意才会传达到人们尚未被污染的心灵。如果你一定要先喝咖啡，就必须在喝下时，像在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时一样，大喊：“灵魂啊，请躲到我身体某处吧，或暂时离开我的肉体，不被这杯咖啡污染。”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故事，而且早上和下午的咖啡确实有差别。早上的咖啡给人毛发直竖的快感。到了下午，大部分人都在咀嚼卡特草时，也会用粉碎法煮比较淡的咖啡。但多数人还是喝咖啡。

之前的护照计划似乎不执行了。后来才知道我要先飞到斯里兰卡见那个难民，到了那里，一位拥有旅行社的阿富汗人会为我提供到迪拜的机票。我开始了解这个计划执行的过程，看起来像是要我飞到一个有许多恐怖分子的城市等待几周，等到那个人的亲戚，或朋友的亲戚，或者是他朋友的亲戚的朋友的亲戚买到最便宜的机票才可以出发。

“我一定要离开这地方，不然我一定会疯掉！”古拉柏说。

古拉柏是伊拉克考古学教授，为了逃避兵役跑到也门。我是在吃豆子三明治早餐时认识他的。他像我见过的多数难民一样，非常厌恶也门。他认为也门人非常没礼貌，而且很肮脏，食物也很难吃，讲话时废话一堆。可是我却觉得大部分也门人都很和善，食物也蛮好吃的，环境还算安全。我可以在没有路灯的弯曲小巷子游走到三更半夜也不会害怕（或许与这里的罪犯仍会被处以死刑有关）。

海湾战争过后，也门是少数依旧继续办理伊拉克签证的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罗马尼亚和利比亚。对于利比亚，古拉柏还可以接受，因为那里还有很多石油开采工程，仍然有很多工作机会，只是没有飞往那里的国际航班，因为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拒绝配合调查洛克比空难爆炸事件。古拉柏被迫在到也门、去罗马尼亚，或者从军打仗中三选一。最后他选择了也门，因为听说这里的苏丹大使馆有时会发给伊拉克人过境签证。如此一来，古拉柏便可以先到苏丹的首都喀土穆，然后徒步进入利比亚

境内，即使一路上都是战乱后的废墟，因为这一条路是爱好和平的伊拉克人最喜欢走的路线。他认识的几位学术界人士，在这条路上神秘失踪了。

他的处境确实为难，我试着安慰他说苏丹人非常好客，还拿我的旅行指南给他看上面这样写的那一页，但无法安慰他，他只是不断地说如果不帮他离开，他就会发疯。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已经变成提供安置国际难民服务的专家了。

“这里脏到我不敢相信，如果要我留下来我会疯掉。”他不断地向我唠叨。

不久，我终于摆脱了他。一如往常，今晚还是没有电，只有烛光继续亮着。我看见银器匠正在擦拭弯曲的小刀，又看见一个男人正在衔接水管。到处都是没药与香火的味道。我在狭窄的小巷里闲晃，回想一路上迫切追寻咖啡的旅程。在摩卡港或阿法奇湾（Bay al-Faqih）被买进之后，大部分咖啡豆会被用船运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市。可是有些人认为，最早的一批货物会经由古老的香料之路，再穿过鲁卜哈利沙漠的空旷之地，最后才能到达麦加。在这里，我需要做一个决定，从上面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突然我听到一阵兴奋的喊叫声，原来电又来了。萨那旧区的每扇窗都是彩色的镶嵌玻璃，每栋楼最多有 40 扇窗。因为平时没有电，所以当电来时，这些彩色的窗户在夜晚显得特别美丽。我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刚好走到城内一座开放式的花园。广阔的星空在我面前展开，我所见的每一处地方都是诡异的泥造大厦，窗户都像宝石般闪烁着，有绿的、红的、蓝的，还有琥珀色的。此时，巷子里传出人们感谢的声音。

最后我决定走香料路线，经过空旷的沙漠。

但隔天，当我在萨那的中央邮局收到一张明信片时，我的计划泡汤了。明信片是杨吉寄来的，他是我在加尔各答认识的一个走私艺术赝品的家伙。那张明信片上面写着：“记住！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巴黎见！”

我叹了一口气。看来我们之间的“生意”还是有效的，除非我假装没收到这张明信片，我想这或许会是最好的方法。杨吉，杨吉，杨吉，我心里想着，并将那张明信片丢进垃圾桶。真该死！尽管他之前曾编过许多废话，而且还曾带给我许多麻烦，最后我还是会对这个家伙心软的。

[1](#) 咖许，是阿拉伯文，指水果果肉。一般认为，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的咖许是把晒干的果肉和咖啡豆外壳用水煮来喝。后又衍生为加入姜汁的咖啡。

06 咖啡在印度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爱喝咖啡的西方暴力社会，
以及爱好和平、喜欢喝茶的东方世界，
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咖啡带给人类的害处。

——印度营养小册子

加尔各答的咖啡馆

我第一次遇见杨吉是四个月以前的事，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老咖啡馆。我记得清清楚楚：包着白色头巾的服务生、社会主义海报、天花板上的风扇上一层厚厚的污垢。有一面墙上挂着诗人泰戈尔的画像，因为泰戈尔 50 年前获得诺贝尔奖时，曾经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他是这家咖啡馆的学生客人的模范。蓄着胡子的肥胖男学生在这里吃着印度咖喱、喝着茶，女学生穿着印度传统服饰，搭配牛仔裤。这些学生都是加尔各答的新潮流派。我只看见他们的嘴角在动，他们的脸孔却因天花板上旋转的风扇而显得诡异。

杨吉坐在咖啡馆角落的一张桌子旁，是个面目清秀的印度男子，有一对发光的眼睛和微薄的双唇，以及骆驼色的皮肤，还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他卷起一支香烟，叹了一口气。他的行为正是大麻毒瘾者的模样，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所以不明白他为什么可以一直盯着未点燃的香烟，而且像是很有兴趣地盯 45 分钟。没有人过去跟他坐，也没人和他说话。我离开时，他突然抬起头，给我一个想睡的微笑。我发觉他有点斗鸡眼。

当时我正在帮特蕾莎修女照顾饥饿疾苦的人，曾有过前一天喂食一个消瘦的人，隔天又得抬他的尸体出去的经历。

咖啡馆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很多人不了解我为什么那么喜爱加尔各答，其实我是把加尔各答想象成约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巴黎：便宜、脏乱，一堆胡言乱语、身体脏兮兮的人。就像兴盛时期的巴黎一样，加尔各答是印度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而这间咖啡馆可以说是加尔各答的中心点。我认识杨吉那天，连阳台上的座位都是满满的人，馆内吵到连想点一杯咖啡都听不见。印度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一位经常在此出没，连印度的咖啡工会总部都设在加尔各答。咖啡馆老板似乎重视政治甚于卖咖啡，咖啡馆里随时挤满客人。当我下次又来咖啡馆报到时，里面还是一如往常的拥挤。杨吉照常独自一人坐在角落。他看到我，对我挥挥手。

“坐下吧，其他桌子都已经满了。”他说。

他问我对加尔各答的感觉。我说很脏，但有些地方很有趣。

他同意我的看法，说：“真的很脏！孟加拉人的话也太多了，一直讲，一直讲。”他说话时有一种懒散的缓慢腔调，眼睛总是半睁着。

“你不是孟加拉人？”我问他。

“不，我是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人。”¹

“那就奇怪了，你看起来很像孟加拉人。”

“是啊，”表情昏沉的他又以懒散的语气回答，“我看起来像孟加拉人。”我不太懂他的意思。接着他又指向墙上的一幅画像，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那是泰戈尔的画像。

我说我知道，还告诉杨吉这家咖啡馆以前是反英军党在加尔各答分党的总支部，他们是以暴力制服反对人士的派系，领导人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他追随纳粹党希特勒。我还提到，咖啡馆经理不肯向我说这部分的历史，除非我捐一些“慈善基金”，可是他却又全盘否认这整件事，他说：“咖啡馆里没有政治，只有艺术。”

“什么慈善基金？会做慈善才怪！”杨吉回答，“这里的经理人都是骗子，孟加拉人都只谈政治，什么事情都跟政治有关。政治！政治！政治！”

“你不喜欢孟加拉人吗？”

“喔，不是，他们人还好。”他说。他好像很累的样子，全身软趴趴地靠着椅背，“我只是对政治没兴趣，不喜欢一堆狗屁话，我只喜欢钱。”

“哦，那的确是很有用的东西。”

“哈！很有用！”他懒散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喜欢你，我觉得你很好笑。”他转过来对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变得很有钱呢？”他的气息有一股又甜又辣的气味。

咖啡馆一开始与宗教关系密切，后来逐渐转型为人们谈论策略与计谋的地方。大多数的阴谋都是政治性的。但杨吉的这个计划，却有一段与英国咖啡馆的历史有关。很久以前，大约是在 1680 年，欧洲人认为咖啡是会吸干脑细胞的坏东西，可是当时伦敦已是咖啡的世界中心。其中有

一间咖啡馆名为“劳埃德咖啡馆”（Lloyd's Coffee House），为了了解海上的最新消息，船长与商人会经常聚集于此。有一天，劳埃德咖啡馆的几个常客打赌哪些船只可以安全抵达海港，如果赌的那艘船真的到了，那么船家就算输，反过来，如果他的船沉了，咖啡馆的老板就得赔。根据保险历史学家海恩斯（F. H. Haines）的说法：“像劳埃德咖啡馆这种地方，就是要让人发挥创意与新思考的地方。”

在劳埃德咖啡馆内发生的行为，并不是第一次与保险有关的事情，但却是第一个现代化的例子。对海运商人来说，只要风险没有了，海运自然会兴盛，不久它就为英国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帝国。一群进出耶路撒冷咖啡馆的人干得相当出色，他们的东印度公司很快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公司。

尽管如此，劳埃德咖啡馆的生意却并未因此越做越大。来来去去的商船与商人开始在咖啡馆里设置一间间小办公室，最后使咖啡馆停止出售咖啡，转而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

杨吉的生意计划显然简单些了，他有一位朋友住在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Rajasthan），正在仿冒即将在巴黎展览的莫戈尔（Mogol）古董画。他们的困难在于这些作品出境时需要填写正式文件，而这也表示这些仿冒的古董画将会被扣很重的税。外地人若是将这些画作为礼物带出去，则可扣除较少的税。如果我愿意为他们赶在展览前将仿冒的古董画带到巴黎，他们会付我 3000 美元。

听起来好像很完美，走私仿冒艺术品的做法也很聪明和狡猾。说实在的，我也挺喜欢拉贾斯坦的迷你画，上头通常有金叶片与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动物。只是杨吉所说的每句话，我都不敢相信。

当他讲完计划之后，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去巴黎？”

“大概二月份吧。”我说。

他兴奋地拍了下桌子，说：“太好了！刚好来得及。”我心想，还真巧啊。

他问我：“你答应帮我们了吗？我的朋友一定会感激你。”

“噢，这是违法的！”

“是的，但也不全是。如果这些画都是属于你的，你就有权利把它卖掉吧？”

“表示我已经买下这些画，也表示我必须付钱给你？”

杨吉打消了这个念头，说：“不，不！我不知道！但或许他们会要你付一些保险金，我想那是合理的，因为那些画都在你手里。”他给我一个充满喜悦的笑容，然后说，“就像小宝物一样。你什么时候可以抵达拉贾斯坦？”

“大约 11 月左右。”

他将某间咖啡馆的地址给我，地点在俗称“粉绿城”的斋浦尔（Jaipur），然后说：“先到这个地方找我，到时候你再决定是不是要做这笔交易。”

我本来没想过要去斋浦尔，但我并不想破坏这项听起来好像很完美的计划。而且一想到要在国际上走私艺术品，就觉得很刺激，况且 3000 美元会很有用。

“我不知道……”我有所保留地回答。

他说：“没关系！”然后就把那个地址给我。“随便你。如果你去斋浦尔，请来找我，你一定会喜欢斋浦尔的。”他压低声音说，“粉绿城！”

很多人喝咖啡时并不会联想到印度。印度既没有秩序，又很脏乱，更不用说迷信了。印度是喜欢喝茶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咖啡树种植在自己国土的非伊斯兰教国家。这要感谢印度苏非派信徒巴巴·布丹（Baba Budan），“巴巴”是父亲的意思。在很久以前，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巴巴曾经长途旅行到麦加，在那里他见过苏非派信徒和他们的咖啡仪式，于是决定把咖啡树带回家乡，与印度苏非派信徒分享。

在那时，凡是把咖啡种子带出境的只有死罪一条。当时巴巴还参加了成为麦加人的仪式，曾绕了神圣的天房（Holy Kabala）七次，而且亲吻了黑石，喝了渗渗泉（Zam Zam）的泉水。最后，他才冒险把七颗青咖啡豆贴在自己的肚皮上，偷偷带回印度，再将七颗青咖啡豆种在离迈索尔（Mysore）不远的昌德拉吉里山上。这几颗咖啡种子已经开创了现在年产 20 万吨咖啡的巨大产业，那些种子也让荷兰船长阿德里安·范·奥默

伦（ Captain Adrian van Ommeren）于 1696年到印度尼西亚创立了当地最大的咖啡种植场。

○

因为我想多了解巴巴的事，所以我前往他在迈索尔附近一座山上的家乡。这趟旅程共 1000多英里，我前后搭了五天火车。越往南走，我越发现南北的确有差异。北部人喝茶，南部人喝咖啡；北部的火车站脏乱不堪，又有尿骚味，到处是流浪汉与乞丐，可是越到南方，乞丐越少，车站也干净，就连火车有时还会准时到达或出发。

火车上的服务方式也透露了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现代化的趋势。卖茶与咖啡的小贩以前是用小瓦杯装饮料卖给客人，用完之后便把它压碎，这样不但卫生、环保，而且还很有趣。但雀巢咖啡引进后也带来了塑料杯，逐渐取代了小瓦杯。我问一个小贩，如果全印度火车上的 30亿顾客都使用塑料杯，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有乱丢垃圾的问题？

“问题？绝对不会有问题！”他指着一个乞丐，他正把地上的杯子捡进一个脏兮兮的袋子。原本认为塑料杯很干净的我，顿时失去了这种感觉。“你看！”小贩得意地说，“印度人是很环保的！”

极品咖啡：猴子与猫的粪便

迈索尔是个凉爽的城市，宽敞的路上没什么车。我们简直爱死了（我说“我们”，是因为当时我跟女友同行，但她不想出现在书里）。不久，我便听到一堆有关巴巴的传闻。有人说，巴巴是伊斯兰教圣人，也有人说他是印度神，又说他因为慷慨而闻名，还说他把宠物老虎训练成奶牛，有些人说他有一群摘咖啡豆的猴子，还有一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大学？老虎？真是荒谬！只在奇克马加卢尔（Chickmagalur）有一座庙。老实告诉你，那里是个见不得人的地方，你最好不要去。”加特吉先生说。

我在迈索尔咖啡馆认识了加特吉，他看起来像是一只有学问的鹦鹉，似乎也是可以信赖的人。根据他的说法，附近约 200 英里有巴巴布丹的神龛。因为这里是印度，所以一切都会变得复杂，因为这座巴巴的神龛是给穆斯林朝拜的。在同一个地方，有个山洞也是印度神塔特瑞亚教的圣地（塔特瑞亚是神明，据说他进山洞后会在千禧年复出）。

“我跟你说，这是印度人的耻辱，我恳求你不要去。”加特吉说。

原来巴巴有个习惯，在河边洗澡后会将自己的衣服挂在树枝留给乞丐，这个习惯也成为信徒的传统，延续至今。只是因为时代变迁，现在做这种事的人留下破衣裳，即使没钱的乞丐都不想要。所以现在附近的林子里时常挂满脏衣服，成了苍蝇聚集之地。

“我有一篇报纸的剪报，是关于这里脏乱的问题。”他从大公文包里拿出剪报说，“你看看，我朋友写信到报社，呼吁政府要重新矫正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这篇剪报强调“当权者应该将神圣之地整理干净”，将它设置为官方景点。

“所以这是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吗？”我问。

“也许对许多人来说无关紧要，可是巴巴是伟大的圣人。”

加特吉告诉我，他以前曾经在一个叫史瑞凡奴特（Shrevenoot）的地方做过咖啡的生意。“那是顶级咖啡。你知道卡尔纳塔卡（Karna taka）出产世界上最好的咖啡豆吧？”

我很有礼貌地说：“我听过，可是我觉得这里的咖啡牛奶味有点浓。”

“牛奶又是另外一回事。”

关于这点我没继续追问下去，我倒想问以前听说的传说：“你知道有关巴巴与老虎的事吗？”

“那是神话故事。”

“那些猴子的故事也是吗？”

“我不知道什么猴子。”

“你没听说巴巴曾经训练猴子帮他摘咖啡豆？”

“那就神奇了！”加特吉喝了口茶，继续说，“不过在史瑞凡奴特，确实有摘咖啡豆的猴子。”

我高兴地笑了，继续问：“你是说真的有猴子被训练来摘咖啡豆？”

“没有！它们没有受过训练，不过是自然现象罢了。猴子偶尔也摘咖啡豆吃，这就是猴子咖啡的由来，你听说过吧？”

事实上，我以前也曾读过有关这类的记载。猴子咖啡是在 19 世纪才出现的产品，据说那是世上最美好的咖啡。

“原来真有这种东西啊？”我问。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呀！我读过报道，某些国家的猴子咖啡是山珍美味。”

“没错！类似的报道我也读过。他们说，因为猴子只挑最好、最熟的咖啡豆吃，对吧？”

“有些人是这么说，但有人认为是猴子的肠子里引起的化学反应。”

“肠子？”

“是的。猴子吃下这些咖啡豆以后，会经过消化系统，而这就是所谓的猴子咖啡。”

“你是说那是猴子的粪便？”

“我说过，这里没人喝那种东西，因为那些猴子不干净。”

他皱着鼻子：“可是猴子都吃最好的咖啡豆，确实给史瑞凡奴特造成很大的困扰。”

对于这番话，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直到我回美国多年后才发现，猴子咖啡已成为政府登记的咖啡之一。但它不是来自印度的猴子，而是印度尼西亚的麝香猫²，一种树上的夜行动物，它们以一种含有天然酒精的树汁与新鲜的咖啡果实为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麝香猫的肠子会分泌出某种特别的消化汁液（或许是它们食用天然酒精的习惯），还是它们只挑食肥美多汁的咖啡果子，从麝香猫的粪便里可以提取出全世界最珍贵的咖啡。现在这些珍贵的咖啡大部分销到日本，美国的蒙塔纳斯公司称这种咖啡是麝香猫咖啡（Kopi Luwak），每磅约卖 300 美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咖啡。另有一家“渡鸦咖啡公司”，1/4 磅卖 75 美元，还赠送一件印有正在拉屎的麝香猫的 T 恤，上面写着：“到最后一滴都还是美味可口。”

姑且不谈这种美味令人半信半疑的猴子咖啡，我喝过最难喝的咖啡应该是印度咖啡。印度调制咖啡的方式不是新鲜过滤，而是用速溶的“咖啡薄片”加上牛奶、糖，与肉豆蔻一起煮到沸腾。煮出来的咖啡很像热腾腾、甜得发腻的奶昔，这样煮出的咖啡不但难喝，而且不合逻辑。全球的热带美食都不用乳制品，但在印度却大受欢迎。我不了解为什么印度的烹饪文化里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到了焦特布尔（Jodhpur）之后终于得到了答案。

“过来和我喝一杯吧。”我听到有声音在叫我。

我没有注意到高速公路旁有一间小木屋。

“来吧！喝茶！”门廊坐着一个男子对我招手，叫我过去坐在他旁边喝一杯。

我问：“多少钱？”

“免费！过来，过来坐坐！”他指着脚边一个小凳子说，“这个给你坐。”

他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胖胖的，而且留着长长的胡子。我坐下来。他说家中堆着 83 个装满水的铁罐子：“就算再热，铁罐子还是可以保持水的冰凉。”他还说，这是他的责任，是他爸爸传给他的，要他帮助每个经过这里的陌生人解渴，免费提供水给他们喝。

“其实人类只需要三种东西就可以过活了，就是空气、水与食物。神是不是很好呢？最重要的是空气，神已经免费提供空气给我们了。”

当天的记忆对我而言，很不真实。我记得在他胡子间穿梭的苍蝇，一会儿从他的衣服爬上爬下，一会儿又飞到我的杯口。我还记得当时的脏乱，杯子到处是乌黑的细缝，摸起来黏黏的。虽然很脏，但我还是喝了。之后那个男子向我提到克利须纳神（Lord Krishna）。

“我们就是为第三项必需品——食物而奔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牙齿是扁的。”他对我笑一下，然后继续说，“你看，所以我们不是肉食者，应该学习克利须纳神，跟他一样吃大自然给我们的蔬菜与水果，以及喝牛奶。”

克利须纳是喜好快乐与美食的神，尤其是牛奶、奶酪或甜奶油。小时候他经常一次喝 15 加仑奶酪，长大后，他开始以冗长且押韵的传道方式宣传博爱。但是乳牛对他来说还是具有重大意义。他教导世人，牛是神圣的动物，它们的性情最温顺；它们的乳汁充满维生素，如果精心处理，又可以将牛奶变成奶油、奶酪或芝士，它们的排泄物晒干后可以当作煮饭的燃料。简单地说，牛的产品都是好东西的源泉，只要是牛排出来、流出来或滴出来的，对健康与生命都是很好的东西。

我终于了解印度咖啡了。其实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神圣的饮料，基督教有红酒，佛教有茶（传说是来自悉达多的眼睫毛），伊斯兰教是咖啡，而印度教则是牛乳。之前有人批评煮咖啡的人将水加入咖啡；他们要在咖啡中加入大量奶酪；当我要一杯不加牛奶的黑咖啡时，小贩都会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这些我之前不懂的事，现在总算知道为什么了。

外地人来到印度都可以体会人生的道理，这就是我的人生道理，而这位胖胖的男子就是我的精神导师。

我说：“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会在咖啡里放进那么多牛奶的原因。是吧？巴巴。”

他不满地用舌头发发出嗒嗒声，然后说：“是啊，孩子。但是喝茶就好了，咖啡是苦的，而且会让你的肠胃不舒服。”

[1](#) 喜马偕尔邦，印度的 28 个邦之一。

[2](#) 印度尼西亚人认为麝香猫会在直肠附近的汗腺排出麝香，Kopi 即是印度尼西亚文咖啡的意思，Luwak 则指麝香猫。

07 守信用的骗子

他与那些原住民生活很久了，自己也开始“土著化”，但有头脑的人当然不会轻易相信。

——约尔·赛斯小姐（Miss Youghal Sais）

咖啡杯外的故事

1886年，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开始使用“土著化”（fantee）¹这个词，那时土著化指的是英国人穿睡衣出门。我开始土著化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在焦特布尔得到的“启示”。第二个征兆是我开始有了欲望，突然想买一条紫色宽松长裤。这种长裤在印度到处可见，虽然我心里抗拒买长裤的冲动，但最后还是是在印度比卡内尔（Bikaner）买了一件。

我没有理由做出如此异常的购物行为，只能解释为常带我买衣服的女友已经回美国了，我又因为生病而瘦到只剩身前的影子。我掉了 20 公斤，几乎是正常体重的 1/3，因此感到身心憔悴。这种情况对于初到此地的旅客是平常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无宗教信仰的西方人来到印度后会开始信佛的原因。

幸好我的改变只在服饰上。当我穿着鲜艳的裤子、配上肮脏的凉鞋和已变形的草帽走进斋浦尔时，我自认还赶得上流行。

杨吉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条裤子不错，你现在够酷了！”

○

他介绍我认识一位满脸粉刺的锡克教徒哈皮，之后又带我经过一处迷宫似的小巷，走到一扇两英尺高的小门前。我们爬进去后发现那里是个长形的空房间，房间里有扇矮小的门，我们钻进小门，就看到他朋友的画室。这个画室没有窗户，到处摆满了拉贾斯坦微型画，画着会说话的老鼠、象头神像、纯金制造的叶片。我真的非常喜欢，好像在一堆粪中找到了一块红宝石。

之前我提过，这项计划的基本条件是我要把这些“古董画”（仿冒品）带进巴黎，然后转交给一位艺术家展览，这样就可以避免缴纳古董税。

可是这种交易不但啰唆、麻烦还不合逻辑，所以我省下一些细节，像是跟一位做过类似交易的英国旅客见面，或是在猿神庙里的奇异仪式与代表友谊的椰子壳。我也会略过我和一位官员会面，以便让交易顺利过关的经过。

让我直接跳到三天后，我在一家小店为这些画的包裹签一张1200美元信用卡账单的时刻。我签下来的这些画，自己都还没看过，就得将这些包裹寄往巴黎的中央邮局，署名给我自己。

“你一定要在二月时赶到巴黎。我们明天在德里（Delhi）见。”杨吉提醒我。

我在印度最深刻的记忆，包括那天搭乘的人力脚踏车，搬运工人在头上顶着十英尺高的包裹，驴车、牛鸣声、疯狂的三轮车，以及偶尔经过的大象。还有，那天到火车站的路程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我到车站附近时，有一辆载着两名锡克教徒的摩托车，从混乱的交通中骑到我所搭乘的人力脚踏车旁。

“你，你！美国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坐在后座的教徒大吼着。

“我认识你吗？”我大喊回去。因为锡克教徒都戴着规定的头巾，外形都一样，常让我分不清是否曾见过面。

“我们在咖啡馆认识！杨吉的朋友！”我通过杨吉认识了几位锡克教徒。“你有给他钱，对吧？”

一听到钱，我的司机马上转过头看个究竟。

“或许有。”

“很遗憾，但你再也看不到那些钱了。”那个锡克教徒对我喊着，“我之前就想警告你。”

我们两辆车全转向右边，一起停靠在路边。一只扛着整捆棕榈叶的大象声音很大地走过。我尝试抑制想呕吐的冲动。

“谢啦！你不觉得现在太迟了吗？”我吼着。

他耸耸肩，接着说：“他是我的老朋友。”此时有一大群黑黄色的车嗡嗡地从我们身旁开过去。“你给他多少钱？”

“太多了！不要烦我。”我大喊。

他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一笑，就加足油门向马路中央驶去。我随即叫司机

载我到最近的电话中心，试着取消付款。果然不出我所料，当然无法取消。在一阵愤怒中，我撕毁了我的信用卡，很显然，我没有足够的智慧拥有这张信用卡。我在往德里的四小时火车途中，想了上百个计谋，企图拿回这笔钱。可是他们已经让我翻不了身。我无法联络上杨吉，也没办法取消付款。我找不到之前的画室或我曾签账的小店铺，他们带我经过了太多弯弯曲曲的迷宫似的路线。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么蠢。真是白痴！我重复地在脑海中骂自己：笨蛋，笨蛋，笨蛋。此时，车窗外出现了德里郊区的景象：以牛粪覆盖的泥屋，穿着破旧衣服的儿童，一滩又一滩腐臭的黑水。我发现自己投射在窗户上的影子在微笑。哈，我有一个主意。

隔天，我整日都待在咖啡馆等杨吉，我们先前约好在这里碰面。杨吉还没出现，我拿了一本破烂的书——佩勒姆·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的《超级男管家吉夫斯》（Jeeves, Superbutler）翻翻，读到第89页时，发现杨吉已经坐在我对面。

“我就知道可以在这里找到你。”他懒洋洋地对我说。

我犹豫了一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敢进行这样的计划，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从椅子上跳起来。

“杨吉！”我故意装得很生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啦？我迟到是因为车子发生了问题啊！”

“是吗？那你可以跟我解释，为什么昨晚警察到我住的旅馆找我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生气地对他说。

“警察？什么警察？”

“你都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不，不……”他看起来好像自尊受到侮辱的样子。

我编的故事是这样的：我到德里的旅馆报到之后，来了五个警察把我拖到附近的警察局询问。他们整晚都在质问我斋浦尔的“行径”。我在哪里买什么东西？在斋浦尔是否认识锡克教徒？这星期是否从印度寄出了包裹？我还说，他们向我问话问到凌晨两点才结束。

杨吉听了感到非常意外。“你有告诉他们什么吗？”

“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们一直问我有关税金的事。”

“税金？”

我压低声音，小声地说：“是的！还有毒品。”

“毒品？”他睁大眼，“他们为什么会问毒品？”

“我怎么知道？你一定要告诉我，那些包裹里到底有没有藏毒品？”

“没，没有毒品！没有毒品！这太扯了！”他抱怨着说。

我继续对他说：“我一直保护你，什么都没说，但如果那些包裹真藏有毒品……”

“不，不！你有看到……”

“没有。你还记得吗？我没有看到里面的东西。”我突然想到新点子，接着问他，“那些包裹是不是你自己打包的？”

“不是我，是画家的助理打包。”他看起来很沮丧，“难道会是他……可是，不可能的，这太荒唐了。应该没有。没有毒品呀！”

“那些警察一直说什么巴基斯坦的海洛因。”我知道斋浦尔是海洛因的交换站。

“海洛因？”

“有没有是可能别人把毒品藏到里面的？”我故意装成这是假设，“还有，警察是怎么找到我的旅馆的？只有你和哈皮知道我住哪里！”

我继续瞎掰。杨吉看起来很错愕。

“不如这样吧！”我提出下台阶的说辞，“只要没有毒品，应该不会有问题。”我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看着他问：“你发誓里面没有藏毒品？”

“是——是——是的……”

“绝对没有海洛因？”

“没有，什么都没有！”

“那应该没问题了。他们不能证明我做什么，而我也没有提到任何人。”杨吉终于松了口气。接着我打了一个响指，说：“不好了……”

“怎么了？”

“我不是用信用卡付款的吧？”

“是啊，你是用信用卡付款……”

“对了，他们抄了我的信用卡号码。”我皱着眉头，“他们有可能追踪到卖方吗？”

“我不知道……”

“这会出问题喔！”

“可是在这里使用信用卡并没有犯罪啊！”

“话是没错，可是我告诉警方，我在斋浦尔没有购买任何东西，如果他们看到了，会发现我撒谎。”我不安地摇摇头，“如果我是用现金付款，那就好了。”我停顿一会儿，又说：“我想你已经把签账单拿去要钱了吧？”

“没错，今天早上去的。”

“那就没办法了。如果我们可以取回签账单，我就可以给你现金。”

杨吉的耳朵竖起：“现金？”

没多久，他已前往斋浦尔，试图取消信用卡付款。无论是否成功，我们约好后天在这里见面。他离去之前又提出最后建议。

“斯图尔德，我想也许你离开印度会比较好。”他安慰地把手放在我手上，“或许对你会比较安全。”

“不行啊！”我假装很为难，“警方把我的护照拿走了。”

我的计划是要索回签账单，把它撕毁，然后飞离印度。问题是，我身上现金不足，也没有信用卡，根本无法买机票。

接下来两天，我在德里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换外币。有一条路我反复来回走过，路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全身是苍蝇的人。很显然，他即将死去。我曾帮特蕾莎修女做过事，很清楚这一点。但就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什么也没做。我现在在乎的是我的钱。

杨吉约我在康诺特广场（Connaught Place）的一间餐厅见面，这次他准时出现，可是并非一人前来。哈皮也在场，还带来一个我从没有见过、肌肉非常结实的“朋友”。他们说，那张签账单已经拿不回来了，因为钱已经付了，然后开始质问我，想知道警方到底问我什么，以及我被带到哪个警察分局，他们还想知道那些警察穿什么制服。原来杨吉不相信我所说的，所以我的谎言必须更丰富，有时完全凭空想象，有时根据实情加油添醋编造故事。我说，那些警察又来找我，问我更多的问题。为了证明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还特地拿出一张伪造的单子，上面说明警方已经取消我的信用卡付款。

他们一脸错愕。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怎么知道？”我把护照拿出来，“至少他们已经把护照还给我了。”

就这样，我们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去警察局一趟，我说除非有律师陪同，否则不会去。他们则声称他们有律师，我则要求见他。

最后他们终于问完了。再过了一阵，哈皮突然抽出一个信封说：“我们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他从信封中拿出我的签账单。

“就如我所说的，这项付款并没有通过。”我看着杨吉，“难道你不相信我？”杨吉耸耸肩。

“我可以看吗？”我问。

当哈皮将签账单缓缓地交给我时，他们三位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签账

单都在，我只要把它们撕成一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他们又能对我做什么呢？餐馆内有一半的人都在看，包括警卫。他们绝对不敢当众对我动粗。可是，我又犹豫了一下。前一小时我都在说谎，现在又要为撒谎而圆谎，最后只能继续骗下去。我感到眼花缭乱，觉得自己好像病态的嗜赌者，必须一直赌下去。我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把钱赢回来，而是要证明我们之中只有我才是最高明的骗子。

“拿去！”我把那些签账单递给哈皮，“如果你们觉得安全，那就不用吧！我要去洗手间。”

我从洗手间回来时，哈皮与杨吉正在热烈讨论。只看到杨吉猛说“是、是、是”，而哈皮则一直说“不、不、不”。而他们的“朋友”，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只想打断我双腿的凶汉，则没有意见。

我回到座位，杨吉对我说：“我们还有东西要给你看。”他取出那些签账单，然后撕成两半。哈皮则双手抱头呻吟一声。

原来他们还有最新、最好的计划如下：他们将仿造原先购买的画（也就是先前伪造的画），然后寄回给原来计划的主谋，说我们要求退货。等我到了巴黎，我再将原来仿造的“古董画”以最好的价钱卖掉。之后我们三人再平分所得的利润。他们说那些古董画应该可以卖 10000 美元。

这个计划唯一的陷阱就是要花 800 美元仿造古董画，他们可以支付 400 美元，剩下的就由我承担。

我假装同意跟着他们的计划进行，其实心里正想着要怎样跳进下一班离开印度的飞机。但最终我还是给了他们钱。反正，如果他们真的骗我，也是因为我先骗他们，所以我们算是扯平了。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所说的都是真的，没有骗我，我就等于对他们做了很不好的事，正好用这 400 美元确保没有害他们受损失。在印度，这算是一笔不少的钱，况且我对杨吉还是存有一丝感谢，我相信一定是他说服哈皮撕毁那些签账单的。离开印度前，我请他帮我最后一次忙。

“如果只是一场骗局，我不需要赶往巴黎去取那些古董画，请寄这张明信片给我。”我拿给他一张已盖好邮戳，上头有我的名字和也门萨那中央邮局地址的明信片。“到时我不会在国内，也不会给你们造成麻烦。”

1 即“going native”，指在殖民地的欧洲人采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过当地人的生活。

08 土耳其咖啡帝国

咖啡应该像地狱般黝黑，死亡般强烈，爱情般甜美。

——土耳其谚语

旋转舞与咖啡

在萨那收到的明信片就是杨吉寄的。他写信告诉我，我们的“生意”已经按原定计划进行。我必须放弃从古老的香料之路到土耳其的想法，改乘飞机去。

当我飞过阿拉伯半岛时，虽然有足够的理由不用从陆路走，但我还是感到非常愧疚。我原本要走4~10世纪运送咖啡的路线，但坐飞机经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试着想象自己曾是当年的咖啡运输者，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过沙漠，与他们一样承受酷热与饥渴。（服务员，我的可乐能多加点冰吗？）我曾试着寻找以前用来当路标的石头，至今还排在从也门到麦加的路上，还曾想象飞机上的咖啡是纯的黑咖啡，而空姐则是咖啡奴。

飞机降落时，遇上了土耳其十几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雨。下飞机后，我搭火车到科尼亚（Konya）的小镇。约一小时后，我又搭前往市中心的公交车。雨很大，从车上很难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景象，又过了20分钟，我直觉应该下车了。付车费时因语言不通，我干脆翻开皮夹要司机助手自取所需费用。一开始他觉得好笑，但还是拿走了该拿的车费。之后他跳出车外，抓住我的肩膀，轻轻地推我一把。

冰冷的雨下着，行李都被泥土覆盖，但没有人来找我麻烦。土耳其人的礼貌让我惊讶，我本来预期会像电影《午夜快车》（Midnight Express）的剧情，碰到会纠缠旅客的女人，结果碰到的却是很有礼貌的小姐。我记得，当飞机顺利降落在伊兹密尔（Izmir）时，全飞机的人还鼓掌叫好。唯一扫兴的是，机上一位乘客跟我说，科尼亚的旅馆非常少，搞不好会沦落到监狱过夜。

“我的朋友，你要去哪？”

一个身穿皮衣的年轻男子挡住我的路。我向他说我迷路了。他带我到一栋都是尿骚味的老建筑，之后又有人带我到一间有烧柴火的炉灶的房间。那人说要100万里拉。100万？我睡眠惺忪地想了一下，发现那才相当于五美元，心想总比睡监狱好。我在粗硬的羊毛被上躺下，不久就睡着了。

○

无论法国人、荷兰人还是埃塞俄比亚人，都标榜自己是最爱喝咖啡的使者，但我认为土耳其人才是真正会喝咖啡的人。摩卡港的兴盛时期正是由土耳其人控制。当时有一位土耳其大使将咖啡介绍给法国人，后来土耳其士兵又在维也纳的城门丢弃了一袋咖啡，土耳其商人也让亚得里亚海岸（Adriatic Coast）的居民爱上了咖啡。

我来科尼亚的目的是研究苏非派信徒。如果咖啡是也门的苏非派发现的，那么将咖啡带进北非与中东的就是土耳其的苏非派信徒。科尼亚是另一支神秘宗教——梅夫拉纳派（Mevlana）最重要的聚集地，梅夫拉纳派以旋转托钵僧（Whirling Dervishes）闻名，因为他们会在祭拜仪式中享用一壶咖啡，然后在原地旋转一小时，借以达到宗教迷狂的目的。我到科尼亚的那星期，他们刚好举办盛大庆祝活动，叫作“新婚之夜”，这个节日是教派创始人逝世 700 周年的纪念日。

午睡后，对于前晚发生的事我已经没有印象了，隐约记得科尼亚的高原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绿地。我完全没有下车走进旅馆的印象。我在床上发现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一级棒！优质！廉价！阿塔图尔克购物中心。土耳其地毯！”

哦！我记起来了。名片是把我带到旅馆的男孩给的，地毯店就是他们家开的。起床后我决定先去吃午饭。

“嗨！我的朋友！你昨晚睡得如何？”

才走出来，就遇到一个男子。我皱了一下眉头，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昨晚在这里过夜？

“我叫阿穆德，你要到我店里喝杯茶吗？就在附近。”

“哦！是吗……你家开地毯店，是吧？”我问他。

“没错！可是我不推销！因为钱并不是一切！”

“我们的想法真是一致。”我把手放在那男子的肩上，告诉他，“因为你一定要知道，我对买地毯完全没兴趣。”

“当然！没问题！”他试着脱离我的手掌。

我把他抓得更用力：“不，不！我很乐意过去聊聊，喝杯茶。可是我不买地毯喔！”

“是的，是的……”

“我也不买祷告用的地毯。”

“没关系……”

“也不买披肩。”

“放心，我不会卖你披肩！”

“所以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你也清楚我的意思，对吧？”

“是的，是的！不用买披肩，来吧！”

结果我与另一位中年男子一起喝茶，才发现他才是店老板。我们聊了他的生意（很差！），然后又聊到天气（很糟！），他显得有些忧虑，所以我跟他谈到纽约的生活。我对他说，那里的人都会携带枪支，而且很多是吸毒者，吃饭时突然有人闯进抢劫也是常有的事。

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观光客照样去吗？”

“我不会建议啦！纽约实在是个很危险的都市，物价又高。”

这时一个男孩端着茶壶走进来。

他问：“纽约一杯茶要多少钱？”

“300里拉！”我回答，等于 1.25 美元，“你们为什么要喝茶？我还以为土耳其人都喝咖啡。”

“过去可能是啦，可是现在我们都喝茶。这是我们的文化。土耳其现在已经是现代化国家了。”他悲哀地摇摇头。

“没错，这有可能发生。可是你知道吗？据我所知，以前在奥斯曼时

代，妇女的丈夫如果提供的咖啡豆不够多，她可以跟他离婚。你知道这件事吗？”

“咖啡豆？”

“没错，就是……”我用手比一比。

他看起来有些不悦：“我知道，我知道。不过那是我听过最荒谬的事。”说完他就转身不理我。我离开时，他连头都没有抬起来。我问阿穆德，为什么他的老板会对我关于咖啡豆的问题这么反感。

“咖啡豆？”他耸耸肩，“谁知道？噢，我的朋友，请听我说，我发现有一个法国女孩在你旅馆房间。”

“真的吗？”

“是的，我是说真的！你会帮我抓到她吧？”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请你帮我把她抓到，然后带她到我的地毯店好吗？我们一起来抓她！”

“但我会让她知道你在找她，”我很老实地跟他说，“我要去哪儿看旋转托钵僧呢？”

“如果你要买票，必须到 Istadyum。”

“Istadyum？”我问：“那是什么地方？”

“Istadyum！”他又说一遍，并以双手做投篮姿势，“Istadyum！就是体育馆，投篮球的地方。”

我心想，难道旋转托钵僧就是在体育馆的篮球场举行拜神仪式？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给观光客参观的表演，后来才知道这种场地是政府批准唯一可以进行仪式的地方。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将奥斯曼帝国推翻时，旋转托钵僧的仪式就已经被禁止。凯末尔施政后第一件想做的，就是去除所有关于奥斯曼的事情。他重编土耳其语、严禁留胡子，将周末休息日从伊斯兰教的星期五改到星期天。由于旋转托钵僧与奥斯曼帝国有密切关系，凯末尔就禁止他们的拜神仪式，而且限制他们在科尼亚只能举行一年一次的“民族舞蹈节”。

知道这件事后，接下来在旋转托钵僧博物馆前发生的事，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时有一位戴着黑面纱的老妇人跪在博物馆前祈祷赞美神，不久后有两位警卫过来把她拉起，经过一番争执后，他们让她进入博物馆，有一位便衣警卫一路跟随她，不时拉扯她的面纱或对她叱责，最后那位老妇人用力把一样东西塞入警卫手里，警卫就走开了。我瞥见那个东西是土耳其货币。

我看到一群人在一个装饰华丽的棺木前朝拜，棺木的一端摆着一条长四英尺的头巾。头巾就是这个门派的创始人梅乌拉那·杰拉莱丁·鲁米（Mevlana Celealeddin-i Rumi）所有。在西方社会，我们称他是诗人鲁米。头巾与装着他遗体的棺木被认为具有神奇的力量。这座博物馆其实是清真寺，是土耳其最神圣的地方之一，要朝拜的人必须用钱收买那里的警卫，那些警卫是为了防止其他宗教活动而被派遣到那里站岗的。

这些都是很敏感的话题，尤其在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右派持续扩张的时期。那晚我去参观他们的“民族舞蹈”演出，目录上写着奥斯曼帝国被推翻后，凯末尔来拜访鲁米的墓，并宣告：“在墓穴里的大量工艺品，需要一座博物馆珍藏。”目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个宗教被禁止，或是被禁之后的紧张气氛。要去观看这场表演的人都会被搜身，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携带武器入场闹事。

我不清楚美国篮球是否在土耳其受欢迎，但在那晚的场地简直像是美国篮球场，连天花板上都挂着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旗帜，唯一的差别就是坐在北边戴着头巾的交响乐团。整个场地坐满了人，才刚坐下，灯光便暗下来，接着传来一阵笛子独奏。粉红色的灯光笼罩在一位穿着西装的男子身上，他开始唱歌，那是我听过的最长的歌曲，既热情又平易近人，一切都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表演，无论是他的动作、西装，或是无线麦克风都很新潮。此时，我发现我正在看的并不是传统的苏非派的咖啡分享仪式。他们用这首歌代替以前托钵僧对咖啡的“祈祷的呼喊”，他们会一边唱歌一边从祭司手中接过咖啡，接着就达到陶醉在咖啡气氛中的最高点。借由咖啡，可以让仪式持续一整晚。18世纪的路卡斯（H.C. Lukas）曾在《托钵僧之城》（The City of the Dervishes）中记载：

在仪式的初期，托钵僧会分享红色咖啡壶里的咖啡，祭司会亲自将杯子递给他们，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赞美神：“阿拉，请帮助我们！”然后摇摆身体。

他们会越来越激动，会越叫越大声，身体越摇越厉害，慢慢地，他

们的呼声会变成：“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灵魂！”最后又会变成：“喔，神啊！”犹如咆哮托钵僧（Naqshbandi）一样，这群人会让自己借由这种叫喊达到忘形的程度，有些甚至会使用刀剑。

早期的苏非派信徒认为，咖啡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仪式刚开始以手传咖啡壶的时候（伊斯兰教认为这个动作是促进情绪亢奋的仪式），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容器的颜色。所有的手抄本都记载了相关的讯息——祭司在仪式上使用的咖啡是装在红色的容器里。对托钵僧来说，红色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与神的结合，而托钵僧也相信这个颜色可以立于“灵界的门槛”上。我现在正在观赏的仪式中，祭司会坐在一张红色的毛皮上面，借着毛皮的颜色，就可以使祭司成为鲁米的象征。因为咖啡是自己亲手从仪式用的红色容器取出的，所以被认为是绝对神圣，可作为与超越现实者结合的用品（有些苏非派团体会配合使用印度大麻做成的麻醉物品）。

长达 45 分钟的祈祷歌中，有 12 位披着黑色披肩且头戴黑色土耳其帽的男子一步步走到台上，原来他们就是所谓的托钵僧。当托钵僧来到祭司面前时，会一起跟随音乐行礼。祭司对着托钵僧，托钵僧对着祭司，最后托钵僧对着托钵僧。接下来就是一阵沉寂。托钵僧将他们的黑色披肩脱去，披肩里穿的是全白的背心与长裙。他们开始在台上起舞，跳到祭司面前时，在祭司的脸颊上亲吻一下，然后跑到舞台中央开始旋转。这时，舞台上的男士都挂着微笑，他们的白裙因为旋转而盘绕鼓起，他们的旋转看来似乎很轻松。

这个仪式的每一个侧面都有象征性。托钵僧的黑色披肩象征着他们的死亡；他们的白色长裙、裹布和被阿塔土克禁止的土耳其毡帽象征着他们的墓碑；长笛吹奏出的推进仪式的音乐象征着人类希望回归终极的精神追求。

旋转 20 分钟之后，托钵僧停下来，又从头行礼亲吻一遍。整个过程重复四次，每次的旋转过程都可以使他们从一个阶段升华到另一个阶段。到最后一次时，托钵僧就成为天上旋转的星星，表达对《古兰经》的敬意：“无论在天上或地上的东西，都可以唤起神的眷顾。”

这个仪式很显然不是设计给人观赏的，我从兴致勃勃看到无聊至极，最后到类似催眠的恍惚状态。传统的仪式会持续到黎明，有些派别的神职人员为了表现强烈的入迷，还会在旋转时彼此用刀互砍，更有些人会在狂喜中疯狂地叫喊。不过，当晚的仪式为了顾及观众的耐性，托钵僧只

用了三小时的旋转就完成了整个仪式。仪式结束时，托钵僧穿上他们的长袍，表示再度回到人间。最后，一个矮小的鹰钩鼻男子，也就是整晚都沉默无语的祭司，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读了一段《古兰经》里的赞美诗。此时全场 1500多位“民族舞蹈爱好者”都起立跟着咏唱：

东西两方都属于神的领域，

四面八方回转都可以感应神的存在，

他是万能的、全知的。

香料市场中的催情咖啡

许多人劝我不要搭乘从科尼亚往伊斯坦布尔的夜间火车，他们说这班火车比坐公交车多花两倍时间（胡说），而且不安全（乱讲），又很闷热，曾热到乘客的衣服都着火（这倒是真的）。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火车，里面的椅子确实有一股奇特的味道，日夜亮着使人的脸色看起来像死人的土耳其日光灯。火车到达伊斯坦布尔时，我已经感觉自己像个活死人。隔天，我必须从火车站转乘轮船，才能到达目的地。

伊斯坦布尔岸上有巨大的清真寺守护着海边，清真寺的周围围绕着尖塔。岸上的右方，虽然下着雪，但仍然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曾经风光的城墙现在倒塌的残迹，虽然已成废墟，却还是高耸。岸上的左方，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城堡。整个环境黑暗、沉重，轮船行驶过博斯普鲁斯阴郁的海岸时，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涌上一阵忧伤。

○

咖啡是在奥斯曼帝国最强大的时期被引进到这里的。大约在 1555 年，两个叙利亚人哈克姆与夏姆斯合开了一家咖啡馆。其实在伊朗等地，早已有许多家咖啡馆，可是只有在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才真正具有地方的世俗风味。在这里，没有故弄玄虚的宗教目的，男子多半躺着抽烟，品尝咖啡。有些咖啡馆提供诗文朗诵，有些更有布偶戏表演或女歌手驻唱，但这里的咖啡馆最大的用途是让三姑六婆七嘴八舌、道人长短。就算是喜好品尝咖啡的学者，也抱怨苏非派的咖啡仪式已经被无聊的笑话与夸张的故事取代。一位 16 世纪的历史学家写道：

咖啡馆里到处是学者或虚伪的苏非派信徒，以及无所事事的人……
大家挤到没有位子可坐，人人都说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像咖啡馆一样可供消遣、休息。

为了博取客人欢心，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还提供特制咖啡，在咖啡里放入混合了七种药物与香料的调味品，包括黑胡椒、鸦片及番红花。附赠的小点心包括蜂蜜小蛋糕和一种由碎肉、大麻与烟草混合熏制而成的东西，可以用作抽水烟筒的材料，也可放到咖啡里搅拌，制成一种伊斯兰的迷幻药。一位著名的奥斯曼作家卡蒂普·色利比（Katip Celebi）曾这么写：“这是上天赋予生命的物品……上瘾者为此牺牲都愿意。”

在当时，性爱仍是邪恶的选择。根据 17 世纪英国旅行家乔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的记载，这里的咖啡馆其实是妓院，里面有“许多美丽的男孩，他们是来当男妓娱乐客人”。奥斯曼的道德家形容咖啡馆是“使人去做那些令人厌恶的事情的一个洞窟……那里的年轻人都展示着他们对欲望的无限热衷”。为了提高他们的性趣，有钱的土耳其人会将杯子覆盖在燃烧没药的炭火盆里闷烧来熏香，这也是贝都因族（Bedouin）的女人在做爱前使用的将阴部熏香的传统技巧。其他人则会喝 30 多杯具有催情成分的龙涎香（ambergris）。关于这点，爱德华·雷恩（Edward Lane）曾在 1863 年写的《现代埃及人》一书中写道：“最普遍的方式，是先将一克拉（0.2 克）龙涎香放在咖啡壶里，然后放在火炉上融化，再用另一个咖啡壶煮咖啡。要喝的人可以放一些在咖啡杯里，再将煮好的咖啡冲进去。一般来说，一克拉龙涎香大约可以使用 2～3 礼拜。”

我对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想首先查清楚。问过几家现代土耳其咖啡店后，我发现这种催淫性咖啡已是陈年往事了。（你要“爱的咖啡”吗？）因此我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香料杂货市场，那里以前曾经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清真寺，如今已变成贩卖鸚鵡饲料的地方。因为刚从较为原始的也门市场过来，所以伊斯坦布尔的杂货市场看上去就觉得很现代化。最大的差异就是人行道，也门的道路是由粗糙碎石铺设而成，而土耳其却是柏油路，很平坦。在也门的市场设有隔间的小摊位，可以避免造成街道脏乱；在伊斯坦布尔，由于没有隔间，货物都需要分别包装。就连这两个地方的商人也不同。碰到也门的咖啡商人时，你能从他身上闻到咖啡香味，而土耳其的商人则是一身铜臭味。

不过，土耳其的商人会说英语。

“是的，是的！我当然会说英语。我还会说德语、法语。”

我接着问他：“你会说西班牙语？”

我之所以会这么问，是因为我发现虽然伊斯坦布尔的商人都自称会讲德语，但这个香料市集的商人却都讲西班牙语。

店主说：“这些都是狗屁！还不都是因为商业竞争！只要有一家店说有西班牙语服务，其他商店也会跟着这样说。”

我问他有没有龙涎香。他听后有些迷惑，于是找来一个英语较流利的男

孩，可是男孩说他从来没听过那种东西：“用来做什么？”

“它是一种催情剂，做爱时用的。”

“喔，做爱用的！”他从柜子里拿了一个瓶子下来。瓶子上贴着一张粉红色心形纸片，上面印有肌肉结实的猛男照片，“这个东西比那个好。”

“这是不是龙涎香？我知道以前的人常用龙涎香配着咖啡喝……”

男子摇摇头说：“那是老旧的东西，这一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土耳其人都是用这一种。你拜访过土耳其家庭吗？一般用很多，平常家里不只放一两瓶，而是三四瓶！他们每天都服用两汤匙。这一瓶算是大瓶的，适合全家使用。请问你有家庭吗？”

“没有。”我回答后就指着瓶盖上凸起的非洲人像说，“这好像真的不错，而且你看，材料中还有琥珀成分呢！”

他说：“喔，这里面的宝贝多着呢！总共有 17 种材料。这是苏丹国王的处方。”

“真的吗？”

“所以我说这是最好的。苏丹国王拥有庞大的家庭，他有 300 多个妻子！”他边说边兴奋地挥舞双手，“你去过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 Palace）吗？苏丹国王有他自己的工厂，用来制造顶级的、最新鲜的……怎么说呢？激情药丸。有专门制作给男人的药丸的工厂，也有专门制作给女人的药丸的工厂，不错，两种都有。”

我买了一瓶，又问道：“你们没有卖一种可以加到咖啡里的‘琥珀’吗？”

“加到咖啡里的‘琥珀’？”他弹了下指头说，“你要的应该不是琥珀，而是鱼里面的‘anbar’。”（琥珀的英文“amber”与“anbar”发音相似。）原来如此。我忘了阿拉伯语的“anbar”就是英语的“ambergris”（龙涎香），所以才搞错。

龙涎香来自深海中食用巨大鱿鱼的抹香鲸。这种黑色、有臭味的分泌物接触空气后，会凝结成类似树脂的材料。这种材料的味道很重，只要滴一滴在纸上，即使过 40 年，那种味道依然存在，而且感觉新鲜。它通常可以在荒无人迹的海滩找到，土耳其人视之为宝物。寻获的人如果没

有交给苏丹国王，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可是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方。中国人称它为龙涎香，因为他们认为是睡在海边的龙所流的口水。¹

现在为了保护鲸鱼，龙涎香已被列为禁品，可是这个青年男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约有 M&M 巧克力大小，颜色深暗，又有一点黏稠。我们在附近一家咖啡厅买了一杯咖啡，倒了一些喝，感觉松露的气味很重，令人产生温暖、香浓又兴奋的感觉，难怪会被认为是可以促进性能力的物品。

我再次问及奥斯曼的习俗：如果丈夫无法提供足够的咖啡豆，女方就有权利要求离婚。结果我得到另一种答案。

男孩说：“朋友，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翻译上的问题。那就是豆，所谓没有足够的豆！”他抓着自己的睾丸说：“这两个也叫豆。如果不够强壮，那就要服用这个啰！”他拍了拍苏丹国王的药罐子。

无论有否添加龙涎香，咖啡可以促进性能力的想法其实不完全正确。咖啡不会影响男女的性能力，可是当精子接触到咖啡因时便会游得比较快，所以也比较容易受精，让人以为这个男人的“豆”比较厉害。奇怪的是，奥斯曼人的想法刚好与当时的医学根据相反。有种理论说，咖啡是一种“燥”的要素，它会把体内的液体吸干，尤其是男人的精子。根据另一位学者西蒙·保利（Simon Paulli）的说法，咖啡会使男人不孕而绝子绝孙。有些人认为，咖啡上瘾者会造成尿失禁而致死亡。一本宗教小册子记载：“喝咖啡的人身体健康会每况愈下，到最后会消瘦到不成人形。”16世纪晚期，马赛医学院的医生曾宣称，咖啡中的“灰烬”会使人的身体脱水，尤其会使中枢神经“干燥……进而造成虚脱、衰弱与性无能”。

伦敦女子若发现男子的气概慢慢消逝，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到了1670年，伦敦到处都是咖啡馆。当这种医学报道变得普遍时，有一群女性写了请愿书向伦敦市长请愿，希望能够严禁来自该地区的咖啡，以确保她们的性生活美满。这封长达七页的请愿书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理由。上面写着，英国的绅士“是基督教里最有性能力的……他们维持了800多年的后代子孙”。他们勇猛的性能却因为咖啡的出现而开始变差：“恶劣的咖啡使他们除了鼻涕以外全身都干枯，除了关节以外没有其他部位可以硬起来。”

更完整的摘录如下：

这是由 1000多名妇女发起的一封谦卑的请愿函.....我们光荣崇高的祖国被认为是女性的天堂，可是，我们同时也面临难以说出口的悲情。我们发现，曾经英勇的男士现在看似威武，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脆弱不堪的公鸡和麻雀。我们将这归咎于有害的咖啡。咖啡不但削弱了大自然赋予的力量，而且会让他们更暴躁。男士的脑筋越来越不清楚，否则他们怎么会将大把钞票花在又黑又浓，既难入口又令人讨厌，苦涩、发臭、恶心，又像水坑里的泥水（亦称笨人汤和土耳其稀饭）上呢？他们甚至把该给孩子买面包的钱，花在这种索然无味的饮料上。

所以我们请求市长下禁令，禁止 60岁以下的人喝咖啡，并推荐啤酒与鸡肉啤酒（Cock Ale）²作为一般用途.....好让我们的丈夫可以再度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男人，而不是只留胡子就算数。同时也可以避免妻子偷偷使用人造阴茎，或是陷于红杏出墙的窘境。

为了光荣辉煌的改革！

伦敦，1674年

- [1](#) 另外一种用来催情的咖啡是来自中美洲的珠粒咖啡，叫作 caraciol。
- [2](#) 鸡肉啤酒的做法是将一只公鸡放入正在发酵的啤酒里，据说喝了可以增强性功能。

09 战争与咖啡的传播

土耳其人认为，不提供咖啡给妻子，可以构成离婚的正当理由。

——威廉·H·乌克斯（Williams H. Ukers）

严禁咖啡的苏丹王

通常我是不用导游的，可是当我踏进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一位自称罗杰的人立刻黏上了我，让我无法拒。罗杰有某种令人好奇的滑稽特性，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令人厌烦、有趣，还是在骗吃骗喝？他的个子矮小，声音像塑料玩具小鸭发出的叫声。

根据罗杰的说法，托普卡帕皇宫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苏丹王（Ottoman Sultan）的家，内部已装修现代设备，包括热地板、室内与室外游泳池、小溪旁植物景观，当然还有被阉割的守卫（太监）。托普卡帕皇宫内有 15 间厨房，现在已规划为烹饪博物馆，用于介绍现代咖啡杯的由来——伊斯兰上流阶层接受咖啡饮料，因此生产了各种咖啡杯。当初土耳其人喝咖啡的容器与埃塞俄比亚人一样，是没有手柄、像鸡蛋大的小碗。有人帮苏丹王设计了杯托，样子像一个蛋杯，名叫“zarf”。托普卡帕皇宫的烹饪博物馆有许多用黄金与钻石镶成的杯托样品，这些都是平时生活使用的器具。经过一段时间后，土耳其人在苏丹王的杯托上加了一根小握柄，最后不知哪位聪明人就在咖啡杯边加上手柄，废除了原有杯托的形式，这就是现代小咖啡杯的由来。

土耳其人煮咖啡的技巧可与埃塞俄比亚人相呼应，他们也是用一只锅煮咖啡，为了友谊，需要喝三杯。土耳其的煮法是将咖啡豆研磨后加水和糖快速煮沸，滚过三次后与咖啡渣滓一起倒进小小的咖啡杯里。如果有客人在，很重要的是要为他们加上很多“wesh”或“crema”¹，这样就可以升级为较体面的浓缩咖啡。之后，主人应将渣滓从茶碟中倒出，并以此帮客人算命。根据第一咖啡大臣蕾拉·哈诺姆（Leila Hanoum）的记载，苏丹王甚至有一种需要 30 人的更复杂的咖啡仪式：

一只金色的咖啡壶被放在一只金盆里的煤炭上，金盆由三根绳索悬在空中，一个奴隶用手提着绳索的顶端……另外两个女孩托着放置着小咖啡杯的金色托盘，咖啡杯是用上好的萨沃伊瓷或者中国瓷做成……第一咖啡大臣从托盘中拿起一个杯托——杯托上通常会有一块絮着棉花的亚麻布，将一只咖啡杯放在上面。然后她开始倒咖啡……之后她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拈起杯托的底部，用一种非常优雅和熟练的姿势将咖啡呈给苏丹王。

罗杰觉得这些很无聊。

他带我去看一群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他们穿着白色的运动服，聚集在看起来像一张很老旧的毯子的东西旁边。罗杰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穆罕默德的胡子。”

但我对苏丹国王的后宫更有兴趣，这里共有 200 多间房。照理说，除了苏丹王应该没有其他男人进去过才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是黑种阉人睡觉的地方。”罗杰解释。我们走进一整排房间。“睡在外面的是白皮肤的阉人，只有黑皮肤可以进去。”

“是的！”我还没问，他就继续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样做是因为有时手术没有完全成功。”

“不好意思，你指的是哪一种手术？”我问。

他眨眨眼，说：“就是为了割除那个东西啊，男人的性器官啦！有时如果手术没做好，阉人还是可以让女人怀孕的。”

“你是说他们有些人没切掉？”我又问。

“或许吧。所以为什么黑皮肤的可以进入后宫，是因为如果生下的孩子是黑人脸孔就不是苏丹王的孩子。一看就知道了。”

这说法让我很佩服：“我还没想到呢！”

罗杰嘲弄似地看我一眼后说：“这就是为什么苏丹王就是苏丹王，而你只是一名观光客的原因。”

○

苏丹王的后宫曾经发生过许多事，譬如妻子们互相毒死孩子，或儿子叫人把母亲掐死，兄弟互相把眼珠子挖出来。在这里比较特殊的，是一个称作“笼子”的地方，里面隔成四间小房间，是用来软禁苏丹王其他兄弟的地方。这是为了预防争夺王位的惨剧发生，比起传统的做法，也就是当苏丹王要登基时将其他兄弟全都杀死，算是比较有人性的。

最恶毒的苏丹王是讨厌咖啡的穆拉德四世（Murad IV）。他出生于1612年，11岁成为苏丹王，20岁时已经处死了500多名士兵，接着又杀了两个兄弟，只留了第三个活命，因为母亲说服他相信这个弟弟笨到不可能与他争夺王位。穆拉德因为处决一群在公共场合唱歌的女性（因为干扰宁静），因此被称为“易怒的”国王。又听说，他比较喜欢砍脖子粗的男人。

穆拉德经常微服暗访，在城里查看是否有叛徒。1633年的一个晚上，穆拉德和他的大臣打扮成平民，在黑暗的道路上行走。穆拉德是个酒鬼，他第一个拜访的地方就是酒馆。根据18世纪英国旅行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的记载：“穆拉德发现一群喝醉酒的人正在唱情歌。”接下来，他走到伊斯坦布尔的一间咖啡馆，“他观察到许多有智慧、严肃的人士正在认真讨论帝国制度，批评施政”。穆拉德听了他们的谈话后，便悄悄地返回皇宫。

不久后，穆拉德严禁咖啡。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全被夷为平地，喝咖啡的人被抓到也会毒打一顿，如果再被逮住，会被装入皮革袋丢到河里。此外，载运咖啡的船也会被击沉。穆拉德说，咖啡馆容易引起火灾，其实他担心的是咖啡馆提供了可以谈论政治的场所，生怕会引起反对政府的行动。穆拉德的反咖啡政策与早期不同，它是第一个非宗教性的镇压，也可能是第一个有政治考虑的反政策，唯恐咖啡会影响人民的思想。穆拉德也讨厌水烟筒，因为土耳其人会边抽水烟筒边喝咖啡。根据一些外国游客的说法，穆拉德开始带着他的刽子手到街上游访，看到有人喝咖啡或抽水烟筒就立刻砍头。²

现代作家尼可罗·康蒂（Nicolo di'Conti）曾经提到：“凡是穆拉德王到过的地方，总是会有恐怖的处死事件。即使在战场上，他也会突击检查士兵是否有抽烟或喝咖啡，被抓到的人不是被砍头，就是手脚被碾碎。”还有人说，他喜欢欺凌正在吸烟的人，会叫他们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把水烟筒插在鼻子里，然后亲手把他们的头砍掉。

虽然很夸张，但确实有约1~10万人因为这项罪行而被处死，有好几千人被砍断手脚而成为废人。当时的伊斯兰历史学者形容，伊斯坦布尔那几十年的景象就是“咖啡馆的荒凉，犹如人们心灵的干涸”。酒馆虽然禁卖咖啡，但是仍旧可以照常营业。

穆拉德因酒精中毒过世后，伊斯坦布尔的咖啡馆才又渐渐重现，可是损害已经造成。许多失意的咖啡商人已出国寻找财路。不出十年，伊斯坦

布尔的咖啡馆就出现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奥地利等国。

穆拉德的暴力镇压严重影响了帝国社会秩序的恢复。当时奥斯曼人已经巩固了东方的势力范围，转而往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开拓。在穆拉德去世不到30年内，他们已掌控了全东欧国家。1683年，他们前往当时西方世界最大的政治体哈普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的首都维也纳。当他们抵达维也纳城门时，第一件事就是将一个印有投降要求书的枕头套，射入维也纳的城墙：“我们是受命来此征服维也纳的！”

他们要维也纳投降，可是维也纳拒绝了。之后，土耳其的30万大兵就在城门外搭起25000多个帐篷，准备在此度过夏天。

去过托普卡帕皇宫后的第二天，我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往维也纳，那天是12月23日。当车子左弯右拐地慢慢驶离伊斯坦布尔时，我不断地将脸庞靠近窗户，看是否能在雪中看到什么。那时天还亮着，可是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隔天早上，雪下得比前一天小了，我可以清楚看到窗外的乡间景观，裸露的树枝与萧条潮湿的大地，到处是初雪痕迹，在白天闪闪发亮，可是到了晚间却呈现出浅蓝的光芒。在热带地区已经生活一年的我，看到此时此景，感动得喜极而泣。

唯一的麻烦是车票上的日期印错了。土耳其火车的车长很无奈地对我哼了一句，就赶我上车。但保加利亚人却想以间谍的罪名逮捕我，后来他们收了我的贿赂，才放我一马。接着罗马尼亚的车长好像有意要整我，他每隔半小时便来要求看我的票根，一再地对我说：“不行啊，这张票不行啊！”很显然，他是要我给他一点好处，可是我仍坚守一天只行贿一次的原则。

同车的朋友是罗马尼亚人，他告诉我不用担心，说车长是“很罗马尼亚风格的，他只是说说而已”。我还蛮喜欢这个罗马尼亚人，他看起来酷似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他的皮鞋比我的还臭，最好的是他一句英文也不会说。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个车长，他那官僚式的愤怒，外加那个小小的蓝色车长帽子。同车的朋友说得对，当火车驶到山头另一边时，已经是圣诞节早晨。那时，我们三个非常愉快地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分享我从土耳其带来的橘子，车长煮了一壶浓烈的黑色咖啡，味道甜蜜又可口。他将咖啡倒在一只沉重的瓷杯里，上面印有飞奔的红色罗马尼亚铁路系统商标。回到欧洲的感觉真好。

为了远离塞尔维亚的战争，我计划经由特兰夕瓦尼亚（Transylvanian）

到维也纳。如果要形容我现在的遭遇，以下这句法国谚语是最恰当不过了：“无论客观环境如何改变，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奥斯曼人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随意征募军用奴隶。他们不但将男人带走，还强迫女人充当后宫妻妾，小孩则被遗弃在外挨饿受冻。这种行为在很多方面与塞尔维亚的种族净化暴行是相同的。

可是我没看到类似情形。12月25日深夜我抵达维也纳，站在威斯特班霍夫（Westbahnhof）火车站前，却见不到一个人影。我独自一人在城中漫步了一小时，城里宏伟的古建筑整齐且干净，不但维持得非常好，也清洁卫生。整个城内空空荡荡的，与土耳其、也门或印度完全不一样。维也纳已是百年城市了，可是样子却像是昨天才刚建好似的。街道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只看到无人的电车从街道开过，却见不到半个人影，让人不禁怀疑维也纳是否已变成一座废城。

奥斯曼的军队包围维也纳的第二个月，整座城几乎已变成废墟，与现在夜深人静空荡荡的情况很相似。只要可以逃走的人都已经逃光了，包括国王在内。维也纳的人口也降到17000人，开始闹饥荒、瘟疫。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军团正在维也纳城墙的地底挖掘秘密通道，并放置炸药。

就在这时，一群约五万人、多数是波兰人的军队，正往维也纳开过来，土耳其领袖却毫不知情。他们万万没想到维也纳人知道他们在挖隧道，这有部分要感谢一个名叫法兰兹·哥辛斯基的间谍。法兰兹貌似是土耳其人，曾在伊斯坦布尔居住过。当维也纳人知道土耳其人何时要炸开城墙时，法兰兹就从敌军的防守线偷溜出来警告波兰当局。

9月8日当天，土耳其军队炸开隧道，致使维也纳城墙四处崩塌，接着土耳其军队蜂拥而入，维也纳军队奋力守住城垣。到了傍晚，土耳其的精英部队做出了最后攻击，波兰军队从附近山丘放了烟火，接着就冲下攻打土耳其士兵。伊斯兰帝国300年来的扩张主义就此停止。

卡布奇诺源自维也纳？

这次战役除了使奥斯曼帝国不再西征，也成为维也纳咖啡历史的转折点。土耳其军队逃走之后，留下 25000 多只骆驼，骆驼身上挂着一包包神秘的绿色豆子。维也纳人一开始以为是骆驼的饲料，但法兰兹知道那是咖啡豆，当他被问到要什么奖赏时，他指明要那一袋袋的豆子，打算在维也纳开第一家咖啡馆。之后，他认为维也纳政府应该送他一栋房子，好让他开设咖啡馆。不久，他又要求得到开创事业的本钱，还有几个奴隶当服务生。

“有些人认为法兰兹不但是间谍、骗子，还是守财奴。不过，不管怎么说，好听的故事总是有其价值。”赫尔·狄格拉斯（Herr Diglas）是一位体形如西洋梨的咖啡馆业者，也是维也纳咖啡馆协会主席，他兴奋地说着。

维也纳人非常注重食物的历史，法兰兹推动咖啡馆的诞生的议题，最近引发了许多讨论。认同的版本说，法兰兹利用咖啡豆战利品开设了维也纳第一家咖啡馆，名为“蓝瓶之屋”。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间谍至少有半打，第一家正式的咖啡馆是由一名叫约翰尼斯·迪奥达（Johannes Diodato）的人所创立的。

不论故事的结果如何，重要的不是谁开了第一家咖啡馆，而是他们开了之后又做了什么事。因为就在这里，他们改掉了把咖啡渣留在咖啡里的土耳其传统，不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早已无法追溯，我们只能猜测这是因为挑剔的维也纳人不喜欢在早上的咖啡杯里看到不明的漂浮物。

根据狄格拉斯的说法，维也纳是在咖啡里添加牛奶或奶精的创始地，不过这只是猜测。我们只知道这确实是欧洲人发明的，因为土耳其人和印度人一样，认为将牛奶与咖啡混合会造成麻风病。我们也知道，在早期的伦敦喝咖啡也不加牛奶。只有意大利人与维也纳人比较有可能，因为他们是欧洲大陆最早开始喝咖啡的两个国家。³狄格拉斯指出，这两个国家都有以牛奶为底的咖啡，两者完全不同，却有相似的名称：意大利的卡布奇诺（cappuccino），以及维也纳的卡布兹纳（kapuziner）。

狄格拉斯说：“至今仍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女士知道卡布兹纳。她们走进咖啡馆大多会点这种饮料，而且很清楚知道要的是什么：咖啡的颜色一

定要是像修道士长袍那样的咖啡色。”他耸耸肩，说：“啊，我想我的服务生当中只有一人还知道那是什么饮料吧，其他的服务生都太年轻了，早就不记得了……”

他叫了一个较年长的服务生过来，问他是否会做卡布兹纳，结果他不会。尽管典型的维也纳咖啡馆总是人潮汹涌，随时都有人在喝咖啡、吃蛋糕，还是没有人晓得如何制作这种饮料，况且他们是超过五六十岁的资深服务生，每个人都会制作至少 20 多种咖啡。

“这种咖啡没有食谱，纯粹只是靠颜色调制。你一定得知道它正确的颜色，加入牛奶的量要看咖啡豆的浓烈度而定。”狄格拉斯说。

狄格拉斯所讲的修道士，指的是天主教会的另外一派圣方济会，沿用了卡布兹纳与卡布奇诺的名称。圣方济会与咖啡的关系始于一个名叫阿西西（Assisi）的意大利村庄。大约 1201 年时，一位行为异常、叫乔凡尼（Giovanni）的家伙常裸着身体到处游走，有时会跟鸟儿说话。如果是现在，他会被送进收容所，可是当时是中古时期，他反而被封为圣人，我们今天称他是阿西西的圣方济（St. Francis of Assisi）。

因为他的关系，宗教信仰开始快速崛起，同时也分裂成好几个门派，但这几派常互相攻击。玛窦·巴西奥（Matteo da Bascio）就在这时出现了，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圣方济会托钵僧，他尊敬圣方济，对其安于贫困、养鸟，以及简单的生活方式都非常崇拜。有一天，圣方济的灵魂来拜访他，跟他抱怨圣方济组织的堕落行为。引起玛窦注意的却是圣人的装扮，因为他戴的是尖顶帽，而不是教会指定的方帽。愤怒的玛窦向梵蒂冈诉请戴尖顶帽的权利，教皇最后勉强同意了。其他方济会士不喜欢玛窦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将他关进牢里。由于玛窦坚持戴他那顶尖顶帽，方济会士不肯放过他，整件事到最后还是由教皇出面解决，帮玛窦创立了一个独立的教派，以免他再受其他方济会士干扰。

圣方济会就这样诞生了，“cap”是帽子或兜帽的意大利文，与玛窦喜爱的尖顶帽息息相关，后来所指的却是卡布奇诺上面的鲜奶油或是热牛奶。（或许我们应该称它为光环？）但维也纳卡布兹纳的由来，据说是因为当地一群很在乎潮流的修道士希望饮料的颜色与他们褐色的长袍相配，所以在咖啡里加了牛奶。我在维也纳的圣方济会修道院问起这件事时，他们很不友善地赶我走。

“我们不是咖啡连锁店，你懂吗？”一位不耐烦的修道士激烈地说，“我

们是一个宗教组织！”

圣方济会的修道士为这件事感到不悦，因为他们认为卡布奇诺顶端的鲜奶油（或是热牛奶）暗示圣方济会的修道士全都是没头脑的。

对于那位修道士的激烈反应，狄格拉斯解释：“对维也纳人来说，卡布奇诺不是可以闹着玩的话题。我们非常重视我们的咖啡。”

隔天我认识了一位伯爵夫人，她也这么认为。

“你看，这么珍贵的东西，你竟然大口大口喝，就像美国人用喝可乐的方式喝卡布奇诺。这是不对的！你要知道，这可是哈布斯堡（Royal Habsburg）的皇家饮料，看你是怎么喝的！”伯爵夫人甩着汤匙对着我的咖啡说教。看似肮脏的鲜奶油在灰色浓缩的咖啡中漂浮，已融化的巧克力碎片还黏在杯口上。

我在德梅尔咖啡馆（Café Demel）认识了一位伯爵夫人，“伯爵夫人”是我封给她的绰号。德梅尔咖啡馆是一家以卡布奇诺出名的咖啡馆，号称给客人本世纪初最早的咖啡喝法：在一个大银盘上面放一杯浓烈的咖啡，但不是浓缩咖啡，再加上一小碗巧克力碎片，以及一勺圆形鲜奶油。伯爵夫人对我喝卡布奇诺的方式实在看不下去，决定要教我正确的喝法。

“你们美国人都被吸管害死了！”她说。伯爵夫人看起来有点像维也纳人，虽然有点老但还是很美丽，至少还维持得很好，也很有钱，但有点恶毒，特别是那张嘴。她的双唇好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亮漆，脖子上挂着乳白色珍珠，在她那动物皮毛的领子里，隐隐约约闪烁着光芒。

一位穿着黑色制服的服务生端来一杯卡布奇诺，伯爵夫人便开始了她的教学。首先，她将鲜奶油加入咖啡里，把巧克力碎片轻轻地洒在咖啡上，接着用汤匙优雅地比了一下手势说：“这才是喝咖啡的方法。”然后又以凶恶的表情用汤匙做了刺杀动作：“不是这样！又不是在杀什么东西，可不是吗？”

先前我把鲜奶油用力地往咖啡里倒进去，然后用力地搅拌，试图要将鲜奶油与咖啡搅拌均匀。可是依照伯爵夫人的说法，应该一边让鲜奶油在咖啡中慢慢融化，一边细心品尝鲜奶油与巧克力碎片。当鲜奶油融入咖啡里半英寸深时，你才可以将浮在上面的那层鲜奶油拨开，把杯子拿到

你的唇边。在这之前，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喝，连嘴唇都不可以碰到那层鲜奶油，要让咖啡的精华透过那层鲜奶油渗透出来，然后才能在你的上颚留下传统的浓烈咖啡的香味。此时，发出轻微的啜饮声是被允许的。

“等一切按部就班，而且鲜奶油也融化了，我们才可以开始喝咖啡。咖啡杯里的咖啡应该就是这样咖啡色，你看！第一个阶段，当你尝到卡布奇诺的鲜奶油时，可以比喻为童年，既甜美又清爽，而且没有负担的感觉；第二个阶段则像是中年时期，”伯爵夫人停顿一下，又说，“我没什么话来比喻。最后阶段则像老年时期，又黑又苦，可是懂得品尝咖啡的人都会认为这个部分最好。”

我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天跑去参观市立博物馆，看到了1683年土耳其带兵攻打维也纳的大臣的肖像。

图中，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看起来是一个焦虑而肥胖的男子，完全看不出是一介暴君。话说回来，如果这张图像是在他领军回伊斯坦布尔见苏丹王时画的，看起来当然比较懦弱无用。因为当时苏丹王给他一个待之如狗的欢迎仪式，并在他家人面前绞死了他，把他的头颅制成了标本。

奥斯曼围攻维也纳的失败，反而促进了咖啡的传播，并没有因为维也纳受围困而停止。1670年，也就是在维也纳被围攻的前十年，全世界咖啡的原料已经都在奥斯曼帝国出现。那时的咖啡豆来自也门，糖来自非洲。1671年，法国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在马赛建立了一个糖厂。100多年前从土耳其偷盗出来的咖啡豆已经在新世界繁盛起来。到了1730年，连土耳其都已经有了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咖啡产品。

土耳其大臣的画像旁边，挂着一面古老的奥斯曼旗帜，整面旗帜都被文字覆盖，再加上红色的新月图。有趣的是，旗帜上的新月也成为一种食物，同时代表他们的失败。

回到1683年，土耳其人攻打维也纳时，有个叫作彼得·温德（Peter Wender）的面包师在深夜工作时听到很奇怪的声响，原来是土耳其士兵在挖隧道的声音，于是他赶紧通知市政府官员，并且做了新月形面包（pfizer）来宣扬自己的功劳。当时利用面包做宣传是很普遍的。早在50年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Adolf II）攻打德国时，德国也到处是印有阿道夫肖像的姜饼，把他塑造成吃孩子的妖怪。

土耳其被打败之后，维也纳开始把温德的新月形面包搭配咖啡当早餐。又过了一个世纪，17岁的维也纳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嫁给法王路易十六，她坚持早餐要吃新月形面包，所以皇家的面包师就开始学习如何制作新月形面包，并在面包里加了奶油与酵母粉。但是法国皇后只能吃法国的食物，因此他们把新月形面包改名为“可颂”（le croissant），其法文也是新月的意思。

从此法国诞生了世上最有政治性的食物：从土耳其偷来的、搭配咖啡来嘲笑他们国旗的面包。当几千万欧洲人吃完这份早餐后，不但无意间在一天的开始就纪念了土耳其西征的失败，也参与了欧洲史上影响深远的药物革命的仪式。

1 crema是咖啡表面形成的油脂泡沫，与其相近的是香粉精（cream of the fragrant dust），是一种快速搅拌茶粉时产生的细小气泡。

2 17世纪前，穆拉德曾被英国的“Ye Great”咖啡馆加封了一项滑稽的荣誉——在店里发行的咖啡代币上刻穆拉德头像。这些咖啡代币是私人货币最早的样本之一，在咖啡馆附近的区域被用来当现金，直到政府严禁为止。

3 开罗有一幅 1625年制成的蚀刻画，上面显示着牛奶与咖啡的混合饮料，不过这种做法已经不存在了。

10 欧洲革命运动的推手

在一个中下阶层聚集的咖啡馆里，

我直接问道：哪一桌是背叛者？

——马龙（Malone），1618年

取代啤酒的“黑色吟酿”

其实，当土耳其人丢下咖啡豆时，咖啡已经小规模地出现在维也纳、伦敦、法国与荷兰。第一个由欧洲人记载的有关喝咖啡的记录是在 1615 年。可是就算最勇敢的美食者，也要等到 17 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习惯喝咖啡。

然而，为了了解这种新的娱乐性药物的意义，你还得先习惯 400 年前纯朴、落后的欧洲社会。在那时，不但没有书籍出版，也没有电影，音乐也不怎么悦耳，食物则更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胡椒还没有被发现，白盐则稀罕珍贵，而砂糖也才刚亮相不久。非常像长时间过着乏味的周末，不是上教堂就是喝啤酒，可是欧洲人却精明地把两种结合起来。1660 年的巴黎有超过 100 个宗教假日，每个假日的高潮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马拉松饮酒比赛。“他们得先喝掉一半，然后一口气把剩下的全部喝完，”一位德国人在 1599 年记载，“直到他们完全陷入昏迷状态……会有两个英雄脱颖而出，然后再继续最后的酒量比赛。”

有人说，喝酒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因此有句话说：“酒醉如大王。”敬酒就是用来显示自己很富有的方式。喝得最多的那位将会得到奖赏，那就是浮在酒杯上的吐司（toasted bread，因为第一个字与敬酒同音）。作者把这些敬酒比赛视为慢性自杀，参加的人“犹如疯子般持续着，大家都抢着以对方健康的名义来敬酒……所以，如果一个人喝得烂醉后依旧安然无恙，他确实该为自己庆幸”。到了晚上，欧洲的城市到处可以看到醉汉“左右摇摆，前后晃动，四肢不稳，摔进泥地时，双脚还摊开得连马车也穿得过去”。

啤酒不只是用在庆祝的场合，但以营养成分来说，还是面包名列前茅。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主妇都会烘烤面包，也会酿酒。“众人靠这道饮料过日子，多过于靠食物。”普列克托玛斯（Placutomus）曾于 1551 年如此描述。

啤酒混合一层厚厚的鸡蛋再倒在面包上，是最原始的大陆式早餐。一直到 18 世纪中期，这种大陆式早餐在德国还是很受欢迎。由于温热的饮料比较罕见，而且当时的水质也较不卫生，所以许多工厂的员工早上都会有休息时间喝啤酒。一般他们都在早餐喝啤酒，午餐喝麦酒，晚餐则

喝更强烈的黑麦酒，而每一餐之间也会随意喝几杯。一般的北欧人，包括妇女和小孩，平均每天喝三公升啤酒，差不多是两箱六罐装啤酒，而且他们喝的啤酒的酒精成分比一般的高很多。社会上较有权势的人，譬如警察，还会喝更多。芬兰的士兵每天可以分配五公升较烈的麦酒（大约七箱六罐装啤酒，或 40 罐啤酒的酒精成分）。在苏塞克斯（Sussex）的修道士，大概只有 12 罐啤酒。

几乎所有东西都含酒精成分，尤其是药物。任何没发酵过的东西在夏天都会坏掉，在冬天，啤酒会结冰，于是就可以生产比啤酒酒精成分还要高的烈酒。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私酿的烈酒一定不会被浪费，但糟糕的是，主要的营养来源唯一没有酒精成分的面包，则被认为很容易长出引起幻觉的麦角菌，这是一种 LSD（麦角酸二乙胺，一种迷幻药）的基本成分。于是产生了喝醉酒的医生、醉醺醺的政治人物，还有酒后宿醉的将军。接踵而来的就是瘟疫、饥荒，还有可怕的战争，再加上使用迷幻药的教宗，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中世纪的基督教。

因此当马丁路德在 16 世纪中期推行天主教改革时，饮酒的问题就是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追随者有圣方济修道会，他们印了最早的“酒精魔鬼”（Demon Alcohol）海报，那是一个有猪头鸟爪的喝醉酒的魔鬼，他们也禁止酒量比赛。

当时的社会对这项改革唯一有响应的组织，是由一群德国人创立的欧洲第一个节制联盟，其会员都限制自己在一餐内最多只能喝七杯葡萄酒。除此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仍然如同往常一样持续着原来喝酒的习惯，医生依然劝说他们的病人应该让自己喝得醉醺醺，至少一个月一次，以为这样做有助于保持身心健康。在英国，大约有 1/3 的农田专门种植大麦来酿制啤酒，而且每七栋建筑中就有一间是酒馆。

马丁路德的限酒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可以代替喝酒的建议。接下来就是 17 世纪 40 年代奥斯曼禁止咖啡的事件；在这之后十年，欧洲第一间咖啡馆才在英国牛津市开业。¹过了不久，伦敦也开始出现咖啡馆。就在此时，清教徒夺取了议会的控制权。

当诱人的葡萄隐藏的毒害

强暴了整个世界，

咖啡，这非常有益的酒精，出现了，

挽救了肠胃，也把脑筋变得更灵活。

——匿名清教徒，1674年

禁酒的清教徒热切地将“黑酒”视为是上帝赐予的代替啤酒的饮料。这种饮料比啤酒还好的地方是，它被认为有治疗酒醉的功用。西尔维斯特·杜福尔（Sylvester Dufour）曾指出，咖啡“可以立刻让喝醉酒的人恢复清醒，即使没有喝醉的人喝了咖啡，马上也会觉得精神好许多”。不用说，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报道。虽然近年曾有相关化验结果显示，只要喝两杯咖啡，就可以使身体里的酒精成分减少 0.04%——酒精在血液里浓度的高低对人体有相当的影响（0.01%的酒精已足以影响身体）。根据当时的秘密信件的记录，这种酒后引起的轻微头昏是当时欧洲面临的重大问题，尤其影响书记官的工作。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的说法，随着咖啡馆的增加，书记官不只变得清醒，就连早上喝酒的休息时间也慢慢被替代。1652年伦敦只有一家咖啡馆，到了 1700年已经超过 2000家。

但咖啡与清教徒的结合并没有普及到整个欧洲大陆。在 17世纪初期，主教甚至要求罗马教皇禁止这种“恶魔吟酿”，只因为它是黑色的。而且苏非派教徒在仪式上也开始使用咖啡，所以咖啡被视为恶魔饮用的圣餐酒。可是教皇拒绝这个提议，因为他试了一杯咖啡后还非常喜欢。不过，在英国的清教徒都已经改掉在早餐喝啤酒汤（beer-soup）的习惯，但其后 100年，保守的天主教徒仍然坚持在早餐喝啤酒汤。

催生民主与人文的场所

咖啡除了可以让人在工作场所清醒之外，咖啡馆也让英国人不用到酒馆也能与别人交谈以及见面。而且酒馆并不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安心发表政治和宗教议论的地方，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武器或是喝醉了；一般来说，聪明的店老板也大多不鼓励顾客过于激烈地讨论政治。相反，咖啡馆却经常成为提倡和鼓励政治讨论的地方，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曾于 1675 年禁止在咖啡馆讨论政治（但这项禁令在 11 天后就取消了）。以君主制度主义者的观点来说，这种做法的确不妥，可是更糟糕的是这些咖啡馆大都热烈鼓吹：

贵族们，工匠们，大家一起坐下来，

即使是更高贵的阶级，大家也不分尊卑，

只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子，

即使有地位更高尚的客人来临，你也无需

把你们自己的位子让给他们。

将这种民主的作风发扬得最彻底的地方，就是伦敦著名的土耳其人咖啡馆（Turk's Head Coffeehouse），第一个代表现代民主主义的投票箱也是在这里产生。设置投票箱的用意，就是为了让客人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发表对一些争论性政治话题的意见。这个革新的概念是在奥立弗大帝（Oliver the Great）的强烈镇压下所激发出来的，是为了防范政府的间谍而设，使他们没有办法证实和确认哪一些人是“国家的叛徒”。

当然，喝咖啡也带来一些问题。当时，温热的饮料还非常罕见，杜福尔还特别提醒他的读者“不要喝太快，或把舌头伸进杯子”。人们对咖啡杯附上小茶匙的用途还是有些质疑，他们不知道是要用来搅拌温热饮料使它降温，还是把它视为汤匙用来喝咖啡。他们也添加一些芥末、香槟、薄荷、糖蜜，以及烘烤过的萝卜。（令人讶异的是，无论英式咖啡有多难喝，但还是比最早期的英式红茶好喝多了。那时的英国人把茶叶当做泡菜一样吃下去。）

然而，咖啡不只被视为酒精代替品，还被当成肉体与精神的兴奋剂。这种改变就像埃塞俄比亚喜爱咀嚼咖啡豆的爱好者的古老祈祷，如果你还记得，正如下面所叙述的：

咖啡壶带给我们平安，
咖啡壶让我们的孩子成长，
让我们财源滚滚，
请驱逐所有邪恶，
赐予我们甘露与绿草。

咖啡能够增加财富，在英国可以得到最明显的证明。许多咖啡馆变成了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企业总部，例如伦敦的劳埃德证券 [劳埃德咖啡馆 (Lloyd's)]、伦敦航运交易所 [波罗的海咖啡馆 (Baltic)]、英国东印度公司 [耶路撒冷咖啡馆 (Jerusalem Cafe)] 等。咖啡馆的外观设计也启发了现代办公室的设计。特地为某些商人摆设的桌子被改为有帘子隔开的小空间，为他们多提供一点私人空间。这些后来就变成了办公室或小隔间，而且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是聚在一个共有的大办公室一起工作。甚至到目前，英国股票交易所的通信员还是被统称为伙计 (waiters)，而这也是因为不久前，交易所的确是个有伙计的咖啡馆。

其他咖啡馆则转变成科学与艺术的聚会所。以前牛顿经常光顾希腊咖啡馆 (Grecian Coffee House)，威尔咖啡馆 (Will's Cafe) 则是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和亚历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 时常去的地方，画家如威廉·霍加斯 (William Hogarth) 则常去老斯洛德咖啡馆 (Old Slaughter's) 捧场。

当咖啡馆变得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顾客也为了跟上潮流而常去捧场时，就变得越来越不实际了。有一个名叫理查德·斯蒂尔 (Richard Steele) 的出版商决定出版一本周刊，专门收集所有咖啡馆最有趣的讨论话题。该周刊对每一间咖啡馆都会以通讯记者专栏做特别介绍，为了保持各咖啡馆的原有特色，还介绍来自威尔咖啡馆的诗和韵文，圣詹姆斯咖啡馆的外地新闻，还有怀特咖啡馆 (White's) 的艺术与娱乐新动态等。斯蒂尔也吩咐记者要把稿子以对话的方式写出来，让读者有置身咖啡馆的感觉。

在此之前，以对话方式写作的文章被视为不值得作家注目的写作风格。根据英国文学史家哈罗德·劳思（Harold Routh）的记载：“一直到那个时候……作家从来没有认真地研究简单的生活对话，就是在这里（咖啡馆），他们才真正开始将文学的交互方式与比较讲究的古典写作方式融合在一起。”

反应灵敏的人在讨论有趣的话题时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那是很有趣的概念。那时，斯蒂尔的时事周刊转型为《闲谈者》（Tatler）杂志，是第一本现代杂志，也是现今仍存在的英国高级社交生活杂志。他的通讯记者专栏以及分类的概念，即被设定为现代报纸的标准。报纸是大家公认对民主主义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伦敦第二个首创的报章《劳埃德新闻》（Lloyd's News），在最早期时是挂在劳埃德咖啡馆里的一个布告板。咖啡馆的开放，使得有礼貌的交谈与讨论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活动。也难怪当时一些时事评论者会写：“只有咖啡与国家融合在一起……才能建立自由与严谨的国家。”之后，咖啡馆的话题也逐渐从文化、教养扩展到流行体育的话题。

如果想要认真衡量兴奋药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可能不是容易的任务。可是，如果要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一个人，就简单多了。譬如，假设你喝三公升麦酒，你的记忆力可能会把你所学过的东西减退到只剩八成。相反，咖啡却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而且我们在喝醉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暴力的倾向。如果孕妇只喝约一公升麦酒，她们所生的婴儿的智商就会降低7%。假设她们再多喝一公升，几乎一半的小孩将会因为胎儿酒精综合征而导致先天智力发育迟缓。

根据这种推论，有人可能会认为中世纪欧洲人是有企图心的白痴，那是一个很傻的推测。可是，你明天吃早餐的时候，不妨试试喝一公升的烈麦酒（相当于三瓶淡麦酒），然后看那天过得如何。我们都知道当时欧洲是怎样从滥饮的文化转变为抑制饮酒过量，最后转变为可以接受兴奋剂（至少在白天）的社会。

从欧洲的第一杯咖啡算起，200年内所发生的饥荒与瘟疫都是历史的注脚。政府变得更民主，奴隶制度也消失了，而生活水平跟大众的读写能力也有破天荒的进展。同时，战争减少了，但却变得更凶残。无论是好是坏，古老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祈祷已得到了响亮、明确的回应。²

我这趟以咖啡为中心的人类历史之旅，是为了好玩而展开的。因为人类的发展其实和裙子一样，可以随着长短而进退；如果连我都不知道历史

是由一连串事情联结而产生，那就实在太荒唐了。但有时一些事情也会让人觉得这一切并不是纯属巧合。

当阿拉伯人还是世界上唯一种植与收割咖啡豆的文明国家时，他们的发展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来得快。而当奥斯曼王国掌握了咖啡豆的大权时，它们便成为世界上最有势力、最宽容的国家。当咖啡较早在英国出现时，就掀起国家争霸以及征服世界的意志。而法国大革命，也是兴起于巴黎咖啡馆的兴盛时期。拿破仑也热爱咖啡，他带领士兵想征服欧洲，却因为不明智地严禁巴黎人所热爱的咖啡而战败了，这使他后悔莫及。据说他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想喝一杯圣海伦娜岛（St. Helena）的浓缩咖啡。美国的殖民地也将茶列为不合法的物品，他们以咖啡代替茶，进而使他们成为当今非常强大且先进的国家。同样，曾是以喝茶为主的日本，现在也因牙买加蓝山咖啡而强大。

西方社会自愿服用会影响脑细胞的刺激品，也仅仅只有三次：一次是酒精，但真正的时间并没有记录下来，17世纪时是咖啡因，20世纪末期则是迷幻药。酒精对早期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无法衡量，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没有办法推测迷幻药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咖啡和迷幻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让人联想到非常相似的文化革命。上面提到的斯蒂尔就曾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如何改革君主制度。又如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会一边抽鸦片，一边策划如何打越南战争。而咖啡爱好者伏尔泰（Voltaire）以及金斯伯格

（Ginsburg）的讥嘲癖好，更代表那时代的热门话题。以政治的观点来说，18世纪（反君主制度）和20世纪（平民权利）两个时代推广的人权主义活动，都是药品流入社会大众之后才获得成果。当时热情参加法国大革命的狂爱咖啡的民众，与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的抗议者有某些程度的相似。这一切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药品专家应该为像海洛因这样的药品的流行而感到安慰的原因，因为尽管服用药品会给自己带来副作用，但美国人始终还是选择药品带给他们的兴奋。如果有一天，海洛因也像热牛奶一样，变成了大众所选择的药品，那才是这些专家应该开始担心的。

药品可以直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态度、生产能力，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能力。就好像一个尚未喝进第一杯咖啡的人会感觉无精打采，甚至神志不清一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酒精带给人们的祸害，例如会造成人们的分析能力混乱、轻信人言且缺乏判断能力，甚至情绪失控，都是中

古时期的堕落行为。另一方面，喝咖啡可能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是胡思乱想，或是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有些历史学家建议应该要有一个“咖啡因史前人”（**Precaffeinated Man**）的专有名词，以便有一个生理学上的区分。就像颇负盛名的考古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的《天国料理》（**Tastes of Paradise**）一书中提到的：“在 17 世纪的画像中，一些体形硕大、超重的人，就是因为喝了太多啤酒或啤酒汤所致。”而新教徒则认为由于咖啡的介入，才得以让这些爱喝啤酒的懒惰鬼得到精神上的洗涤，使他们变成了 19 世纪典型的瘦弱的讽刺者。

你觉得荒谬吗？或许吧！但真正荒谬的是：因为咖啡与早期的人类都是出现于东非，假设这些早期猿人在那时就吃了这些红色的咖啡豆，进而促使他们脑部的发展，就像革命时期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会开始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吗？而这群吃咖啡果实的猿人，难道就是人类从猿人演变到人类的过程中“遗失的一环”吗？而他们所吃的苦味水果，难道也是伊甸园故事的原型吗？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也的确太荒唐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这套推论。甚至有一位德国社会学家提出完全相反的说法，他说咖啡是造成文明败坏的最主要原因。

我从维也纳搭火车到德国时，首先遇到奥地利的警察对我搜身，接下来是德国的警察。从不同国人的变化就知道我已经进入西欧世界——人们的体味变得稍微淡了些，脸上也毫无笑容。

咖啡扩张主义

这位社会学家会出现在慕尼黑并不意外。因为“啤酒节”就是从慕尼黑开始的，这是德国每年的重要庆典，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啤酒的人士（尤其是澳洲人）都会聚集在一起狂喝啤酒。这是中古时期留下来唯一的喝酒狂欢庆典。在那里我认识了这位反咖啡的宣传者约瑟夫·乔菲（Josef Joffe）。

“啤酒节只是一项活动，”乔菲博士说，“你误会了我的理论，我称它为‘乔菲咖啡扩张主义理论’。”

对于乔菲博士，有两点使我感到很意外。第一，我原以为他会是个脾气很不好的怪人，结果他是一个专业的社会学者，同时也是德国重要报刊《南德日报》（*Suddeutsche Zeitung*，相当于美国的《纽约时报》）的政治版总编辑。他像是一只懂得享受人生的大白熊。他的秘书立即煮了一杯咖啡给我。我想，至少他是一个享有高薪的怪人。第二是他所提出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灵感来自有一次他去访问前苏联的途中对国安局人员的抱怨，他只不过是抱怨前苏联的咖啡很难喝，而那位承办人却回答，就像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中子弹头一样，两边都具有伤害人民的能力，可是外在并不会有任何影响。

“我就是在当时想到这个理论的。”乔菲说，“不好的咖啡就等于扩张主义、帝国主义与战争，而好的咖啡则是象征文明、反战主义与懒散。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你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国出产世界上最棒的咖啡？”

“是意大利人吗？”

“意大利最后一次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公元 300 年吗？”

“你们美国人是在什么时候才学会煮咖啡的呢？”

“我猜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某个时期吧。”

“你知道越南战争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吗？”

“或许联合国的调停者应随身携带埃塞俄比亚的锡达莫（Sidamo）咖啡豆。”

“简单说，是用来代替机关枪吗？”

“你知道联合国里面的咖啡如何吗？”

他摇摇头说：“不太好。”

乔菲的理论到头来是赞成使用咖啡呢，还是反对呢？他的秘书又端来几杯咖啡，此时，乔菲接起电话。或许是因为听到他用德语说话，一种又高贵却又残忍的语言，我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乔菲博士显然是一位喜爱咖啡的人士，而他的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咖啡的一种启发。可是当我更仔细地想一想之后，我看到了一个不祥的真相，那就是：如果不好的咖啡会带来好战主义者，而好的咖啡会使人胆怯，那么所有的咖啡不论是好是坏，不是都变成了恶魔？

事实上，乔菲的理论就是早期德国一种反咖啡的宣传。自从1777年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开始严禁咖啡之后，德国便产生了欧洲最激烈的反咖啡人士。他写道：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民在饮用咖啡时，我就感到非常厌烦。我们是因为啤酒而得到许多胜利。国王不相信那些喝咖啡的士兵能够帮他打赢战役，天主教的主教都力劝所有会众销毁他们用来调制咖啡的器具，腓特烈大帝甚至雇用伤兵在街上用鼻子搜索哪里在烘焙咖啡——而这个办法很成功。有两种咖啡由此产生：一种是“豆咖啡”（真正的咖啡），而另一种是“咖啡”（由烤焦的面包、含焦糖的萝卜、菊苣和无人知晓的材料调制而成）。

“是啊，我记得。”乔菲讲完电话后对我说，“我们称他为‘muck-fuck’，没错，就是这样的发音，不过写法是‘mocha-faux’，意思是假的摩卡。你一定要知道这一首小曲，它唱的是“‘不要喝那么多咖啡’。我想这曲子应该来自莫扎特。”

乔菲告诉我的这首小曲其实也是另一首反咖啡的倡导歌曲，这次是鼓励国人喝菊苣咖啡³（Chicory，一种咖啡的代用品），而不是真正的咖啡，因为如果买真的咖啡来喝，德国人的敌人法国人就会越来越有钱。菊苣咖啡包装上还印有德国佃农正在一边播种菊苣的种子，一边扔掉咖啡的袋子。图的上方还有一个标题“要健康又要富裕，我们不需要你（指咖啡）”。

这次反咖啡的倡导很成功，所以德国一直是欧洲没有咖啡因也没有民主的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的崛起，也是因为这两种东西。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演讲时所招揽来的追随者都是到酒吧而不是到咖啡馆。为了公平起见，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跟希特勒同样是吃素的印度甘地，也反对喝咖啡。

但我们不应该纠缠于过去的错误。德国已经弥补了过错，现在也供应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咖啡。

“这些全部都证实了我的理论。”乔菲说，“战争之前，德国的咖啡很难喝，你看，还让他们一路打到莫斯科！自从我们开始学会制作好喝的咖啡以后，我们就变得温柔得像树獭一样。可是，这对美国并不是很有利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以前美国的咖啡也是难喝到不行，所以他们的武器都做得很厉害。但是自从星巴克开业以来，美国就没有打赢过一场战争。如果让星巴克继续扩张下去，伟大的美国会被榛果与苦杏酒取代，因为没有人可以一手打仗，另一手拿着卡布奇诺奶昔。”

我对乔菲提出疑问：“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根据你的说法，如果好的咖啡代表堕落，而不好的咖啡会带来战争，那么咖啡一定是恶魔的饮料？”

“不、不、不，我的朋友。”他摇摇满头银发说，“请问你一个问题，战争是件好事吗？”

“当然不是。战争是坏事！”我喃喃地说，又喝了一口咖啡。

“那么好的咖啡就是好事啊，”他点燃一根小雪茄，“而不好的咖啡就不是好东西啦。有什么道理比这样的说明还清楚呢？”

“我喜欢你！乔菲。”我真的很喜欢这位学者，虽然没有喜欢到要亲吻他的地步，但我或许会因为太高兴而坐倒在他的腿上，“你有跟其他社会学家提过你的理论吗？”

“我的同事会说那不过是似是而非的理论，可是在社会学里，有什么不

是似是而非的呢？”

1 牛津咖啡馆是中东来的犹太人在 1650 年开设，伦敦第一家咖啡馆是由帕斯卡·罗希（Pasqua Rosee）于 1652 年开设，与旧金山的帕斯卡咖啡连锁店同名，他的咖啡馆如今已成为一家叫“牙买加客栈”（Jamaica Inn）的小酒馆。

2 有趣的是，著名文化理论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他的西方文明“合理化”的时间，也是从欧洲第一家咖啡馆开幕的那一年开始。

3 菊苣根部研磨出的汁液，不论味道与颜色都与咖啡近似，在日耳曼被称“穷人的咖啡”。但在欧洲无法取得进口咖啡的情况下，菊苣的地位水涨船高，拿破仑还在欧洲组建“菊苣联盟”，倡导以菊苣取代咖啡的好处。

11 巴黎咖啡馆

我想表达的是，咖啡馆是一个可以让人疯狂的场所。

——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

到了巴黎，我第一个想去的地方就是邮局，我要去那里领取那些拉贾斯坦假画。现在来到法国，看到法国人严肃的样子，还有灰暗的大楼，我才明白自己是个白痴。偷渡艺术品这件事不但是骗人的点子，就连印度的其他一切——霓虹色彩、猿猴神像，都是个谜。我不知道当初我到底在想些什么？怎么会有没脑子的人为了一些假画，把 1200 美元交给两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

我走进邮局之前，决定先到附近一家咖啡馆喝点没有咖啡因的饮料来镇定自己。这是一家很典型的巴黎咖啡馆，全都是以黄铜与假大理石装潢，里面有一群正在闲聊的人。大部分美国人都会担心如果只喝一小杯饮料，却待在咖啡馆太久，服务生铁定会不高兴。但法国人并不光是坐在那里，他们根本就是将那椅子租下来了。他们并不是为了要享受生命而坐着不走，而是因为吝啬的心态。其实，整个 20 世纪初的哲学全都受到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必须节省却又喜欢喝咖啡，所以说一些长篇大论，其实就只是为了要留在里面久一点。当然，你可以免费站在柜台边，可是柜台旁边的地上都是烟蒂。（不知道为什么，巴黎咖啡馆的柜台或是吧台确实都不放烟灰缸。）

我站着快速喝下一杯卡尔瓦多斯（Calvados），就走进邮局。

“先生，真的什么都没有呀！”邮局的人很肯定地说。

“不太可能吧！我还有单据呢！”我挥一挥手中的单据。我在斋浦尔拿到这张单子时就觉得它看起来不太像正式的单据，又经过了三个月的摧残，现在它看起来倒像是一张破破烂烂的卫生纸。

“先生，这是什么啊？”

“那是我的单据啊。”我回答。

他看了那张单子一眼，然后说：“先生，恕我无礼，可是这是哪一国的文字啊？”

“是印度语，不，应该是乌尔都语（Urdu）。”

他把那张纸还给我：“原来如此。先生，你现在是在法国，我们在法国

是讲法语的。我问你，你那包裹是什么时候寄出的？”

“两个月以前。照理说，应该已经寄到了。”

“两个月？对啊，那应该是已经寄到了呀。可是呢，我们只会帮你保留三个礼拜，到时候没有来领取，我们就会把东西寄回去。”

我开始学他的语气讲话：“啊！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可是呢，我还没有在那件包裹上面写邮寄的地址！所以，你们应该是没有办法寄回去的。因此，那件包裹现在应该还在这里吧？”

他冷冷地笑了一下：“你错了，先生。如果上面没有寄件地址，我们就会把它给烧了。”

“烧了？”我不太懂那位先生的意思，“你是说用火吗？”

“没错。”

我开始激动起来，接着说：“那可是好几百万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对某些国家的货币来说是价值好几百万。我要见你的主管。”

“你把价值几百万的东西寄到邮局？我可以问一下包裹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吗？”

“油画。是一件很大的包裹，上面还贴有注明它的市价以及保留三个月的字条。你确定没有它的记录？”

“那字条是用什么文字写的？”

“用法文。”

他仔细地看过一张张计算机印出来的数据后说：“根据记录，前一阵子是有从印度寄过来的东西……”他停了一下，又说：“把你的名字跟相关资料写给我。”

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个仓库，用来装所有地址错误、无法寄送、难以辨认、没人领取，邮局又懒得烧掉的包裹。如果我可以进去的话就好了，我边填写数据边想。谁知道我会找到什么？梵高的耳朵？或是女王的胸

罩？

“你何不直接把地址给我，我自己去找？”我建议他。

他耸耸肩说：“随便你啊，先生。只是那个仓库距离巴黎有400多公里。”

助消化的圣品

当时正处于咖啡热潮期。有一种戏谑的说法是，在欧洲一家最有名的咖啡馆有可能端出最难喝的咖啡。如果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属于浓烈的话，那么法式的咖啡就既苦涩又油腻。维也纳人喜欢他们的咖啡馆，不但宽敞而且舒适，里面摆放的都是又软又厚的坐椅，而巴黎的咖啡馆却塞满一堆小型的桌椅，感觉就好像是警察局的审问室。而这些并不代表哪一种咖啡文化比较好，因为这世界充满着被虐待狂，可以说每个国家都有它们不同的文化。

例如，巴黎的咖啡馆可以显示这国家崇尚流行的疯狂程度。我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如果我们回到 17 世纪 70 年代这个转折点，就可以证明我所说的是有根据的。更具体地说，应该是在 1672 年的时候，有个叫帕斯卡尔（Pascal）的美国人¹在巴黎靠近圣日耳曼（St. Germain）的地方开了第一家咖啡馆。那是一家简单、朴素的咖啡馆，一点也没有豪华舒适的感觉，所以不会引起法国人的兴趣。于是很快地，这家店倒闭了。而咖啡一直是一种具有医疗性质的饮料，或许从此不会再传入巴黎了，而当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也正要入侵维也纳。土耳其担心法国会插手，所以派遣了大使索里曼·阿伽（Soliman Aga）怂恿路易十六，要他签下不会对土耳其采取对抗战争的条约。

阿伽到了法国之后便开始说服路易十六，他开始邀请巴黎最上流的人士到他的住处聊天，并按照土耳其的传统分享咖啡。巴黎人对咖啡早已有认知，只是没看过这样的喝法。受邀的贵宾首先会进入一个挂着昂贵的高级土耳其地毯的房间，在喝咖啡之前，他们要先将双手浸入一盆放满玫瑰的净水里洗干净，然后走进一个燃烧着没药的丝质帐篷里，没药的香味熏满贵宾的脸颊后，会有一位美丽的非洲女侍穿着华丽的传统服饰，为他捣碎、烘焙与调制神秘的“黑酒”。根据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的叙述：“她会弯着膝盖呈上最上等的摩卡咖啡……她会将咖啡倒进一个金银打造的小碟子里，然后放置于绣着金花边的丝质咖啡杯垫上面。”

这种异国风情实在太诱人了，久而久之，阿伽的邀请便成了最被称羨的事。路易王刚开始还不肯接见阿伽，后来也邀请他到皇宫。他们的会面可以说是种时尚的比评：他们比较了法国洛可可式风格与土耳其神秘的

气氛。路易十六还为了这件事订做了一件约 3000 多万法郎的长袍。不但如此，他还用大量的银子做了一套桌椅来装饰大厅，并安排了几百个侍者。阿伽则是一人出席，穿着简单的长袍。他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咖啡杯组——纯金的咖啡杯，镶着钻石的小碟子，还有罕见的中国瓷器。

法国人很喜欢阿伽的土耳其风。很快地，法国的上流社会都有一间房间专门以土耳其风为主题装饰，他们会穿着阿拉伯服饰喝咖啡，由努比亚（Nubian）的奴隶服侍。莫里哀（Molière）在《醉心于贵族的小市民》（Le Bourgeois Gentilhomme）的剧本中把这种风尚塑造成一股热潮：

儒尔丹先生：（戴着很大的头巾进入）我跟你说，我是个“Mamamouchi”。

儒尔丹太太：那是哪一种兽类？

儒尔丹先生：在你们的语言里，是土耳其人的意思。

儒尔丹太太：土耳其人？你的年龄适合当摩尔舞者吗？

路易十六签了合约，接下来的十年内，维也纳也遭到了土耳其人的攻击。土耳其战败之后，在巴黎的咖啡风潮也逐渐冷却下来。维也纳危机过后三年，有一个西西里岛人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咖啡馆，叫作“普蔻咖啡馆”（Café Procope）。

这家咖啡馆从阿伽那里学到了一点调制咖啡的技术，那时对法国人来说，咖啡是一种时尚的象征，而不只是单纯的饮料。跟早年朴素的咖啡馆相比，普蔻咖啡馆显得高贵许多，咖啡厅里摆着大理石的桌子，还有多面的镜子与华丽的吊灯。服务生都戴着法官式的假发，除了咖啡，他们还提供土耳其的冰冻果子露与利口酒（liqueurs，一种甜而香的烈酒）。这个西西里人创造了一个很完整的迪士尼般的上流咖啡馆，当时的法国人简直爱极了。伏尔泰、拿破仑、卢梭、达朗贝尔（d'Alembert）都成了常客，可以说今天戴着米老鼠帽去迪士尼乐园的人都会想去。普蔻咖啡馆很成功（营业了 300 多年），也说明了这种富丽豪华的咖啡馆才是巴黎式的咖啡馆。

或许是因为法国人不喜欢土耳其的“苦酒”，阿伽为此将糖介绍给法国人。1670 年，塞维尼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曾经写过：“法国人有

两种东西绝不会接受，那就是咖啡与让·拉辛（Jean Racine）的诗集。”奥尔良公爵夫人把咖啡比喻为煤烟；路易十四认为咖啡是又低级又恶劣的饮料。但是无论皇室如何不喜欢咖啡，他们最后还是因为它的独特而心动。16世纪的咖啡学者巴鲁丹奴斯（Paludanus）就曾说过：“咖啡可以让人放屁，或是使不通的地方变得通畅。”咖啡便是以这句话闻名于欧洲。²严格说起来，这种咖啡应该是一种由奶油、盐、蜂蜜与咖啡混合在一起的浓稠的糖浆，当一个人不小心将鱼骨（像三英尺长的鲸鱼骨）咽进喉咙或是吞进胃里的时候，就可以用到它了。虽然法国人不会去证实它的效果，但他们的确非常重视“不通畅”的议题。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里面就有一整篇专门写这个题目，而且据说就是在咖啡馆里写出来的。而国王则为了便秘而苦恼，他甚至将餐厅用的椅子做成马桶，让他随时都可以上厕所。罗浮宫最有名的一项工作就是带着棉花球和银碟子，将太阳王（Sun King）很久才有一次的粪便带去化验。

从这个古老的传统来看，法国人不但有饭后喝咖啡助消化的习惯，还曾试着改变他们对咖啡的看法。首先是咖啡豆，法国人喝的咖啡有一半是罗布斯塔种类的咖啡豆。罗布斯塔豆虽然质量不太好，可是它的咖啡因成分很多。咖啡因会造成肌肉伸缩，而这种现象又因为特殊的法式烘培方法更增加效果。他们把咖啡豆烧到炭与油脂的成分都析出，炭可以吸收肠胃中的胀气，而油脂可以算是通便顺肠的助手。

咖啡馆里的革命

邮局需要花两个礼拜追查我那些古董画的去向。巴黎的生活费用实在很高，我决定找一些临时的工作来做。20世纪80年代我曾在巴黎做过事，像是打字或洗碗之类的工作，但这次我想在巴黎的咖啡馆当服务生。在普蔻咖啡馆的时代，服务生不但服务顾客，还因为曾听过伏尔泰最新的演说，所以他们也有经验平息争执。到现在，咖啡馆的服务生还算是地位。每年还有咖啡馆的服务生比赛，看谁可以端着咖啡跑得最快。当服务生又可以做法国服务生最爱做的两件事：穿紧身裤以及取笑游客。

我想我去拉丁区的希腊咖啡馆应征会比较有机会。经过一天的打听，终于有一家咖啡馆愿意用我。那是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好像根本没有客人进来过。这家咖啡馆的经理是一个叙利亚人，他穿着干净的服装，像老朋友一样地欢迎我。他带我到店后的办公室时，我看到厨房里还没洗的杯盘堆得很高，这里除了经理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员工。我们聊了一下我的工作经验（只有一点点）以及我的工作签证（伪造的）。最后，他问我是不是洗碗工会的会员。

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听错，什么洗碗工会？有这种工会吗？我说：“我是来当服务生的。”

他耸耸肩说：“没有什么分别啊。”

“哦，没有分别吗？”

“对，是一样的意思。”

我后来懂了！原来洗碗与服务的工作都是我的。“两件事情都是由我做，是吧？”

“那当然，你说你有当过厨师的经验？”

“是的。可是……”

“但你不是洗碗工会的会员的话，恐怕就不能用你了，因为他们管得很

严。”

我同意他的说法，于是站起来准备离开，我接着说：“不错，他们是非常严格。不过，我现在马上去拜托我一个老朋友帮我加入这个工会，我肯定他绝对可以帮忙的。”

我说的朋友，是我在巴黎工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穆萨。繁荣的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总统使美国的经济复苏，而巴黎的物价连像我这样的美国佬都付得起。真的很感谢他！只要付 50 美分便可以在我喜欢的咖啡馆里装模作样，而一杯红酒也不超过一美元。我住在河边的旅馆，面向罗浮宫，每个月的房租还不到 75 美元。就算我的房间既简陋又寒冷，或是我的时薪只有 2.5 美元，这些都没关系。穆萨之前也是一个洗碗工，现在是厨师，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我成为洗碗工会会员。他是来自撒哈拉郊区的一个仁慈、传统的乡下人，他的笑声像个小女孩，鼻子就像小木偶一样，又很喜欢跟人握手。他的优点讲也讲不完。他可以说是一个稀有而且亲切的好人。但很可惜的是，他帮不上忙。

“什么洗碗工会？简直是荒唐！他一定是喝醉了才会这么说。”穆萨说。

所以我只好去找巴特兰先生。巴特兰是一个已退休的工会法官，现在住在他家人开的旅馆里的一间套房。他是一个大约 80 岁的矮小男士，讲话有些结巴，牙齿又有些紫斑。

他跟我说：“啊！先生，你知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就算是法国人也不见得可以进入这个工会。想要在咖啡馆工作，你一定要是奥弗涅人（Auvergnat）。我相信他们才是咖啡馆的领导族群。”

“有咖啡族这种东西吗？你是说像印度那种阶级制度吗？”我问。

“你不知道奥弗涅人的故事吗？他们可是巴黎咖啡馆的教父。”他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他们是一个种族或是一个大家庭，但不是阶级制度。我的家族也是奥弗涅人。”

“你家也开咖啡馆吗？”

“你坐的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家咖啡馆。以前咖啡馆和旅馆都是一样的。”

奥弗涅省是一个离巴黎 500多公里南部的山区省份，如今是一个骑马的好地方。在 18世纪，这儿是一个贫瘠之地，住在这里的人均以采煤矿为生。这里的人之所以被称为奥弗涅人，就是因为他们有倔强独立的个性，据说他们是乌克兰人的后代。根据巴特兰先生的说法，奥弗涅人经常在巴黎市内贩卖煤炭。一开始，他们也卖水与柠檬汁，利用自产的煤炭烧水，后来，当咖啡变得流行的时候，他们便会外送到客户家中，这个巴黎的传统来自 17世纪的一个瘸子小男孩雷恩·坎迪亚特（Le Candiot），他挨家挨户卖咖啡。

后来，由于把所有煮水的家当全带到街上来回穿梭实在太麻烦了，奥弗涅人就选择在固定的一个地方贩卖他们的咖啡。慢慢地，他们的小摊位开始增加隔板，偶尔也会放几张椅子在外面。就这样，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花神咖啡馆（Café Flore）、立普咖啡馆（Café Lipp）等小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到了 19世纪末期的时候，已经有大约 50万奥弗涅人迁居到巴黎，至今他们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种族，有自己的报纸与特别的村落聚会。

巴特兰先生的祖先就是最早来的一批奥弗涅人，他们原来住在奥弗涅北部的圣康多（St. Come d'Olt）。

“我们在 19世纪的后期就选择在这里定居。”巴特兰先生说，“我猜想，我们家族有一半的人都曾在这里开过咖啡馆或是旅馆。”

到了 18世纪中叶，根据历史学家米什莱的说法，这些奥弗涅人与他们的祖先所建立的许许多多的咖啡馆，已让巴黎成为一个大咖啡城。跟英国一样，法国的咖啡馆是一个充满政治言论的地方。有趣的是，这两国的政治论坛有其不同的方式，英国的是严肃正经，而法国则把政治当做看戏。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盲人咖啡馆（des Aveugles），这家咖啡馆的节目中有一组盲人合唱团，而指挥家是个聋子，这象征着皇室的无能。这家咖啡馆的隔壁是绿咖啡馆（Vert），他们更夸张，据说里面养着一只专门攻击贵族喉咙的猴子。轻佻、残忍，而且非常会挖苦人，这就是可怕的巴黎人。

到了 18世纪 80年代，一位英国旅行家亚瑟·杨（Arthur Young）于 1789年有下列记载：“巴黎皇宫咖啡馆内外都挤满人潮，全都在聆听即兴公开的演讲会……这种场景很令人惊讶，每一次讲者讲到用暴力去对抗当前政府的话题时，都会博得如雷的掌声，这种接近疯狂的情形令人无法想象。”7月 12日，卡米尔·德穆兰突然跳到桌上，怂恿客人拿起武器反

抗政府。之前，他们已经有无数次试图推翻政府，但最后却没有实行。这次，他们先讨论什么颜色最适合作为代表革命的旗帜。（是要用绿色代表重生，还是要以红色代表热血？）大家一番热烈讨论后，咖啡馆里的顾客确实离开了座位，走出咖啡馆，像人们后来知道的那样推翻了法国君主体制。

当时有些社会评论家认为，是咖啡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以及第一次民主革命的发生。米什莱曾这么写道：“这道突然迸发出来的光芒，这项伟大的荣誉，毋庸置疑地有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咖啡的出现……就是由于咖啡的出现，使人们养成了新生活习惯，同时也改变了民众的气质，给人类带来光明的远景并开启真理的光芒。”³而历史学家纳尔西斯·阿希尔·萨尔万迪（Narcisse-Achille de Salvandy）更是强调咖啡馆的功劳，他说：“政府斗不过人民对咖啡馆的情感。会发生民主革命，主要就是肇因于咖啡馆的支持者，而拿破仑之所以会成功，也是因为受到咖啡馆的支持。”

他们写得真是精彩，而且或许还有它的真实性呢。不过，还有一个不是很风光的七月革命历史事件也跟咖啡扯上了关系，又一次深深地影响到高卢人（Gallia）⁴的消化系统。那就是恶名昭彰的萨德（Sade）侯爵被关在巴士底狱的时候，也就是在7月2日，德穆兰跳上桌子的十天前。

当时，萨德侯爵与巴士底狱的守卫发生争执，他抢了一个漏斗，然后用漏斗把他在监狱用的尿壶里的尿倒进外面的护城河里，然后以倒干后的尿壶当扩音器，往窗户外面大叫，说政府的人在牢里割犯人的喉咙，试图煽动人民。这个举动果真引来许多人聚集在巴士底狱外面围观，而当监狱的守卫试着打开他那扇小门的时候，他更积极地催促外面围观的群众赶快救出监狱里的政治犯。最后，他还是被制服了。

许多历史学者都不明白为什么革命家要攻打巴士底狱，大家都知道监狱中只不过关着几个贵族罢了，而萨德侯爵就是其中一个。萨德侯爵大闹过后不久，有传言说政府会将所有政治犯都移到巴士底狱处决。谣言越传越大，十天之后，巴士底狱就被围攻了。反抗者并没有发现任何政治犯，而狱中总共也只有三位罪犯。但他们也找到了一堆密藏的武器，如果没有这些武器，法国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萨德侯爵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呢？原来又是大便不顺畅的老问题。他饱受胀气的煎熬，被关了12年之后，肚子已经肿胀得一塌糊涂。他不断地要求提供“正式”早餐，而当最肮脏、最无礼的侍者把他的软垫拿走时，

他气愤得无法忍受。虽然没有资料清楚地记载萨德侯爵有喝咖啡的习惯，但很显然，缺乏咖啡的确让他无法顺畅排便。他受折磨的嘶吼便是引起 1789 年 7 月 14 日巴士底革命的导火线。

从这里开始我们已经进入法国咖啡馆所谓的“黄金时期”。大家应该都知道我要讲的这一群人，包括法国诗人兰波与保尔·魏尔伦常在死耗子咖啡馆（Café du Rat Mort）出现。这两位诗人在当时惊爆巴黎社会：兰波割伤了魏尔伦，而魏尔伦也用枪打伤了兰波。存在主义者如萨特与加缪在花神咖啡馆出没，而美国人则群集在立普咖啡馆与圆顶咖啡馆（La Coupole）；立体派的艺术家如毕加索喜欢到灵兔酒馆（Le Lapin Agile）；达达主义者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与超现实主义者布勒东（André Breton）则是圆亭咖啡馆（Ronde）的常客。法国剧作家亚历山大·席恩（Alexandre Schanne）与亨利·穆杰（Henry Murger）就是以咖啡的颓废为主题做演讲。咖啡馆店长常抱怨：“我们的服务生因为要听这些无聊、没知识的话题而备受影响，这使他们不但退化而且变得呆滞。”

虽然我很欣赏这些哲学家与艺术家，但我还是得指出，他们只会纸上谈兵，而皇宫咖啡馆的德穆兰和他的伙伴们却付诸了实际行动。

不过，这群艺术家与哲学家所留下来的特殊传统，就是只买一杯咖啡，便可以在咖啡馆里面耗上一整天。这种“恶行”可以说是由萨特带起的，根据花神咖啡馆的创始人保罗·巴布尔（Paul Boulal）的说法，这位傲慢的存在主义者是“最糟糕的顾客……他只买一杯咖啡就从早上坐到晚上，也从不续杯”。就是因为这种习惯，巴黎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咖啡城市，现在想要点一杯咖啡却非得比其他国家贵上许多，价格甚至高到七美元，比维也纳的四美元与阿姆斯特丹的两美元要高很多，也难怪法国人不再去咖啡馆了。在 1960 年，法国有 25.2 万多家咖啡馆，到了 1982 年只剩下 18 万多家，几乎少了一半。每次我到一家咖啡馆，就会听到有几家老店已经关门大吉。

巴特兰先生曾说过：“是啊，世事多变……有很多原因，例如麦当劳以及其他流行的快餐店兴起。可是从很早以前巴黎就有咖啡馆了，以后也一直都会有。咖啡馆是法国人的历史。”

- 1 帕斯卡尔，据说与 20 年前伦敦第一家咖啡馆的创建人帕斯卡·罗希同为一人。
- 2 有人认为咖啡可以治疗流产、头疼、风湿病、肺病、坏血病、痛风、水肿、肾结石、眼睛疲劳与感冒，不过最普遍的是当做帮助消化的饮料。
- 3 他甚至以咖啡种类供应的改变来分类法国启蒙运动。当也门的淡色咖啡豆开始供应时，漫不经心的贵族咖啡馆也开始处于支配地位；而中等强烈的法国波旁（Bourbon）咖啡豆则带来伏尔泰的诗集；当浓郁、粗糙的加勒比（Caribbean）咖啡豆成为主流时，社会又被严格规范，进入黑暗又暴力的时代。
- 4 高卢人，古代法兰西称呼，是一种戏谑的称法。

12 咖啡与新世界的相遇

贝多芬习惯在早上以咖啡壶煮咖啡，咖啡已成为他不可或缺的营养品之一。煮咖啡的过程中，他与小心翼翼的东方人一样，尤其在有客人来访时，每一杯咖啡都要亲自数 60 颗咖啡豆。

——安东·辛德勒（Anton Schindler）

谁将咖啡带到新世界

在18世纪的欧洲，咖啡的消耗量很大，当时已经存在着供需关系的问题。据说在17世纪晚期，路易十五（Louis XV）每年为女儿花在咖啡上的费用就高达1500多美元。到了1740年，咖啡的价钱降到一杯只需50美分，就连无业游民也付得起，这显示咖啡已经在欧洲殖民地的三个大洲繁荣兴盛。当初，第一个将咖啡偷渡过海的是巴巴·布丹，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咖啡偷渡事件发生在1616年，当时有一位荷兰船长布洛克（Pieter van der Broecke）从麦加偷了十几颗咖啡树，种植在爪哇，也因此使咖啡的别名从摩卡变成了摩卡爪哇（Mocha-Java）。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1720年，有一位法国贵族名叫加布里埃尔·德·克利（Gabriel de Clieu），是他将咖啡树苗运往新世界。

当我在巴黎阅读德·克利的故事时，我联想到维也纳间谍哥辛斯基。那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不但有海盗、有间谍，也有船难的故事。我调查他的资料时，发现他的故事几乎都是根据他自己在1774年所写的信件而来。当我更深入了解时，发现这个故事其实存在许多版本，其中还包括一位法国医生，因为那位法国医生治好了也门苏丹王的耳痛，所以获得了60棵咖啡树苗的奖赏。还有，荷兰人早在1714年（早德·克利六年）就在南美的苏里南种植咖啡；甚至还有葡萄牙的士官与法国伯爵夫人发生婚外情，夫人送士官一束咖啡花的事件。此外，圣方济会的修道士也曾在记载中出现。

看了那么多记载，结果还是没人知道咖啡到底是被怎样移植到新世界，只因为德·克利编的故事最为精彩，所以大家就以他的故事为准。我曾试着找出更多有关这位法国贵族的资料，可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找了一个礼拜，还是只得知他于1686年出生在一个叫“Anglequville”的小镇。他曾当上瓜德罗普（Guadeloupe，距离法国本土约7000公里的一个岛屿）的总督，但仍然没有人知道他被埋在哪里。我曾试着寻找他出生的小镇，最后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地方。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小镇位于法国大西洋北岸靠诺曼底的一个地区。

后来我为了了解德·克利的说法是否正确，同时又等不到法国邮局帮我寻找拉贾斯坦画的消息——我想他们可能找不到那些画了，于是搭上前往诺曼底的火车。在这趟旅程中，沿途的风景非常美丽，给人一种秋天

的气息，绿色的草地上点缀着许多乳白色的绵羊，苹果树也果实累累。我经过了鲁昂、欧费以及数个小镇，发现规模越小的城镇，名字就越长。之后，我到了目的地，但是并没有看到 Anglequeville，可是不久，我闻到了海洋的味道，这时火车也停下来，我才发现我已经到了终点站迪耶普。离开车站之后，我在附近一家酒吧的楼上租了一间平价的房间，开始了我的探险。

我的寻访可不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我不知道 Anglequeville 在哪里，但是这个名字看起来就好像是法文“Anglais Ville”的缩写，英文则是“English Town”（英国城）。既然德·克利是一位法国船长，又住在与英国有关系的城镇里，就应该是此地其中的一个港口才对。我只需要一一搜寻这些港口，或一间一间地逛酒店，问问谁有听过德·克利这户人家就可以了。

迪耶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镇，有人会在街上烤鲑鱼，教堂旁有一家小超市，城里几乎都是 45 岁以上的微胖的中老年人。我拜访的第一家港口酒吧是水晶咖啡馆（Cafe Le Crystal），里面有一位穿着蓝色吊带裤的男子正喃喃自语：“鱼儿捕鱼，我们也捕鱼，所以鱼儿是我们的兄弟，因为我们都是渔夫，不是吗？”

我点了一杯啤酒。男子继续跟我说：“鱼是鱼。你不懂吗？如果鱼捕鱼，它们就是渔夫啊。所以我们是在捕渔夫。可是我们也是渔夫啊！所以我们是在吃自己的同胞，不是吗？”

“哎呀呀！”一位坐在酒吧后台的金发女郎说，“才不是呢！吃鱼的鱼是同类相食。我们只是捕捉同类相食的动物，又有什么错呢？同类相食的动物本来就是恶心、该死的东西！”

“对啊！况且，我的朋友，捕鱼的鱼并不是渔夫，而是渔鱼！”一个穿着皮衣的光头男子补充发言。

穿着蓝色吊带裤的男子坚持：“不，不管怎么说，在大海中捕鱼的都应该是兄弟。如果警察吃了另一个警察，他不也就是食人族吗？”

光头男子喝了一口啤酒，说：“如果他是头猪的话，那就不是了！”

他这句话让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我趁机发问，是否有人听说过德·克利或是他的出生地。

穿吊带裤的男子说：“问鱼儿们吧！它们什么都知道。”

“德·克利？”酒保说，“没听说过。”

我想解释：“是一个满古老的名字，我也不大确定……”

酒保突然很不客气地回答：“我不知道！谢谢惠顾，再见！”

此时，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光头男子，他说：“听好，我不知道叫德·克利的家族，可是火车站旁边有一条德·克利街，说不定他们就住在那里。”

等我回到火车站旁，果然在一家药房的墙上看到钉着一个写着“德·克利街”的牌子。我很高兴地在一家简陋的酒吧吃饭庆祝。我点了鳎形目鱼、薯条、鲑鱼奶酪以及焦糖奶酪，还跟服务小姐聊到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

在几杯白酒下肚之后，我毅然决定跟她结婚。我们还是会住在迪耶普，然后跟其他的人一样，我会去捕鱼，到了夏天，会有很多的旅客来此观光。我跟她会生很多小孩，而他们以后也一样会有很多很多小孩，如此一直延续下去。

○

“是的，是的。我是加布里埃尔·德·克利的曾曾曾曾曾曾曾孙女。可能不只这样，但我无法确定。”凯瑟琳·伯内·科泰勒（Catherine de Beaunay-Cotelle）女士用自己的手指头边数边说。

很难相信自己的运气有这么好，因为迪耶普不但是德·克利的出生地，他唯一的后代也住在这里，她是一位穿着黑白相间的服饰、表情严肃的法国女士。隔天，她就载我到位于隔壁村庄的办公室。三年来，这位女士一直在记载她祖先的伟大事迹。

“你不用怀疑，我可以确定是我的祖先把咖啡树苗带过来的。这是经过证实的历史记载，甚至有一本书专门叙述这项记录。”她递给我一本黄色的书籍，书名是《向德·克利勋爵致敬：迪耶普冒险时代的咖啡传奇》（Gabriel de Clieu: Hommage au chevalier），凯瑟琳·伯内·科泰勒著。

“可是这本书是你自己写的呀！”我质疑这本书的准确度。

“当然啊。谁会比他唯一的后代子孙更清楚呢？”她反过来问我。

有道理。她还有信件可以证明德·克利确实是咖啡在新世界的开拓者，来自路易十五、马丁尼克总督、各个殖民地的贵族，以及一个美国生物学者，这位学者还将一个咖啡种类的名称取名为德·克利。她甚至还有德·克利族徽的影印本，一只张着嘴的老鹰，准备好要作战的样子。老鹰的头上沾有三粒沙子，就站立在银色的大地上。

我向凯瑟琳说，她看起来确实很像书上的德·克利画像。书上的德·克利戴着假发，有一双海灰色的眼睛，看起来很温和，但绝不是一位可以随便开玩笑的祖父。其实，凯瑟琳本身也蛮严肃的。当她看到我正观察她眼神时，她说：“这是我非常热衷投入的事情，已经成为我一辈子的事业了。”我很确定，她有着如德·克利一样的眼眸。

除了记载德·克利到新世界的海上探险记之外，她还想开一家博物馆，主要目的就是说明咖啡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最近，她还成立了“德·克利协会”（我是第251个会员），同时说服了邻近的17个村庄，共同买下德·克利爵士已经荒废的古堡当做博物馆预定地。

根据凯瑟琳的说法，她的祖先因为法王查尔斯六世的关系而被列为贵族。德·克利于1687年出生在迪耶普，1702年加入军队，接下来的15年，德·克利都在法国的加勒比海度过，他在赢得许多荣誉后结婚。往后大部分时光，他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一直到1717年，他听到有人为了偷运咖啡树苗而丧命，不久后，他便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挑战。最后德·克利成功了，他获得了瓜德罗普总督的职位，而且是圣路易的指挥官，同时也成为了全世界咖啡族的英雄。

“他在巴黎过世的时候很穷困，就算他是一位总督也无法幸免。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总督。当他没钱的时候，瓜德罗普的人民曾打算寄给他15万法郎，可是他拒绝了。”凯瑟琳述说着。

“可是他还拥有土地呀？”

“不错，他家族的后代仍拥有这里约80公顷的土地，可是他仍然穷困潦倒地死了，自由革命之后，大多是这样的结局。”凯瑟琳一边收拾笔记，一边说着，“但是我的祖先为世界所带来的贡献是绝对错不了的。

你想想！一个人可以带给全世界那么多的欢乐。”

“是的，真的很不可思议！”我停顿了一下，真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对此抱持的讽刺态度，“他在海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真的吗？听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整件事情会是真的吗？”

“啊！的确是很不可思议，可不是吗？请你过来看看。”她带我到一栋开满着花朵的建筑物前。她指着花朵说：“你看到了吗？”我四处看了一眼，并没有看到什么。突然间，我发现在一丛花朵与蕨类植物的后面，有一面墙全部画着德·克利在海上的情形。画上有海盗、美人鱼以及即将渴死的水手，海上正有一场暴风雨。最后一个画面是马丁尼克乐园，画中德·克利妻子的膝盖上坐着一只猴子，还有一个非洲奴隶正奉上一杯咖啡给她喝。画上的某些颜料已经开始褪色了。

“这是他的宿命。”凯瑟琳接着说，“我还去查了他所属的星座，他出生的星座有土星，表示他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还有，水星代表他会经历一段长途的旅程。他在星历上的象征是右手捧着篮子，左手握着种子的男子。这表示他会为全世界播撒伟大的种子。”

“可以告诉我他是属于什么星座吗？”

“我们猜他是 1687年 6月 30日出生的，属巨蟹座。”

“真的吗？那也是我的星座呀！”

她嘲笑地说：“我不信这种东西。但如果你打算和我的祖先走同样的路，请记住带一瓶水。”

追寻咖啡的路径

根据凯瑟琳的说法，德·克利是从迪耶普南方 20 多英里处的罗什福尔（Rochefort）出发的。我于是跑到罗什福尔，打算到那里赶搭一艘货船，可是扑了空。事实上我后来也知道，想直接跑到商船上做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欧洲的货船是需要预先订位的。我唯一能找到的船只是一艘不定期的货轮，它正要从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港（Genoa）离开。我还得付钱坐船呢！虽然不是很多钱，但一定要现金，而且也不担保启航的时间。这艘不定期货船并没有要前往马丁尼克，而是要到著名的巴西咖啡港——圣多斯港（Santos）。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很复杂，无法详细说明。譬如，到了开船的日子，我的船决定晚一点才出航，甚至出海时间在 24 小时之内变更了三次，我也因此必须在罗马与那不勒斯（Naples）逗留数个礼拜，看了无数的切利尼（Cellini）、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与拉斐尔（Raphael）的作品。

等了四个礼拜之后，有一天，当我站在海港等待上船时，才发现原来的船已经走掉了，代替它的是另一艘船。这对我来说其实都无所谓，只要可以带我离开这里就好了。

一般作家通常都会把海港描述得既浪漫又神秘。或许以前真是如作家所写的那样，但现代的海港比较像停车场，而船只更像摩天大楼。我搭乘的船身长达 200 码左右，浮在海上的有五层楼高，另外潜在海底的还有六层楼高。码头上堆满了蓝色与红色的铁箱子。在 19 世纪，要运送六万磅的咖啡，大约需要 300 艘船与相当人数的装卸工人（每次搬货要扛 200 磅）。现在，只需要一天时间就能搞定，搬货也只需一个人操作起重机。

那天我看到跟我一起搭船的乘客总共只有八个人，而且大多数都是 70 岁的人，里面没有人会讲英文。过了两小时之后，船员才把我们带到船底的交货区。有一个戴着假牙的意大利男子叫我一定要跟他同桌用餐。之后船员又带我们到客舱，那里所有东西都是蓝色的。当我卸下行李时，有一间客舱的婴儿开始号啕大哭，而船底则发出一声巨响。

早期的欧洲探险家最常做的，就是把外国植物介绍给其他国家。他们原

来专注于把新世界的罕见物品带入欧洲，例如西红柿。糖是第一个由旧世界带到新世界的物品，而咖啡排行第二。据说早些时候，就曾有人三番五次地试图将咖啡树移植到欧洲，而德·克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人。

不论故事怎样发展，当德·克利向路易十五索取两株咖啡树苗时，国王却没有一点感激的心。因为路易十五实在太爱咖啡了，他不但亲自将咖啡树苗种在园子里，还自己烘焙咖啡豆，自己煮咖啡。这些咖啡树苗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它们其实就是从摩卡港偷运出来的咖啡树苗的后代。路易曾经在他的咖啡品尝会与情妇杜拜瑞夫人发生性丑闻。

“我曾多次到皇宫去要他们后花园子的一小株咖啡树苗，但始终要不到。”德·克利写着。经过几个月之后，德·克利的脑筋终于开窍，他雇用了一名“年轻貌美的女性”，恳求御医给她几株咖啡树苗。这位女子的名字与她使用的手段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在1720年秋天，那位御医真的带出两株咖啡树苗到罗什福尔的庭园交给该女子。到了10月8日那一天，这两株咖啡树苗被送上一艘名为“骆驼号”（Le Dromadaire）的货船，运往西方世界。

13 航向巴西圣多斯

咖啡的发现与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一样重要，因为咖啡已经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海因里希·爱德华·雅各布（Heinrich Eduard Jacob）

在海上

航海与坐牢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因为在船上无处可逃。固定的用餐时间，难以下咽的伙食，又不能选择同伴。船上的乘客全部在同一个地方用餐，坐在并排的三张桌子前。第一桌坐着一位瑞士籍的生物学家、他的太太和三岁的女儿。另一桌坐着一对年长的意大利籍夫妻、一位 79 岁、法国与瑞士的混血女士。我则是跟两位意大利男子塞尔吉奥与弗兰科同桌。用餐的时候非常嘈杂，货船的震动使我们的椅子不断移动，马达的声音也大到我们得互相吼叫才能听得到，船上提供的餐点不是难吃，就是分量太多。第一道菜是一大碗意大利面，接下来是一份鱼，还有一份肉，然后是蔬菜，最后是一个橘子。我们喝的葡萄酒是用箱子装的，咖啡更不用说了，苦涩无比。

第一次坐下来吃晚餐时，同桌的塞尔吉奥突然大叫：“我爱死面包了！你不喜欢吗？这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面包吗？我实在太喜欢航海的生活了，啊！”

塞尔吉奥年纪虽大，但相当英俊，他灰色的头发梳得紧贴在头皮上，还有一双炯炯有神的浅蓝色眼睛。就算你听不懂他的语言，他也仍然充满魅力。如果有不喜欢吃的东西，他便会把它吐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包在面包里，所以每次用完餐以后，塞尔吉奥的盘子上都会留下一些嚼过的食物与面包。他很喜欢晒太阳，常把自己晒得红彤彤的，眼睛也总是充满血丝。

在航海的第一个晚上，塞尔吉奥似乎还很正常，也表现得非常爽朗。他喜爱船上的任何食物、面包以及巴西女孩等，感觉什么都是美好的。

“我将要在圣保罗的扶轮社演讲。”他骄傲地说。

“扶轮社？那不是跟黑道有关吗？”我开玩笑地说。

塞尔吉奥突然严肃起来，说道：“吃饭的时候，不要谈黑道。”

我这才发现意大利人用餐的时候从不讨论有争议性的话题，譬如：教皇、墨索里尼、北意大利脱离联邦，以及欧盟的问题等，因为这些都让人消化不良，不过我们的伙食也好不到哪里，所以我不觉得会有什么

影响。幸好，塞尔吉奥是一个乐观人士。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包括要去的目的地在内。

“圣多斯（Santos）？你就要去咖啡港圣多斯吗？你很幸运，因为我们的航线刚刚改变，圣多斯已成为航程的最后一站。”他突然停下来，吐出一口咀嚼了一半的肉块，然后又继续说，“你将会在船上享受六星期的大海与美食。”

“六周？不是只需要 14 天吗？！”

塞尔吉奥一副有预谋的样子，靠过来跟我说：“已经不是那样了。可是，你并不需要多付钱。今天开会的时候船长告诉我们的呀！难道你没有听清楚吗？”

我听了马上脸色发青，立即问：“难道船长说的就是这件事吗？我根本听不懂意大利话呀！”

塞尔吉奥高兴地点点头，然后接着说：“是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惊喜吧？”

船慢慢地行驶，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当地的酒吧看着许多八十几岁酒醉的老水手唱歌。后来船驶进直布罗陀海峡，它就是地中海与北极海的唯一通道，过了这个海峡就是汪洋无际的大海了。一想到这里，我就开始感到不安，因为我很怕晕船。所以当天晚上我服用了比平常多两倍的晕海宁（Dramamine），可是到了凌晨四点多的时候，我又醒过来，船在海上摇晃得很厉害，所以我又吃了更多的晕海宁，不久便又昏睡过去。

当我再次醒过来时，整片大海异常平静。而非洲已在我们的右前方了，可是海上的浓雾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此时，太阳也差不多要下山了，我看到了一些摩洛哥的渔船，其中有一艘船让我感觉很奇怪，因为它没有挂任何旗帜，船上也见不到任何踪影，也没有看到任何捕鱼的渔网。当我看到这艘船时，我正坐在船头，它距离我们的货轮大约只有 50 码的距离，所以在它消失于黑夜之前，我已经把它看得一清二楚。

晚餐时，我问维特罗船长，稍早的那艘船是否是海盗船。维特罗船长非常瘦弱，看起来不太像水手，倒是比较像老师。

他对我紧张地笑一笑说：“不，不！现在不会有海盗的。或许几天之后

会看到也说不定。”

“那明天呢？明天会看到海盗吗？”

“或许吧！尼日利亚附近都有海盗。”

现代的海盗可能只会选择私人的游艇下手，但在德·克利的时代，海盗可是什么船都抢，甚至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海盗，就算是最受人尊敬的船长，偶尔也会袭击其他的船只。德·克利出航一个星期之后就遇上了海盗，根据他的说法，这些海盗都是突尼斯人，他们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攻击了熟睡中的德·克利与其他船员。幸好，德·克利的船上有26架大炮，最后他们还是把这群海盗赶走了。

我们并没有遇上劫难，没有海盗、没有鲸鱼，甚至连陆地都没有。我们经过了摩洛哥、神秘的毛里塔尼亚，最后是享有盛名的西撒哈拉——世界上少数没有政治体系的国家。我不断地想着，如果我搭的船不是现在这艘，而是上次我到也门的那艘“卡希德号”，那就更好了，因为那艘船一定会坏掉，这样的话，我们便可以做一些探险。但现在我所搭的“皮萨号”牢固得很，并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航行。

德·克利与咖啡树苗

虽然从突尼斯海盗的劫掠中幸存，但德·克利也从这一次事件中得知荷兰政府在他的船上暗藏了间谍。当时，在爪哇的荷兰政府已经开始生产大量的咖啡，他们跟阿拉伯人一样，希望能独占咖啡交易。很可惜的是，我们缺乏更多有关这类间谍的资料。德·克利自己对这件事发表意见说：“因为有人妒忌我将享受到为国家带回珍贵物品的快乐，所以想偷取我的咖啡树苗。我为了不让他得逞，确实花了好一番工夫。”最后，间谍还曾企图摧毁那些咖啡树苗！

原来，由于间谍企图偷取德·克利的咖啡树苗，这位法国船长必须日以继夜地守候在咖啡树苗旁边。在白天时，他随身带着；到了夜晚，他则把树苗锁在房里。要不是因为德·克利有一个特制的容器可以用来装树苗，荷兰间谍或许能得手。在德·克利之前，所有的植物都是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再放入芦苇做成的笼子里运送，虽然植物可以吸收到阳光，但却同时暴露在具有侵蚀性的海风之下。德·克利发明了第一个可携带的小温室，是一种用木板及铁丝做成的盒子，盒子上方是玻璃做的，这样一来，铁丝既可以通风，又可以防止老鼠侵袭，而玻璃还具有保温功能。后来，这种模型就被用来当做运送植物的工具。有一次，当荷兰间谍终于有机会接近咖啡树苗时，也是由于这个小型温室的铁丝结构，使间谍无法轻易将咖啡树苗从土壤里面挖起来，所以在他被发现之前，只来得及拔下一小株枝叶。

到了1月20日左右，船向右拐了一个大转弯，驶进大西洋，而途中一直跟随我们的海鸥也消失了，接下来的六天，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一种动物。在这段期间，我大多窝在船头，一边阅读《白鲸记》，一边听海浪打在船身上的声音。我认为自己和船长一样在海上冒险。我为了看夕阳，因而错过了晚餐的时间。大部分日子的夕阳都大同小异，比较特别的是，这些日子的夕阳都只属于我，因为船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外面看夕阳，而且除了我以外，几千英里之内都没有人，所以只有我才能看到这美景。

到了26日，我们早上起来看到一群海鸥在海面上忙着捕飞鱼，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圣约翰半岛葱翠的绿色，当时我们正要经过赤道。船长请我们到游泳池旁，颁发经过赤道的证书。副船长则打扮成涅

普顿（Neptune，罗马神话中的海神），用融化的巧克力为我们涂抹，让各位乘客受洗，受洗完后再跳入游泳池泡水。

○

德·克利的船上虽然没有游泳池，但我相信他对水存在着忧虑，因为就是在这个地带发生过著名的德·克利缺水事件。原来“骆驼号”离马丁尼克约 100 英里的时候，因为碰上狂风暴雨，船身破裂。虽然平安度过暴风雨，可是破裂处却无法修补。不久，船身开始进水，所有不必要的东西都得丢下船，包括一部分的饮用水。

暴风雨过后，却又是一阵死寂，又过了两星期，一点风都没有，船员开始后悔将饮用水丢入海中，因为像这样风平浪静的天气有可能维持一个月。每个人每天只能喝半杯水，这对一个人来说根本不够，更不用说是一棵中等咖啡树苗。这也是为什么德·克利会牺牲自己的饮用水，分给这棵咖啡树苗的原因了。

德·克利写着：“我愿意为这棵咖啡树苗而牺牲自己，因为这棵小树将带给我许多荣耀，如果我真的死了，我也认命。我本来就知道咖啡可能带给我的命运。”

许多浪漫主义的诗人都拿德·克利为咖啡树苗所做的牺牲作为写作的题材，可是他们所写的诗几乎没有一首具有足够的水平，就像英国诗人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所写的这首：

每当我喝香浓的咖啡时，
便会想起这位法国人，
因为他崇高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让咖啡能够成功到达马丁尼克的海岸。

但很快地，这棵他所珍藏的树苗，
因为没有水，即将在船上枯萎。

成的伤害是会累积的，而他所摄取的水分，比一般该有的八盎司的一半还少。他的身体会先消耗掉身体内细胞所储存的水分，这样会导致肾衰竭，而当毒素在他的血液中蔓延时，他会始感到肌肉僵硬、头晕脑胀，然后开始产生幻觉，最后死亡。

然而，这些事都没有发生在德·克利身上。风速变大了，在没人知晓的某一天，德·克利唯一存活的咖啡树苗抵达了马丁尼克岛，仅仅小指般大小。德·克利将这棵小小的树苗种在他的花园里，24小时照顾它。不到五年时间，马丁尼克岛已繁殖了2000多棵咖啡树，50年之后，岛上已经有了180万棵咖啡树，而它们的后代今天生产了全球90%的咖啡。

没听说德·克利有后代。虽然他曾结过四次婚，而他六个孩子中也只有一个活下来，他自己也在巴黎穷困的生活中离开人世。因为曾是贵族，所以他在圣叙尔比斯（Saint-Sulpice）的墓地也被法国革命军破坏了。今天，只要花15法郎即可在巴黎的地下墓区参观他所留下的遗物，在那里他和无数人葬在一起。五天之后，一股淡淡的硫磺味告诉我们，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14 巴西奴隶王国

我宁可看见自己的母亲腐烂，也不愿意让奴隶自由。

——巴西咖啡大王

咖啡与奴隶

奴隶与咖啡一直是如影随形，就像奥罗摩武士将咖啡豆带进哈拉一样。最讽刺的是，当这些非洲人来到新世界时，他们收割的是同样盗自非洲的咖啡。南美的咖啡需要有大量的奴隶来帮忙生产，也因此永远改变了非洲与新世界的命运。

德·克利把咖啡苗带到马丁尼克十年后，法国政府开始每年引进 30000 名非洲人做奴隶，目的是想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其中被抓去做奴隶的人几乎有一半客死异乡，可是法国仍然成功地达到了目标。1791年，海地的奴隶成功地推翻了法国政府，接着就成立了西方世界第一个拥有自由的黑人国家。

以数量而言，巴西所引进的奴隶位居全球第一。在 200年内，有大约 300万名非洲人被带往巴西的私人咖啡王国做奴隶，另有 500万人到甘蔗田工作。相比之下，北美洲只有不到 15000名奴隶。

巴西的种植田园与奴隶社会的模型，仍然是现代巴西的基本结构，只有 10%的巴西人拥有全国 54%的财富，而奴隶的直系子孙是文盲或是贫民的概率比一般人的子孙多十倍以上，虽然只有一半的人口是混血儿，但是我在贫民区所看到的小孩几乎全都是深色皮肤，而在海边玩耍的，皮肤明显白了一些。

“那是事实，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马里奥说。

我们坐在里约热内卢知名的科帕卡瓦纳海滩（Copacabana），看着海滩上正在进行的一场排球比赛。玩排球的人都是典型的里约热内卢人，他们拥有完美的身材、古铜色的皮肤，虽然我看不出来，可是浅肤色的巴西人马里奥却说其中只有一位是正统的非洲人。

“你看，他是非洲人，可是也没有人在乎啊！”他指着一个穿着红色名牌泳裤的黑人说，“他可能住在 Favela（贫民区），谁会在乎呢？一件泳裤也值不了什么钱，但这些都都没有关系，玩排球才是最重要的。”

Favela是在一个山脚下临时搭建的简陋小屋区，居民有时会搬进科帕卡瓦纳海滩上的公寓大厦。想象一下迈阿密与加尔各答两个不搭调的城市

结合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玩排球，就表示巴西没有种族问题吗？”

“不，不，当然还是有问题。黑人比较穷，但巴西人并不在乎钱。看看你们国家.....有些黑人多有钱，像迈克尔·乔丹或是鲍威尔将军，可是白人与黑人还是无法和睦相处。每一个人都永远想要得到更多。在巴西，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和和平相处，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用脚玩排球呢？”我问他。他说，他们的排球队都是用脚发球的，对打与杀球也是一样。这种球赛是里约热内卢独特的运动。他们甚至可以用脚来调音响的音量大小。

“难道他们不知道猴子跟人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用手吗？”

“在里约热内卢，大家都是这么玩的，这就是里约的运动方式。”他说。

“你也是吗？”我看他不太像是喜欢玩球类的人。

“除了我以外。”

我指着一只狗，它一直在球场上玩一颗椰子，用嘴推来推去。“也许这只狗想告诉我们如何用嘴玩球。它会说这是狗的玩法。”

马里奥笑了，他觉得我很幽默。可是他会讲我的语言，我怀疑他是不是心怀鬼胎，说不定会对我不利，搞不好要洗劫我呢！

咖啡帝国最兴盛的地方位于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在那里种植三四百万棵咖啡树是很普通的事。我想要找的是赫赫有名的格朗·莫戈尔（Grão-Mogol）经营的咖啡园，他是一位葡萄牙贵族。马里奥将巴西的奴隶社会概括为一个精神分裂的社会，可是根据他的说法，这个奴隶社会仍然“带给大家许多乐趣”。

这位恶名昭彰的咖啡王所经营的咖啡园就位于里奥克拉鲁（Rio Claro）。当时，里奥克拉鲁也是一个小有名声的地方，如今只是通往圣保罗的一个市郊城镇，只有一些郁郁寡欢的青年人成天模仿着美国的偶像明星。

里奥克拉鲁非常热，是我到过最热的地方，我在那里的日子，平均每天都在华氏 120 度左右。因为我的地图已经很老旧，所以第一站先到市政府要一份最新的资料。那时市政府大楼外面正排着一大群人，原来大家都是为了购买乐透彩券而来。我就近向一个人询问计划处在哪里。

“我们城里没有什么计划处！”他回答，“我告诉你，这里没有人会计划任何东西的！巴西政府不做计划的。”

最后我还是找到了计划处，我向一名叫琳达的职员谎称自己是学生，正在做咖啡种植园历史的研究。我问她是否知道格朗·莫戈尔咖啡王的种植园在哪里。

“格朗·莫戈尔？知道啊，那是法兹安达·安杰利克的罗西（Fazienda Angelique Rossi）家族。”

“他们是谁呢？”我问。

“我想他们就住在法兹安达。”她用葡萄牙文对里面喊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他们在帮你找地图了。”

柜台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嘈杂，原来几乎一半的计划处人员都在帮忙找地图。我又问咖啡王是否仍有亲戚在世。

“他们都不在了。”她说，“我带你去看。”

咖啡王的种植园在距阿佳皮（Ajapi）约七公里远的地方，到

现在还存在。可是到阿佳皮的公交车一天只有三班，车站距离里奥克拉鲁约 20 多公里。琳达建议我搭早上七点的车才不会太热。

我说：“谢谢你！你人真好。”

“当然，如果他们还在生产咖啡，那就请回来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些信息。”她说。

后来我才知道阿佳皮原来指的只是一条街的街名，由于早上炽热的阳光，到处呈现出白色。便车让我在一间咖啡馆兼酒吧前下车（因为公交车一直没来，所以我就搭了便车），那是由一位戴着眼镜、身材圆胖的

女士经营的。

我走到柜台前点了一杯巴西式的浓缩咖啡，叫作“cafézinho”。这种浓缩咖啡的冲泡方法是用滚烫的热水慢慢冲泡一个类似短袜的袋子，里面装有磨碎的咖啡，等全部的热气都从袋子过滤以后，再重新将过滤后的液体往装有咖啡的袋子倒下，再过滤一次，如此前后重复十次，直到你满意的咖啡浓度。这种方法冲泡的咖啡非常香浓，但也很苦。这种浓缩咖啡，法文叫作“Jus de Chaussette”，意思就是皮鞋的汁液。泡好后，老板娘的小儿子——一个戴着棒球帽，大约 12 岁的小男孩帮我将咖啡倒进一个粗柄的小咖啡杯，那杯子里面已经装有几乎半杯的糖。¹

我接着向老板娘询问，问她是否听说过咖啡王的种植园在哪里。

“噢！”她说，“他的农场大概离这里有五公里。”

“不，不！”她的小儿子插话说，“到那里要七公里，不，应该有八公里远！”

我又向她询问目前住在那里的家族叫什么名字。

“当然叫罗西啦！”她说，“每一个住在阿佳皮的人都叫罗西。”

根据老板娘的说法，罗西家族大约有 500 人住在那个村庄，她的咖啡馆大概有该小区中心的客厅和市政大厅加起来的两倍大。咖啡馆的隔壁是一间烧烤牛排餐厅。在天气较好的晚上，你也可以带着咖啡坐在外面的镶着已褪色的绿松石的长椅上，那个地方也有乡村公交站的两倍大。

“我想你的客人一定大多数是亲戚吧？”我说，“他们会不会老是要求打折呢？”

她笑着说：“打折？他们已经很幸运了，我并没有算他们两倍钱呢！”

罗西家族于 19 世纪中期来到巴西时，咖啡王曾试图将欧洲有契约的仆人带过来做事。但这些欧洲仆人并不符合咖啡种植园主的需求，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像这里的奴隶那样一天做 14 小时的工，而且还要求建造自己的学校，有些甚至还读到了比咖啡王更高的学历。

更夸张的是，当这些高傲的欧洲仆人存够钱后还会要求自由！因此，大

多数的咖啡商都会立刻以当地的奴隶来取代欧洲的仆人，而多数的欧洲仆人在存够钱之后都回欧洲了，留下来的，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买地。

“我记得佩德罗·罗西（Pedro Rossi）买了 100 公顷土地。那是大约在 1920 年的事情，当时他买了咖啡王的旧房子。”她还告诉我一些有关咖啡王的“疯妻子”的事情。不过，她是以一连串的葡萄牙语说的，因为我懂一点西班牙语，所以还可以猜几句。但她的口音实在太重了，最后我还是搞不懂她到底在说什么。

“不好意思，我实在一点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她了解地点点头说：“没有关系。其实我也不太懂你所问的问题。”

○

格朗·莫戈尔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为种植场所，或许是因为红土被视为最适宜种咖啡的环境。最优质的土壤是“红紫土”（terra roxa）。巴西的乡下给人在英国尝了迷幻药之后的感觉，从远处看过去，像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与矮树丛。走近之后才发现，我所认为的“草坪”原来都是高达六英尺的树林，有着棕榈树那样的叶子，而“矮树丛”竟然是高大的鳄梨树。

这些全都是鲜绿色的植物，感觉有点刺眼。许多与卷毛狗一样大的啮齿动物在街上来回穿梭，这时有一个马夫带着一头骡子从远方向我这边走过来，我于是站到阴凉的地方开始为自己盘算。

公里与公斤的换算我永远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其中有一项应乘上两倍才会成为美国的单位，另外一项应该减少一半，至于哪一个该乘，哪一个该除，我就是搞不清楚。

老板娘说到咖啡庄园有七公里的路程，所以我不是有三英里的路要走，就是有 14 英里的路程。差别这么大，特别是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之下，气温超过华氏 100 多度，因此我也对正朝向我这里走过来的骡子感到安慰。

我对骡子有兴趣，主要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因为到 1913 年为止，骡子一直是里奥克拉鲁唯一的交通工具，成千上万的骡子驮着货物，要花十

天时间才能走到圣多斯。有些骡子被沙漠上自然形成的流沙掩埋，有些则被强盗所杀，还有许多骡子的背被 300多磅的货物压扁了。它们都是咖啡的烈士，所以我想，如果我也骑在骡子上来到咖啡王的咖啡庄园，这对它的祖先来说应该也是一种荣誉吧！

巴西咖啡王

男子与骡子终于走到我面前，我问全身白衣的男子知不知道罗西家族。他说知道，接着我又对他说我正要前往此地。

“哇！好漂亮的动物啊！”我指着他的骡子说，“我可以摸它吗？”

男子的眉毛向上扬了一下后说：“当然可以。”

“到罗西的庄园有多远呢？”我接着问他，一边抚摸着骡子的侧腹。他回答了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假装很惊讶路途有那么遥远，又借口说天气这么热，自己有一条腿不好等等。最后，他终于同意以十美元载我一程。

在我骑上他的骡子以后，那男子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好像他就是以前咖啡王专门抓逃跑奴隶的侍卫。他用西班牙语跟我讲，他虽然不属于罗西家族的人，可是他听过这位咖啡王的故事。他还问我知不知道咖啡王骗人说他的妻子是疯子，然后将她关在楼顶，一关就是二十几年。他还跟奴隶生了一堆私生子，他的地下室就是他过变态性生活的地方，也是那些童奴的睡房。

这些我都听过。其实咖啡王并不只沉迷于性欲，他是所有奴隶主里面比较先进的一位，他在遗嘱中提到了 15 个与女黑奴所生的私生子。不过，他也“还给”奴隶所生的孩子自由。尽管如此，早在十年前，巴西政府就已经让所有的童奴恢复了自由。咖啡王与全国最大奴隶主的伪善行为比较起来还算是小事，而这位大奴隶主居然说他身为反对奴隶制度的人士，其实已经有 20 年之久，他上百个奴隶其实是属于他妻子的，他只不过是在帮妻子“处理她的财产”罢了。

○

骡子是用来运送咖啡豆的最好的运输工具，可是却不适合载我。除了步行缓慢之外，它尖尖的脊椎温柔地锯着我，让我觉得好像快要分裂成两半。但我还是忍着痛，直到我们抵达山丘上的一座古宅。

“这就是咖啡王住过的地方，”他向我说，“你应该知道那是一栋鬼屋吧？”

我还以为咖啡王的住宅会像兰波在埃塞俄比亚哈拉的豪宅那样。两者比较起来，这栋大宅显得有些简陋，感觉上不像一个家，而是一个堡垒。二楼 15英尺高的窗子全部紧闭，唯一的出入口是房子旁边的一个狭窄的石阶，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奴隶叛乱时攻打进来。

我站在大门前喊了几分钟之后，自己走进了院子。真不知道这边的礼仪如何。大宅院的一边是一栋一层楼的现代房子，房子的周围都种着小矮树；还有一个红土的院子，原先我以为是一个网球场，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传统中晒咖啡豆的地方。

我看见一位女士从现代房子的屋檐下看着我，当我跟她招手后，一位穿短裤的年轻女子出现在我眼前。她叫卡萝·安（Carol Anne），是佩德罗·罗西的曾曾孙女。佩德罗·罗西于 20世纪 90年代向咖啡王的后代买下这块土地。我向卡萝·安表示自己是历史系学生，她听了就带我进入大宅院。

我走进去一看，这座大宅院相当破旧，墙壁单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壁上的裂痕，里面只有泥土与白蚁啃食过的木柱。脚底踩在地板上，不时发出嘎嘎的声音。

“如果到了雨季，这里会变得很潮湿。”卡萝·安跟我说。一直到 20年前，罗西家族都住这里，如今只剩下工人在居住了。

大约 700平方英尺的客厅里，零星的家具只有一张咖啡王时代所用的橡木桌子，还有另一件家具——一张 20世纪 60年代的浅蓝色、发亮的璠海德革沙发椅。而大多数房间都是空的。卡萝·安带我到楼上一间狭小的阁楼，说这就是咖啡王的妻子被拘禁的地方，从房间里唯一的窗子看出去是一个广场，当时如果女奴隶与咖啡王所生的孩子死了，女奴隶就必须在广场上向咖啡王道歉，没有好好地“照顾他的财产”，咖啡王也会带他所有的奴隶在广场祷告。

“瞧！”卡萝·安打开一扇矮门，矮门的另一边是一个 30英尺高的空间。下面是咖啡王睡觉的地方，现在已全部封锁了。卡萝·安不清楚为何当初会有这道小门。我问她是否知道咖啡王折磨奴隶的事情。

“当然知道。”她愉快地回答我，“在地下室里面。”

地下室里满地是碎玻璃，卡萝·安却赤脚走过这些玻璃。她说：“他（咖

啡王)就是把她们绑在这里。”

咖啡王以他家里最中心的那根主梁作为他鞭打犯人的支柱。那是一根很粗很粗的柱子，外面还包着一层乌黑发亮的铁皮保护那根梁。从40英尺高的屋顶看下来，这根梁好像就从屋子正中间插进来似的，感觉这栋房子完全是靠这根梁支撑着。

咖啡王的忠仆是来自巴西且获得自由的非洲人，咖啡王离去之后，他就与罗西家族住在一起。根据他的叙述，格朗·莫戈尔的社交活动都是品尝美食，他性欲强又有些变态。首先，会有一场宴会，接着所有的客人（几乎都是男士）会一起到地下室，任选一个非洲女奴，享受她提供的服务。我们这位咖啡王当时是里奥克拉鲁的议会议长，所以他的宴会都提供上等的服务。

我不好意思地问卡萝·安，她是否知道哪一种痛苦最能满足咖啡王的变态行为。我们只知道许多咖啡王当时最喜欢用的刑罚工具是一条有五个尖叉的铁头鞭子。一次鞭打400多下是很平常的事，有许多奴隶经常被活活鞭打至死。因为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所以这些奴隶的死因都会被造假，像“严重中风”就是他们常用的借口。而存活下来的奴隶也好不到哪里，因为这些变态的奴隶主会用盐巴或醋涂抹在他们的伤口上。有许多奴隶因此而患上重度忧郁症，也有的因为太想念非洲，而变成另一种慢性自杀，还有一些母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婴儿。

那根梁柱从地面起三英尺高的地方有一个黑色的铁环，根据卡萝·安的说法，这就是咖啡王用绳索捆绑奴隶的地方。我一边摸着铁环，一边想着，这真是一个变态的世界啊！咖啡王最后还强迫奴隶为他建造一座纪念碑，以感谢他所给的自由。而这座纪念碑至今还在，只不过我没有去参观。

城里是一个更适合纪念他的所在，因为这个城镇的名字就叫作格朗·莫戈尔，它是最近巴西奴隶制度再度恢复的一个中心，许多农夫被高薪的广告骗到那里，却必须在薪水极低的煤矿工作。凡是逃走的人，最后都会被抓回去打死。因为格朗·莫戈尔的关系，巴西到现在仍旧是西方社会中奴隶最多的国家，从1989年的597人一直增加到1996年的25000人。

突然有人拍了我的肩膀，原来是卡萝·安。“先生，你看完了吗？我要去写功课了。”

圣灵、异教徒与外星人

咖啡带给新世界的不只是奴隶制度，非洲人还把他们的神一起带过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埃塞俄比亚的扎尔灵也是一起被带过来的。也许我猜错了也说不定，因为巴西的奴隶制度来自西非，而扎尔灵却是东非的产物。

可是几百年前，在奴隶贩卖者还没来到非洲以前，苏非派的教徒为了传播伊斯兰教走遍整个北非时，似乎也已经传播了咖啡的种子，而且一直传到尼日利亚。虽然尼日利亚的波利扎尔教（Bori-Zar）在苏非教到来之前已经存在了，而类似的名称以及同样的仪式，都代表这两种宗教之间确实有过密切关系。不过，扎尔灵好像到了尼日利亚之后便没有再外传了。我在伦敦与巴黎翻阅过无数的书籍，虽然有上百万的非洲人曾被运往巴西，还有那些非洲式的巴西仪式，但我仍然找不到任何数据可以证明扎尔灵与新世界有任何直接关系。

这一点有些不合理，难道扎尔灵没有在巴西人开始热爱咖啡之后，要求人们前来祭祀吗？也因为如此，在参观过咖啡王的大宅院之后，我前往一个叫作“黎明之谷”（Valley of the Dawn）的地方，因为听说那里有一所大学专门研究与宗教相关的课题，我认为我要找的答案应该就在那里。

告诉我这些的，是一个我在里约认识的朋友，他是新世纪的美国人。他对我说，这个黎明之谷就位于巴西利亚（Brasilia）附近。

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一项庞大的城市建设计划之一，一个完全预先设计好的城市，在三年内于亚马逊的丛林中建造而成。外围的贫民窟环绕着这个城市，我听许多人说这个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我刚到巴西利亚的时候，并不觉得真如其他人说的那么凄惨，只不过是另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丑陋城市罢了，我倒觉得很像洛杉矶呢！

大学距离巴西利亚大约有 80 英里，我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个男子开始与我聊天，他说可以带我到这所大学。

“你要去黎明之谷吗？”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就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像是要让我安心的样子。“我会带你去的，我们是朋友，我叫麦斯特。”他

说。

“谢了！”我说。麦斯特是一个怪异的人，他唯一的表情就是脸部的抽搐，只要我们每次眼神相接，他都会有那种表情，我猜那应该就是他发笑的样子。在公交车上，我这位新朋友就坐在我身旁。一路上都是平淡无奇的乡野景色，巴西让我可以联想到的地方就是高尔夫球场。公交车来到一个黄色的拱形门前面，门上画满星星与月亮。

“你知道这里是灵界的最高境界吗？”他边说边把我拉下车。

“你想进去吗？你想看看我们做的事吗？”

“嗯，当然啊。”我不确定地说。我一直盯着拱形门另一边的人群。这真的是一所大学吗？

“来吧！”他带着我穿梭在人群里，进入一座没有窗户的建筑物。里面所有的人都穿着奇怪的制服，等我的眼睛开始慢慢适应建筑物内的光线之后，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长方形房间里，屋内的墙上是许多宗教的标志与符号，如戴维之星、十字架等，颜色都是以红色和黄色为主。在屋内的另一头是一座 12英尺高的印第安女人雕像，手中拿着一把巨大的铁矛。

“这就是我们举行仪式的地方。”麦斯特一边说，一边带我到一条长凳上坐下，要我在那里看看他们的宗教活动。

在那里，只要是女人，身上都穿着纱布上衣与粉红色或蓝绿色的布裙，这种装扮看起来好像是阿拉伯式的服饰，尤其是帽子。而男士都穿着黑色紧身的牛仔裤以及短到腋下的小背心，戴着大牛仔帽，这让我想起《飙风战警》（Wild Wild West）里面的角色。有些还披着长及膝盖的灰色六英寸高领披风。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只看到大家围绕着印第安人的雕像，手掌朝着天，像是在吸收雕像的神秘力量。有两个年轻女子坐在雕像的两侧，一动也不动。

麦斯特回来的时候，手拿一杯乳状的饮料，对疑惑的我说：“这是水，喝下它吧，它有洗涤灵魂的作用。”

我喝下了，然后指着一张看起来很狂野的白种女人的照片，问他：“这个女人是谁？”

“那是蒂亚·内瓦（Tia Neiva），我们的领袖。”他一边说一边将他的手朝向照片。

“喔！”我哼了一声，然后有礼貌地跟着把手朝向照片。我知道她。她是20世纪60年代巴西利亚在建城的时候，一个自称接收到外星人讯息的卡车司机。很明显的，这根本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个根据外来飞碟的指示所建立的教堂。根据内瓦的语录，这个教堂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地球上准备好迎接1999年12月31日外星人的来临。每一天，上百位祭司都会聚在漂浮在附近一个湖面上的巨大的“大卫之星”周围，他们认为这颗星是宇宙无线电波天线。他们可以接收讯息，然后对地球上的人吟诵祈祷文。

当时我有点想回家，因为房间的热气与令人作呕的味道让我感到头晕目眩。但是每次我要站起来离开时，麦斯特总是把我推回座位，然后说：“难道你不想看一看我们的伟大事迹吗？”每隔一次他就越来越不耐烦，要我喝更多的“水”。我看到有些人吐在水桶里，而且臭味也越来越浓。接着，有人开始发出恐怖的声音和尖叫声。

我推开麦斯特的的手，随即离开。他跟着过来，催促我回去，说如此才能“了解”他们的仪式。那时我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还是上了公交车，之后才发现我搭的公交车走了相反的方向，接下来的45分钟，我经过了许多村庄，村里的人全都穿着异教的奇特服装，看起来大约有上千人（估计总共约有两万多名信徒）。

我坐在车上，感到难以置信，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地方。我真不知道，如果他们所谓的外星人没有来，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些人会怎么办呢？

1 这地区产的咖啡豆叫作利奥特（Riote），比较特别的是味道非常苦涩，叫人无法忍受。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差的咖啡豆，因为含有大量的碘与盐分。不过它仍受到纽奥良与土耳其民众的喜爱。

15 非洲老奴隶的幽灵

猴子来了，咖啡树都死光了，我们要吃什么呢？

——巴西奴隶歌曲，约1800年

巴西的幽灵崇拜

我乘坐公交车往玻利维亚的方向去。参观过黎明之谷后，我感觉这次的旅行好像被下了诅咒，因此我决定放弃追寻扎尔教的行程。很显然，那些扎尔灵魂已经不想与我沟通了。

我在烈日下走过了数百英里长的绿色大豆田野。这种绿色大豆长得很像棕榈树，它的叶子可长达六英尺，叶子可以提炼出油脂。（我此时的感觉就像是一只掉落在橄榄球场的蚂蚁。）这种绿色大豆属于巴西农业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个农业周期包括先烧掉森林，然后种植可以换取现金的农作物，例如咖啡。当土壤的养分耗尽了以后，需要让它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才可以再种植其他有价值的农作物，就像种植咖啡树一样。大家都知道，焚烧巴西的森林会对全球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的冲击。

绝大部分咖啡爱好者还不了解的是，导致这个全球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满足他们对咖啡的需求。从前，大多数南美的农场都使用“遮阴式”（shade farming）的种植方式，当时还允许咖啡树被有技巧地种植在传统的树荫底下。可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巴西的农场大多改用所谓的“阳光生长法”。这意味着整座森林都会被烧掉，只有咖啡树被保留下来。

对工人来说，这种环境的改变意味着只剩下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大太阳与炎热。对整个环境而言，代表着森林的砍伐，杀虫剂的大量使用，以及土壤质量的降低。其中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生物多样性及鸟类减少。有将近 60% 的北美洲鸟类飞到南部或中美洲过冬，当传统的树荫种植农场消失后，它们便无家可归。根据华盛顿“史密森尼候鸟研究中心”（Smithsonian Migratory Bird Center）的报告显示，太阳直射的农场远比有遮荫的农场少了 90% 的鸟类数量。

到了后期，又开始有了贩卖“荫生咖啡”的趋势。这意味着这些咖啡豆又可以生长在一个较传统而且更友善的环境，而且在质量上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或许可以让任何吸毒者为他吸毒的习惯做合理的辩解。

在大约 30 小时地狱般的路程之后，我到达了边界附近的大坎普（Campo Grande）。这是一个牛仔小镇，这里的车站被设计得让来访的南美牛仔在车站里就可以满足一切所需。这里有两间色情剧院——在我访

问期间上演的是“周五夜间的欢乐”，三家理发店，还有好多间酒吧。所有的店都提供一次买齐的“牛仔日常小包”，每包里面装有三袋白米、四袋豆类、猪肉罐头、洗衣粉、发胶，还有五块肥皂。

离开车站，是另外一个中型的城镇，到处堆满了皮革制品，其他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一层楼高的西班牙式建筑。由于天气太炎热，人们在吃棒冰的时候，如果不再舔棒冰，都会把它直接放进酒杯，然后再把融化在酒杯里的棒冰汁喝掉。

很奇怪的是，他们竟然为他们所谓的温和气候骄傲。

“你曾到过库亚巴（Cuiabá）？”旅馆经理嘲笑着说，“那里今天的温度高达摄氏45度（华氏113度），而这里只有39度（华氏102度）。”

他把一些玉米花踢出我的房间。

“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个房间会那么脏，”他戴着一顶白色浅底的软呢帽，皱着眉说，“我们通常对这种问题会特别小心！”

几分钟后他回来向我解释。

“这个房间仍然有人休息！”他以胜利的口气说，“我就知道脏乱是一定有原因的。”

他带领我到另一间同样凌乱的房间。我问他关于我在附近一栋大厦前面看见的人群。

“那是幽灵中心。”

“什么是幽灵中心？”

“是巴西的幽灵。”

这是我在巴西的第一个幸运假期。在我参观每一个城镇的时候，我都会询问有关巴西的幽灵崇拜，它一直隐秘地活动，到最近才被合法化。

这个幽灵中心是我隔天上午拜访的主要目的地。然而当我正要出发的时候，酒店的柜台人员却阻止了我。“你就是那个询问幽灵的人吧？”他用力眨了一下眼睛说，“有问题，是吧？”

他的名字叫穆里奥，长得很肥胖，有一张愉快的脸孔，但耳朵上却戴着一个紫色的套子。他告诉我，幽灵中心发源于卡德克教（Kardecism），是19世纪法国心灵学研究者阿兰·卡德克（Allan Kardec）发扬光大的。但这根本是浪费时间。

“你想要与 Boreesha 谈话吧？”至少我听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使我吃了一惊：这听起来好像他说的是波利扎尔（Bori-Zar）。

“你说什么？”

“Boreesha。”他重复着，并把名字写在白纸上：O-r-i-x-a。我知道这个词。它是巴西崇拜的幽灵，我在巴黎做研究时曾看过这个词无数次。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读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b”的发音呢？而“x”的发音却为“za”。原来康得布雷教（Candomble）的 Orixá 是非洲的波利扎尔教的幽灵。

穆里奥不知道什么是康得布雷教，而他的妹妹是一位崇拜乌班达教（Umbanda）的女教士。我在想是否也应该去见见她呢？

“有问题吗？”他给了我一个特别的眼色，“我知道你一定有问题。”

“我有许多问题。这要花费多少钱呢？”

马里奥举起双手拒绝。“不！不，这不用花钱，没有必要给钱的。”

“真的？”我高兴地说，突然想起我曾给埃塞俄比亚的扎尔教士带了一些绿色的咖啡豆礼物，于是就问他，“我是否该带些礼物呢？”

“带礼物当然很好啰！”他说，“他们喜欢龙舌兰酒。”

比勒陀·韦柳的故事

我预测，倘若扎尔教还存在于这里的话，那将会变成康得布雷教的一部分。不过，看起来好像乌班达教更为突出。乌班达教目前是康得布雷教的一个分支，是巴西都市贫穷阶层的普遍信仰。康得布雷教盛行于北部——非洲文化的传统中心，而乌班达教则在南部传播更广。这两个宗教的信徒都在名为“Terreiros”的教会做礼拜，这个名字原意为用来晒干咖啡豆的院子，就像我在格朗·莫戈尔男爵的家中看到的一样。这两个宗教都称灵体为“Orixa”，也都是取自于波利扎尔教的宇宙论。但康得布雷教的 Orixa 灵魂源于非洲奴隶将他们的神明伪装为天主教圣人的时期。万神殿里面包括双性神 Oxamare，以及喜欢白玉米供品的 Oxala。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乌班达教的 Orixa 好像与埃塞俄比亚的扎尔灵较为相似，因为他们都是以种族为背景的典型人物，例如印第安灵 o caboclo，或是欧洲武士 o guerreiro。最厉害的幽灵则是比勒陀·韦柳（Preto Velho），他是非洲老奴隶的幽灵，他喜爱的供品当然是咖啡，而且要是像 2000 多年前他在非洲长大时那样以新鲜咖啡豆烘焙出来的咖啡。

隔天，穆里奥的朋友华特载我到乌班达女教士那里，我带了一磅咖啡豆、一箱雪茄和一瓶朗姆酒。至于华特，他是一位体形臃肿，带着哀伤眼神的白人男子，他看了那瓶朗姆酒之后说：“我离婚了！”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们到达女教士的屋子时，她还在睡觉。华特和我就在她的黏土庭院前等待。越过篱笆，我能看见大坎普镇现代街市的地平线。坐在一个巫师的庭院里看着 20 世纪的地平线似乎充满巴西风味。这个国家似乎一半的人生活在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比基尼的白日梦里，而另一半则生活在一个传统的非洲村庄。

一只秃头火鸡走过来狠狠地盯了我一眼。一个男孩拿了水给我们。女教士内瓦漫步到外面，她开始向我们讲比勒陀·韦柳的故事。

“比勒陀·韦柳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她说，“他不喜欢坏事。他对所有事情都会考虑得很深入。你不能吓唬他，因为他遭受过那么多的磨难。在他的脚踝附近是被锁奴隶的链子弄的伤痕，他的手腕也是。而他的背部还布满被主人鞭打的伤痕。有时候你还要帮他把咖啡放到他的嘴前，

因为他的手腕仍然被吊挂在那艘奴隶船上。他很老，但老得很有智慧，他是非洲之父，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嗅到烘焙咖啡的味道时就会走过来的原因，因为咖啡来自他出生的地方。他喜欢咖啡的程度不下于烟管。没有什么东西比夜晚坐在椅子上抽烟喝酒更能使他愉快。”

她说比勒陀·韦柳很喜欢小孩子。在9月份，他们有特别的假日：“所有的小孩都会来看他，这使他非常愉快。”

如果我看到走在街道上的内瓦，我会以为她是一个秘书。她是一个肩膀宽大的妇女，短短的黑人发型使脸庞显得特别方正，她的穿着很像是一个教导有氧运动的老师：桃红色贴身衬衣和俗气的白色长衫。她的嘴唇涂着鲜红的颜色。她告诉我关于其他非洲幽灵的故事，特别是阿纳斯塔西娅（Escrava Anatasia）。她是一个妇女，嘴巴被套着一个铁制的口罩，“所以当她被奴隶主无情虐待时根本无法大叫”。这不由得使我想起格朗·莫戈尔男爵那个狂欢放纵而且残暴的派对。

“你看过比勒陀·韦柳了吧？”她问道。我见过许多他的雕像。他被塑造为身穿白色衣服，头戴一顶宽大的草帽，让人感觉亲切的非洲之父。他时常一手拿着玉米穗轴做的烟管，悠闲地坐在椅子上。

“是的，他喜欢抽烟管。对于雪茄，只是还好而已。”她指了指我带来的盒子，“他喜欢他的烟管、他的酒及他的咖啡。这些都是好东西。你想与比勒陀·韦柳讲话吧？”

我犹豫了一下，毕竟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我想，如果我让她白费工夫做降灵的法术，就很不尊重她了。不过我还真的想跟他说说话，我当然想。

内瓦看得出来我非常想。

“来！”她说，“我知道你很想跟他谈话。”

她带领华特和我回到一间门前挂有“TENDA OGUN”标志的房间，里面点着几根蜡烛，在房间的尽头摆着一张长桌，上面刻有乌班达雕像，还有12个不同形态的比勒陀·韦柳雕像与几个不同的天主教圣徒的雕像，包括圣乔治和圣母玛丽亚。其中还有一个印度女人的雕像，我曾在黎明之谷看过，让我很迷惑的是还有一个金发蓝眼睛的小女孩，吸吮着小指头。

内瓦开始激动了，像一个准备与她最喜欢的叔叔玩耍的孩子。她推了一根简单的烟管到我的手上。“这根就是比勒陀·韦柳的烟管，我曾告诉过你他有多爱它。喔！他就是那么爱他那支烟管呀！真的！”

她让华特将烟草填满烟管，让我敲击大鼓。“这会吵醒他。他喜欢睡午觉！”她笑着说，“但这会吵醒那个懒惰的老头！”她开始敲击简单的一二拍的节奏，以有点阴郁的调子歌唱着“提亚玛丽亚！提亚玛丽亚！”我在一片朦胧中仿佛看到比勒陀·韦柳的人形站在桌上。他的身体似乎随着他的拐杖向前倾斜。

“这是他的拐杖！”内瓦在我的耳朵边喊着。她把那白色拐杖推到我的手上，拐杖的手柄雕了一个非洲人像。“他很老！很老！所以他需要拐杖。如果没有拐杖最好不要叫他！”她开始被附身，亲吻桌布，猛击大鼓，又一边歌唱。此时有一个粉红色卷发的朋友走进屋子，接着点燃了烟管。内瓦一阵抽搐之后，比勒陀·韦柳就出现了。

他是一个老家伙，身子因年迈而弯曲，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有人拿了我手上的拐杖给他，也有人拿凳子给他，比勒陀·韦柳坐下后，马上以模糊不清的声音抱怨起来。他想知道他的烟管在哪，华特马上递给他，几分钟后，韦柳坐着开始抽烟并且含糊地说起话。我注意到被粉刷的墙壁在发光。最后，韦柳握着华特的手，给了他一个很简短的祝福，接着便轮到我了。

我象征性地询问了几个金钱和未来的问题，但我真正的问题是我无法用女友妮娜给我的电话号码找到她，而且我们在印度激动地分手之后，我不敢肯定她会不会理我。我问韦柳，我是否应该回到纽约，回到她的身边，或是该回到我兄弟在加州的家。

在巴西讲西班牙语是令人愤慨的，因为他们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我却无法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感觉韦柳领会了我的问题，也尽量地回答。可是我听到的他那两百岁的年纪所说的葡萄牙语，再加上某一种非洲方言，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想知道我是否明白他讲的话。我总是回答“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不可能要求一个千年的非洲幽灵讲话时放慢速度。

正当韦柳回答我的问题时，我试着揣摩内瓦的脸孔，她好像变得很害怕，整个脸缩成一团。她的眼睛似乎消失在一堆皱纹当中。声音仍然是她的，只是因为年纪大而有些颤抖。口水从她的唇边滴了下来，她的呼

吸发出烟草的臭味，而且那种气味似乎发自她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好像她已抽那支烟管好几个世纪了。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把握确定我的确与被奴役的非洲原始幽灵讲过话，而我也无法肯定我没有。但我绝对相信内瓦一定认为我确实与非洲的原始幽灵讲过话。

当比勒陀·韦柳与我讲话时，华特和卷发女士开始聊起天气。这日常的行为使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像真的一样。最后卷发女士问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说没有了。韦柳于是祝福我，又祝福那位卷发女士。在一阵颤抖之后，韦柳便离去了，而内瓦则激动地说着关于一个即将来临的节日。她说：“这里的天气很热，我们为何不走出庭院呢？”

“那个，”内瓦在我们离开时问，“比勒陀·韦柳与你说话了吗？”

“有的。”我说，“谢谢！”

回程时，华特和我一路上都沉默着。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这种仪式，虽然他是天主教徒，仍然感到非常震撼。我们两人都同意，她实在“非常厉害”。我问他是否想要五美元或十美元车费。他说他想要15美元。我有点失望我们没能像在埃塞俄比亚时那样烤咖啡豆。内瓦则认为那不是必要的。“什么？他有酒和雪茄，这对一个老人来说还不够吗？”虽然咖啡豆对他与人民造成了许多伤害，可是他们喜爱咖啡的程度跟我一样。我想，如果可以跟他一起喝杯咖啡的话，应该会很不错。

当然，我仍然不知道他为我做了什么预言。那天一早，我在柜台碰到穆里奥和华特时，我才了解。穆里奥开口大笑。“那么，”他用好色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答了！你要回到纽约与妮娜结婚吧？”

16 咖啡上瘾之国：美国

- 用低咖啡因的浓缩咖啡调制而成的大杯低脂拿铁叫作什么？
- 一个高高瘦瘦的麻烦。

——L-Café咖啡厅的涂鸦

最难喝的咖啡在何处

美国可以说是西方世界中完全以咖啡为基因的国家，因为于 1607 年建立詹姆斯敦（Jamestown）殖民地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船长在中东的时候已经接触过咖啡。“五月花号”不仅带来了第一批朝圣者，也带来了研磨咖啡的研钵与搥捣用的杵。到了 1669 年，纽约已经开始有各种加了肉桂与蜂蜜的咖啡。一年后，美国第一家合法的咖啡馆在波士顿开张，所有权在一个名叫多萝茜·约翰逊（Dorothy Johnson）女士的名下。

跟母国英国一样，美国的咖啡都不好喝，可是生意却做得很大。波士顿的商人咖啡馆（Merchant's Coffeehouse）是第一个证券竞价场所，而华尔街上的唐提咖啡馆（Tontine Coffeehouse）也成为了纽约的证券交易所。到了 18 世纪，英国开始改以茶叶代替咖啡作为主要的贸易项目。导致这种改变的因素相当复杂，但基本上是因为英国虽然拥有很广阔的殖民地，却没有大型的咖啡种植场。而法国占领了部分的加勒比海，葡萄牙有巴西，而印度尼西亚则属于荷兰人，这代表每个英国人所喝的每一杯咖啡，都会让其他的欧洲竞争国赚进一笔钱。但是，英国也没有产茶的殖民地，只有印度北部的鸦片场。

鸦片对英国人来说只有一个用途，就是与中国的茶叶贸易¹。刚开始的时候，两国鸦片与茶叶的交易价格还算合理，但久而久之，在中国人对鸦片上瘾之后，英国人便开始提高价位。到了 18 世纪中叶，英国人花费在茶叶上的费用大约已经有咖啡的一半，而且从中国所获取的利益也非常高。于是，茶叶公司便开始大力推广茶叶的好处，迫使欧洲第一个最大的咖啡协会成为历史。

当英国乔治国王要收取美国殖民地的茶叶税时，美国也开始从喝茶叶改为喝咖啡。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拒绝购买茶叶，后来有一群爱国者乔装成印第安人，将来自英国的茶叶倒入波士顿海湾，也因此酿成了美国革命的导火线。至此，只要是典型的美国人，都只会喝咖啡。我们成为了一个对咖啡因上瘾的国家，只要是为了跑得更快、赚更多钱、舞跳得更好，甚至是为了要心情更好，人们都会早晚来一杯。

但很奇怪的是，我们居然到现在还无法泡出一杯好咖啡。

我原先的计划是，从巴西飞回纽约后，再开车横跨美国，寻找最美味的咖啡，看看哪里的咖啡最香醇浓厚，哪里的卡布奇诺最高级，或是哪里的浓缩咖啡味道最强烈。我将自己化身为咖啡因的上瘾者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美国作家），然后来一趟追寻圣杯之旅，或者随便都可以！

“你的想法错了，”杰夫说，“美国咖啡难喝就是它的特色。你应该去找最难喝的，而不是最好喝的咖啡吧！”

杰夫当时跟我正在等妮娜，我们就坐在敖德萨咖啡馆（Odessa's）里，那是一家位于曼哈顿东边的古典咖啡馆。先前，我还害怕妮娜与我的感情出了问题，后来发现是我多虑了，我还搬进了妮娜在威廉斯堡的高级小公寓呢！杰夫是妮娜的朋友，一个头发灰白的男士，他是传说中的“左撇子琼斯乐队”（Lefty Jones Band）的团长，也是很爱喝酒及咖啡的人。他的理论很简单：要找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咖啡，不是往技术方面找，而是要找最真实、最有文化的咖啡。这种咖啡在美国的文化里，就是乡间餐厅里面貌平庸、穿着条纹裙、戴着花围巾的女侍从玻璃咖啡壶里倒出的底部的混浊物，还可以一再续杯。我怎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呢？美国本来就是以质量最差的咖啡，或者以最不讲究的方法烹煮咖啡闻名。很讽刺的是，一杯真正的美国咖啡与密西西比河的河水一样稀薄、一样多。以下是一个无名氏的小故事，叙述这种永不见底的咖啡：

有一个旅行家在乡下的密西西比旅馆过夜。他连续喝了几杯咖啡，让旅馆的老板吓了一跳，当他为那个旅行家倒进第五杯咖啡时，禁不住说：“你很喜欢喝咖啡，是吧？”

旅行家很严肃地回答：“是的，先生，我的确是很喜欢喝咖啡，我每天吃早餐时都会喝一杯咖啡。可是在我离开桌子之前，我非常希望可以喝足我当天想喝的量，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请帮我再准备一两杯咖啡。”

杰夫听完故事说：“对啊，你就是应该去找那种咖啡。”

妮娜与几个朋友都到了，我们在那里待了三小时，喝完几杯杜松子酒之后，我们决定驾驶杰夫的金色凯迪拉克（Golden Cadillac）²轿车上 66 号公路，去寻找美国最难喝的咖啡。当晚，五个勇敢的男女一起宣誓要找到美国最难喝的咖啡：杰夫与女友克莉丝、妮娜和我，还有妮娜的好友梅格。但不久，大家一个个陆续放弃了这次寻找最难喝的咖啡的探险，

才过了两个礼拜，就只剩下两位成员：梅格与我。

我们用一辆蓝色的本田雅阁轿车取代了原本杰夫开的凯迪拉克，并且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车开回洛杉矶。于是，我们准备了很多录音带，还有一堆跟咖啡因有关的食物，例如：含咖啡因的口香糖、含咖啡因的水以及好几种咖啡糖。其中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那一小瓶发亮的纯咖啡因。这瓶咖啡因是我从网络上一个咖啡狂热者那里买来的，他的网站上挂着一个抽动的眼球。

我和梅格于晚上八点准时启程，往南一路开下去，穿过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经过弗吉尼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接着又穿过肯塔基州与田纳西州。我开了一整个晚上的夜车，一路上看到的只有飞蛾的尸体、高速公路中间的那条白色分隔线和几个加油站。梅格把脚放在车子的仪表盘上，她的个子很高，大约有六英尺，有一头红色的卷发，一双突出的蓝眼睛，让人觉得不管你跟她说什么都会很有趣。

到了黎明的时候，我们交换位置，由梅格接手开车赶路。接着我就睡着了，一直到田纳西州雅典城的一个小镇我才醒过来。那时已经是早上十点了，温度也已上升到华氏 94 度。我看了看梅格的样子，对她笑了一下，梅格也对我笑笑，我们蹒跚地走进一间叫作“早餐角落”的小餐厅。

女服务生对我说：“早安，先生，要点些什么呢？”

这间餐厅的空间很小，只有一个柜台与浅锅。菜单是一个挂在墙上乳白色的招牌，上头的字都是用磁铁做成的，菜单的内容有比利时松饼、荷包蛋、煎蛋、蓝梅烤饼，还有炒蛋。

女服务生看到我在看菜单，就对我说：“不用看那个，那个菜单比我都老了。”她指着贴在炉子边的一张油腻腻的小卡片说：“这才是菜单。不过我们今天只提供小面包与肉汁酱。”

“喔，什么是肉汁酱？”我问。

“肉汁酱就是淋在食物上的酱汁啊。”她解释。

这酱汁是加了油脂与小碎肉调制而成的。我一边吃，一边看着梅格与女服务生聊天。这间餐厅的服务生只有两位，她们的肤色都一样白，都穿着有长须的短牛仔裤。

“孟菲斯（Memphis）？你们是走 240 公路吗？那差不多要开 12 小时。”她们说。

“可是只有 200 英里，搭亚的斯亚贝巴的火车还比较快。”我说。

其中一位说：“我没去过亚的斯亚贝巴。你们从哪里来的？”

“曼哈顿，纽约。”梅格回答。

“是吗？我还不知道纽约有红头发的人呢。”

“红头发的人？”梅格问。

“对啊！像你一样啊！我可以问你的红发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我的头发？”梅格说，“可以啊，真的是很红呢！”

“你自己也同意呀！”服务生咯咯地笑着说，“你们从现在开始要小心开车，特别要注意那些巡逻的警车，因为路上有许多在抓超速的警察。”

她说得一点也没错。我们才离开雅典城的郊区，就被田纳西的州警拦了下来，要我们在一家超市兼加油站旁停靠下来。因为我们的刹车灯坏了，他查了我们的车牌、身份证、车子的注册单以及保险。我们还被问了许多涉及隐私的问题。警官的名字叫哈普，他的样子跟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Ken Starr）很像，我想应该是巧合吧。他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还有我们是怎样相遇认识的，虽然他没有明白地问我们之间是否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我想他一定存有怀疑。

最后，他查了我们的证件都没有问题，就叫我再次到他的巡逻车上。

他有些失望地说：“一切好像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又弯过身子，用力地盯着我看，之后说：“你可以保证车上没有任何不合法的东西吗？”

虽然很无趣，但答案当然是没有。我们本来打算带一些毒品，使旅程增添一些乐趣，但考虑到梅格正要申请进入医学院就读，我们决定不要冒这个险。因为医生只能持有合法的药物。

“没有，没有违法的东西。”我回答。

“很好，那你应该会让我搜车吧？”

我马上想到那瓶咖啡因。虽然是合法，但是一瓶白色的粉末总会让人起疑心。

“我是不怎么乐意。”我哼着说。

“为什么呢？你不是已经说过车上没有违法的东西吗？”

“是的，车上确实没有违法的东西。但我要先跟你说，或许你会找到类似违法的物品，但那真的是合法的。”

哈普警官给我一个轻蔑的笑容，然后说：“这个嘛，你不用担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需要你在这里签字，同意让我搜查你的车子。”

这有一点像向小偷要收据一样。如果我不签，他会把我们带到警察局，然后申请搜查的许可证，或许会在雅典城耗上一整天。如果他又得到搜查许可的话，万一那罐咖啡因被找到，他们肯定不会相信那是合法的物品，而会说那是缅甸海洛因之类的东西。

“你居然让他搜我们的车！你疯了吗？”梅格与我都被关在哈普警官车子的后座，又有两位警察到场，正在帮哈普搜查我们的本田轿车。虽然他们只是几个土包子，但还是很仔细地搜我们的车。梅格有点气愤地说：“如果是我，绝对不会同意他们搜车的！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

“他有枪，而我又很胆小。”我说。

“这下好了！”梅格说。哈普警官高兴地朝我们这里走过来，右手握着那瓶咖啡因。他靠近我们的车窗，问：“你们不是向我保证车上绝不会有非法物品吗？”

“是啊。你不是说后座会有冷气吗？”我问。

“这是什么？”

“是百分之百的咖啡因，所以百分之百合法。”我跟他说明那从网络上买来的。

“网络？”显然，网络对他来说是一个黑暗、不正当的地方。“我要以持

有可疑物品的罪名把你带回警察局。”

“如果你认为是可卡因，尝尝看不就知道了吗？可卡因会使你的牙龈麻掉。”我说。

哈普的表情好像在说，你的故事有破绽了。

“我不知道可卡因是否真的会使你那样。你们坐好，我们已经呼叫联邦警察过来一趟了。”

就在我们等待联邦警察的时候，又有一辆巡逻车停下来。接着又一辆，不久又来了差不多六辆田纳西州的警车，停在我们的车旁，警察们则闲着晃来晃去，一边笑一边将那一小罐咖啡因传来传去。

“那几个警察双手擦着长裤，做出胜利的表情。”梅格抱怨说，“他们准备要把我们两个纽约人关起来。这简直是……天啊！”

最后，有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开了进来，一位胖警官从车里跳了出来，他穿着聚酯合成纤维的西装，戴着墨镜。联邦警察到了。

“很高兴可以为大家服务！”我们听见他洪亮的声音说，“有什么问题吗？”

一位警察指着警车里正在咯咯发笑的我们：“你看，那两个毒瘾者可能已经开始毒瘾发作了。”

FBI先生轻蔑地看我们一眼，然后把那瓶咖啡因拿了过来，透过阳光做肉眼的检查。之后，他不屑地摇摇头。一位较年长的警察又对我问了一些同样的问题，不过他还不错，同意让梅格到便利商店买饮料。

“咖啡因？”我又解释给他听，可是他还是不理解。“连咖啡因我都无法确定是不是合法，你的包包里面装的如果真的是咖啡因的话。”他用拇指指着后面正在搜查我们车子的警官，接着说道，“我们马上就知道了。”

“喔，真的吗？”我说，“你在报纸上有没有读过一则新闻，一个男子说他带着他祖母的骨灰，可是被你们搜查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是可卡因。”

“是吗？你是在哪里弄到这个东西的？”

我向他解释，我们所喝的汽水当中所含的咖啡因，就是从低咖啡因的咖啡豆提炼出来的（美国人所摄取的咖啡因当中，有一半来自这里）。通常一杯咖啡有 100~200 毫克的咖啡因，而汽水则有 50~100 毫克。所以我那一小罐十克的纯咖啡因就等于 100 杯咖啡，如果我一次通通把它吃掉的话，那就有可能会丧命。像这样的纯咖啡因只要放在舌头上，就可以被吸收掉了，如此也可以避免引起肚子疼痛（那是咖啡因唯一的副作用）。

“放在舌头上？”警察问，“那听起来一点都不合法。”

梅格蹦蹦跳跳地回到车上，她不小心把一瓶水倒在了自己身上，这让询问我们的警察对我们亲切了一点。不过正在用仪器化验的警察还是照样严肃。等他做完化验之后，就叫我过去把手放在车盖上，梅格则被叫回巡逻车上。

“没错，朋友。”他笑着对我说，“你的东西呈现阳性反应。那是百分之百的可卡因。”

“你在开玩笑吧？”这整件事已经太夸张了。我敢确定那是咖啡因，应该是他们的仪器出错了……可是，我又怎么知道卖我东西的人到底在罐子里面放了什么呢？

“听起来连你自己都不很肯定。”他看着我说，“他们说你是网络上买的，对吧？”

“是啊。”

“所以其实你不知道这里头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是吧？你花了多少钱买这个东西呢？”

“十块钱。这罐差不多有十克，如果真的是可卡因的话……”

“那你就真的赚翻了！”他笑着猛拍了一下我的背部，然后又说道，“小家伙，你真的是赚到了！”他与其他警察又笑了一番，然后上了车开走了。

接着，哈普与警察们都围了过来。

哈普说：“你听着，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许是合法，或许是非法，我们还是决定让你走，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在我们全部人面前，在路边把这瓶东西倒掉。”他把小瓶子还给我，然后说道：“这是为你自己好。如果你在肯塔基州被抓到，那是会被判死刑的。”

“你的意思是，就算它是合法的东西，还是得把它销毁？”

“我们就是不知道，因为它或许是违法的。”哈普说，“但是因为你很合作，所以我们愿意相信你，下次不要再发生就好了。”

谢谢你啊，警官！我很想这么说，可是坦白说，我们已经开始厌倦雅典城了。于是我走到高速公路旁，把小罐子里的白色粉末全部倒掉。我很讶异他们竟然没有照相！警察似乎都很开心，不管他们是否侵犯我的人权，强迫我销毁自己合法的私人财产。不过，他们还算蛮有礼貌，甚至还给我一张被搜车的“收据”。

“把它保留好。如果其他警察要搜你的车时，给他看一看就好了。”难道现在一定要收据才能避免被搜查吗？哈普跟我握握手说：“把你的刹车灯修好，知道吗？”

○

我很庆幸在哈普警察鲁莽的搜索之下，没有损害到我那台古董级的 486 手提电脑。这台计算机可以用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网络与最近的咖啡馆，其功能是相同的，是一些不同身份的人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社交场所。网络的用处很广，科学家之间可以互发笔记，不同的主题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网页。就如伦敦咖啡馆里面的谈话数据就被编辑成理查德·斯蒂尔的著作《闲谈者》，这本书里的材料又被编辑成许多不同专业的杂志。

在网上的一个最古老的图像就是在剑桥计算机室，或者在网络咖啡馆里的那只咖啡壶³，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网络咖啡馆里，可以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聊天。所以梅格与我也一边开着车游走美国，一边在网络上游览。与超过一亿的网络用户一样，我也立即在网络上张贴了一篇我们遇到哈普警官的文章。

“他们是在禁咖啡吧！”讨论网页上回复，“他们都是可恶的烂东西，只喜欢刁难别人。这个国家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好人将会起来打击这些禁咖啡论者，让他们从地球消失。他们是自由与正义的背叛者，他们的消失不会有人哀悼。”

咖啡因万岁

网络社群跟 18 世纪的咖啡馆很像，充斥着怀疑政府与充满想像力的人。反哈普的人很快就推出一套关于政府想要将咖啡与烟酒做同样处置的理论。有人写道：“在咖啡之后，接下来就是可口可乐、砂糖，然后就是水，最后是空气。”有一位护士描写他的主管要她戒掉咖啡因的习惯。其他上夜班的护士也说他们现在都要等到主管离开之后，才敢喝咖啡或可乐。有一间医院还将所有含咖啡因的饮料从贩卖机中取出。在澳洲，贩卖两倍浓的可口可乐（包括 100 毫克的咖啡因）是违法的。有一个叫“alt. coffee”的网站最近正在讨论当咖啡师在给顾客调制两倍的浓缩咖啡之前，是否应该先问他们的年龄，以免心脏衰弱而撑不住。

这些并不全是网络上的传言。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在已经控制了所有含咖啡因的食品，而有些公司录取员工之前会先测他们是否有滥用咖啡因。奥运会组委会已将咖啡因与类固醇同样列为违法药物。1993 年，一位欧洲蛙泳选手被测出她体内的咖啡因量相当于六杯咖啡时，她的冠军资格就被剥夺了⁴。最近五年，为了帮助咖啡因成瘾者戒掉咖啡因，一个十二步骤疗程的“咖啡因匿名会”（Caffeine Anonymous）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成立。

有人在网络上写着：“当时，我们一堆人站在星巴克里面大排长龙，大家都不耐烦地说：‘快点，快点啦！为什么那么慢！?’我们简直跟海洛因毒瘾者一样。”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有一篇报道说，每年大约有 5000 名美国人由于咖啡因过量而死亡，这项数字相当于因为毒品而死亡的人数。另外，由于酒精中毒而死亡的，每年大约有 125000 人（不包括车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因为吸食大麻而死亡的还没有过。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于 1994 年发现，咖啡因算是可以令人上瘾的一种药物，所以现在他们将咖啡因与有咖啡因的物质归类为如同海洛因与尼古丁的违禁品。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手册写着：“假如饮用过量，咖啡因也可以导致人体的反弹……在医学上，人体会开始对咖啡因产生依赖性。”根据该协会的研究，饮用咖啡的人当中，有 94% 的人患有“咖啡因依赖症候群”。症状包括无法控

制的坏脾气、呕吐、疲惫、疑心病，甚至会产生以为自己是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的妄想症。

当我们开车经过阿肯色州的小岩城时，我看到一篇有趣的回复，上面写着：“喝了一天的咖啡后，我躺在床上，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是一台计算机调制解调器，这是真的，我没有开玩笑。当时我躺在床上，集中精神接收所有的来电，然后正确地传送出去。那些咖啡因简直搞乱了我的头脑。”

“咖啡因是一种精神刺激药物，所以这位仁兄会以为自己是一台计算机调制解调器其实并不夸张。”一位人士响应以上讯息，“我已经受够了那些喝咖啡像在喝水的人了。”

这些对于美国的五角大楼来说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美国于 1832 年早已为了战争，开始利用咖啡因来促进暴力行为：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以咖啡（每 100 位士兵就有六磅的咖啡）替代酒，这项改变使得支持联邦政府的士兵成为南北战争时的第一批咖啡因武士，就跟埃塞俄比亚的奥罗摩武士一样。根据一项军事文献的记载，士兵靠着象征“在密苏里河饮酒作乐”的咖啡，振奋了作战的精神。当他们对咖啡的依赖性更强，而作战粮食被减半的时候，他们更需要以两倍的咖啡来代替粮食的不足。而南方因为禁止对外通商，没有咖啡来提振作战精神，最后遭致失败。⁵

美国南北战争证明了咖啡可以增进士兵的体能，但是让五角大楼更感兴趣的是，咖啡因会让人的精神产生变化。克罗瑟（J.D. Crother）在 1902 年的一次实验当中就曾写道：“在某些例子中，有些人会出现极度自大的幻觉……而且通常是鲁莽又狂妄。南北战争中，有一位表现突出的上将喝了几杯咖啡后，在前线表现得格外英勇无惧。大家都认为他一定是喝了酒或是被下了什么毒，结果他们发现他只不过是喝了几杯咖啡。”咖啡可以说是将军梦想中的药物——喝了几杯之后，士兵们便会不顾危险地勇敢向前冲。这种认知后来在一次军事研究当中被证实会产生“咖啡因出血性的自虐”反应，意思是说，咖啡因可以让老鼠产生过度的攻击性，最后甚至会把自己给咬死。

美国一个军事机构所发行的一本军方文献《军队咖啡》（Coffee for the Armed Forces）中曾经提到，早在 19 世纪，军方就已经开始研制一种“军事专用”的咖啡，包括三个必备条件，那就是重量轻、持久性及易消化。最初研制出来的是一种高密度的浓缩块状萃取饼，而美国国会也

立即于 1862年授权军方使用。

这种块状咖啡很适合军方，因为它不需要包装，也不需要煮，只需与水搅拌即可得到该有的“心理作用”。简单地说，军人只要用他的口水就可以“喝”到咖啡了，就跟咀嚼烟草一样，同样可以得到抽烟的效果。根据军方资料，每半盎司的咖啡饼“与口水混合后所得到的效果就如同半品脱的咖啡”。

如果这种咖啡的做法听起来很熟悉，那是正常的。这可以算是全世界第一种冲泡式的速溶咖啡，原先是为了军事用途，最后却成为美国近几十年来重要的咖啡文化⁶。

这种“咀嚼咖啡”的方式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也跟着消失了。军方继续研制他们所要的咖啡，采取当年鲍德温船长（Captain Baldwin）用于北极圈探险时的咖啡样式，于 1903年研发出粉末状的“军事上成功”的咖啡，实际运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每个月计有 15家工厂生产 600万磅的咖啡。整个军方的消耗量暴增 3000%，足足增加了 30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有 125处咖啡种植地以及 22个家庭式的咖啡种植场积极为军方兄弟生产。

当时军方平均每人每天饮用的量增加了三倍，达到两盎司（约六杯特浓的咖啡）。就连伞兵跳伞时也随身携带小包的咖啡，这些小包的咖啡之后被“358大酒瓶”（358 Magnum）胶囊所取代，每个胶囊里面装有 300毫克的纯咖啡因⁷。

战争结束后，一些美国空军的长官曾经举办过一次蒙眼品尝会，品尝几种混合式咖啡，试图找出非战场上使用的、最强烈而且危险性也最高的咖啡。大家品尝之后，意见不一，这些神秘的混合式咖啡样品至今仍被列为机密。到了 1999年，美国政府拨了 25万美元给军方，要他们研发改良式含咖啡因的口香糖新产品。

不同于南北战争的“咀嚼咖啡”，速溶咖啡并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跟着消失。数百万名士兵与护士带回了普鲁斯特式（Proustian）的思想，将咖啡的滋味与他们人生最深刻的体验融合一起。

战后咖啡的内销量大增，到了 1958年，美国国内大约有 1/3的咖啡都是速溶的。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越南战争开始的时候，当时的军人只能喝到最苦、最难喝的“品尝家精选咖啡”（Taster's Choice）的渣滓。接下来

就是咖啡革命的舞台，就在战争结束的前两年，星巴克咖啡公司刚好开始了第一家咖啡馆的运营。

1 英国人为了使中国人对鸦片上瘾，举兵入侵中国而导致“鸦片战争”。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到处充满鸦片毒瘾者的国家，为了巩固自己毒品来源而与其他国发生战争。因为战争的关系，茶叶来源中断了一阵子，有人试着改用埃塞俄比亚的卡提代替茶叶，不过推销到市场上时却失败了。斯滕豪斯博士（Dr. Stenhouse）将它推销给英国中下阶级，形容它是“可以接受的饮料，一磅才卖 12 分钱”；根据《伦敦评论》（London Critic）的报导，最后失败的原因是“斯滕豪斯对于化学的知识甚多，但他不清楚人类的习性，不然不会将卡提介绍给中下阶级，而应该介绍给上流社会”。若如此，卡提就会从上层阶级扩展到中下阶级，最后一定会成功。

2 金色凯迪拉克是来自亚拉巴马州监狱的俚语，意思是“一杯加了牛奶与糖的咖啡”。

3 这只不讨人喜爱的咖啡壶在 1991 年——早在全球信息系统之前就出现在网络上。此壶属于剑桥计算机黑客，会在偏僻的计算机室的计算机屏幕上出现，告诉计算机前面的人有刚煮好的咖啡。今天被称为“特洛伊咖啡壶”的咖啡壶，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咖啡壶，网络上有成千上万的人看过。虽然它在网络上受欢迎，但实际上咖啡质量很差。

4 研究显示，全世界人口中有 75% 只要喝两杯浓烈的咖啡就可以增强体力。

5 美国联邦政府曾经企图以美国原住民传统的一种咖啡因饮料东青（dahoon）来弥补咖啡产量的不足，可是效果不佳。根据历史学家拉尔夫·霍特（Ralph Holt）的记载，冬青取自于卡西纳（cassina，一种植物），美国南部原住民习惯制作这种咖啡因饮料，给为荣誉而战的英勇

战士与首领享用，也有人用此种植物制酒。

6 这里是指“乔之咖啡”（Cup of Joe）。据说海军参谋总长约瑟夫斯·乔·丹尼尔斯（Josephus“Joe”Daniels）不但严禁海军舰艇上有酒，还严禁卖酒给穿制服的士兵（他也停止发放免费保险套）。他使咖啡成为美国海军的正式饮料，所以“乔之咖啡”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不过也有其他说法，例如 Joe 源自 mocha-java，后来演变成 mo-jo，最后才变成 Joe。

7 空军为了保持机动力，为晚间飞行的飞行员补充大量维生素 A（可强化眼力），也提供维生素 B，因为维生素 B 可以使人对声音的感觉变得迟钝，这样比较不容易被战争时所发生的巨响吓到。

17 尾声

睡眠，是不适当的咖啡因替代品。

——英国一位咖啡爱好者

在这趟旅行之前，我们已经用心在俄克拉荷马州进行了严肃的研究。为了不想“折磨”你们，我们经历的过程就不再详述，就像我们跑过无数次的 Stucky's 与 Cracker Barrel 咖啡馆，还有 Pojo's、Hardee's 和 Denny's 等美国西餐厅，都是毫无特色、服务态度冷漠的快餐连锁店。这些没有特色的连锁店正如充满脓汁的溃疡爆发一样，分布在全美各地，渗出淡而无味、苦涩、毫无价值的咖啡。

有一位男士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你已经陷入咖啡地狱！”可是我认为他大可把咖啡这个词删掉。我们的旅途越过闷热无趣的平原，途中偶尔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各类破旧的活动后挂式房车停靠在路旁，随着它们古老的空调机一起震动。没错，我们的确到了贫穷白人的领土，在这里，梅太德林（methedrine）是大多数人在早上选择唤醒自己的迷幻药。

如果你们对我使用“贫穷白人”一词有不满的地方，希望你们知道我是有资格用这个词汇的，因为我（在美国）流着“贫穷白人”的血液，我的家族出身包括三代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非法买卖酒类者、脱衣舞娘，还有支票伪造者。

梅格，一个土生土长的曼哈顿人，认为这一切都非常浪漫。“你知道吗，我还蛮喜欢这里的。”她一直不停地重复，“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美国。我确信这些人一定都是非常亲切甜美的美国人。”

我说：“他们每个人都像是一个香甜的杯形蛋糕。”

后来，我们在距离高速公路几英里的一家旅馆过夜，我搞不清楚正确的

地点在哪里，但我记得那是一家叫作“西沙”（Western Sands）的旅馆，一间拥有一个铺满碎石的停车场，外形呈“L”的汽车旅馆。当我走向房间登记处的时候，我的脚底下好像踩扁了数百只半清醒的蝗虫。

“每间房间 30 美元，不过不要期望像假日饭店一样舒适。”坐在柜台前的男子说。他好像只穿着内裤而已，又将手伸进裤子里抓了一下，接着又说：“我算你 25 美元就好。”

我还没要求打折就这么便宜了，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一下，因为西沙似乎缺少了什么。小小的大厅里到处是烟头，地上、柜台上或是沙发上都是，像落叶一样被秋风吹得散落各处。地毯上全都是百威啤酒罐与牛奶盒，地毯也被烧出了一个个洞。

柜台的接待员在桌上的一堆垃圾里面找了半天。“对不起，我找不到住宿登记本。我发誓，我真的好累喔！你知道吗？当你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只是熟睡而已，而是整个人都倒下来了。”

“倒下来？”

“对，百分之百，精神都涣散了。可是我不可以这样，你知道吗？”

“不能怎样？”我问他。

“当然是不能倒在那里啰！”

我看他越讲越兴奋，建议他：“如果你喝一些咖啡，可能会好些。”

他露出牙齿，回我一个怀着阴谋的笑容说：“我不喝那东西。我的胃最近很敏感，我只能吃玉米片加牛奶。”

他牙齿的颜色像上了亮光漆的木头，他一定是海洛因的成瘾者，一种贫穷白人常用的可卡因。难怪他会喜欢玉米麦片加牛奶（可以让胃舒服些），也难怪他的谈话经常前后不连贯。

“我找到了！我可以给你们 18 号的房间。”他突然惊讶地挑起眉毛说，“我想这个房间好像才清理没多久。”

“嗨！你们两个男生在干什么？”原来是梅格。她快速往房里看了一眼，看起来一副很惊讶的样子。幸好她曾经到亚洲旅游，还能接受这样的房

间。“你在帮我们订房间呀？”梅格接着问。

男子说：“是啊，只要你不是想要什么特别的服务或装潢。就像我所说的，这里不是什么假日饭店……”

“哦，当然不是，这已经可以了啦！我只需要一个地方睡觉而已。”梅格大声地说，她似乎已经开始有得克萨斯州的口音。

“床单是干净的，至少我记得是如此。”他喃喃地说，“还有 HBO 和有线电视节目，不过我已经没有遥控器了。我曾经买了一打遥控器，可是不到一星期就不见了。”

他带我们走出去，光着脚走在蝗虫上面。他只穿一件低腰的长运动裤，而且低到……好了，不理他。

“你们两个结婚了吗？”他问。

“是的！”梅格回答。

他看了梅格一下又问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戴戒指？”

“掉到厨房的厨余碾碎机里去了。”她说。

“真要命！可惜我的朋友没在那里，不然的话他可以从厨余碾碎机里取回任何东西。”他摸索着一把钥匙，然后又问，“你们两枚戒指都掉到厨余碾碎机里去了吗？”

“他的是掉进马桶。”

“真糟糕，你们最好不要有东西掉进这里的马桶。”他喃喃着说，最后他放弃寻找钥匙，干脆用脚把门踢开，“我不希望有任何东西塞在马桶里。不准掉。好了，你们可以进去了。就像我说过的一样，这里并不豪华，不像……”

“不像假日酒店。”我接上他的话，然后问，“这门没有锁吗？”

“没有。”门把上有凹进去的痕迹，看起来像是被踢进去的。

“只要在门后放一张椅子就可以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房间里铺着深暗木头颜色的塑料地板，刚好有两张床，还有一台用铁链锁在墙上的电视。至少床单是干净的。我们躺下来享受冷气，梅格看了一部约翰·特拉沃尔塔主演的惊悚片，而我继续使用电脑，看到一篇可能是作者服用咖啡因过量后写出来的文章。

“‘Water Joe’（咖啡因水）是好货，我用它来做浓缩咖啡，然后放进一颗咖啡因片剂（vivarin，含有很强咖啡因的一种药）使它溶化，而不是放入方糖或柠檬皮，这样就会变得很好喝。可是几分钟过后，我的背部开始疼痛，接着又会想要尿尿，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吗？我从来没有吃过咖啡因药片，因为可能会烫伤或堵住我的鼻子……我到底把那瓶浓可乐（Jolt Cola，比一般可乐的咖啡因还要多出很多的可乐饮料）放到哪儿去了……我的狗儿一直在舔我的腿……”

这篇文章就这样持续了六页，这就是所谓网络咖啡瘾者的废话。我因为抽搐而睡不着觉，于是梅格跟我到附近一家红狗酒吧喝啤酒。酒吧里只有一位中年妇女和几个看起来肮脏的男子，那些男子都戴着卡车司机的帽子，口中一直念着种族歧视的词语。我们点了一罐百威啤酒，因为也没什么选择。那位中年妇女正在对酒保抱怨她房子的问题。

“我先生很想从我爸妈的拖车里搬出去住，只是，他要找到一个可以钓鱼的地方才会搬。”她说。

“这可以理解，一定要先找到适当的地点才能搬。”酒保说。

“当然，孩子也会喜欢搬出去住。”

孩子？她与父母亲、先生，以及孩子们都住在一辆拖车里？梅格与我把啤酒喝完打算离开，因为这里实在太令人沮丧了。这位妇女家人很多，她却半夜一个人独自坐在酒吧喝酒。酒保叫我们要小心在停车场的人，原来他们就是那几个有种族歧视的白人，或许正在做毒品交易。

我们走回车上时，一个男子对我们大叫：“你们赶着要去哪里呀？我们都是很好的人，请你们进来再坐一会儿吧。”

我们喃喃地说已经开一整天车了，很累了。我们并没有提到我们的雅利安族会员卡过期了。

“你们住在哪一家旅馆呢？”

我想到我们住的房间有个没锁的门，所以就随便骗他说：“哦，是白色旅馆。”

“我没听说过有那家旅馆。我跟我的朋友都欢迎你们住到我们家，就往这条路一直开下去就到了。”他指着一条没有路灯的小路。

我们小声地谢绝了。不过他还是向我们这里走过来，他的朋友也从卡车上下来。

“下次吧，晚安。”我跳上车。

“好吧，或许我们会再碰面。”他说。

我们开车回旅馆的途中，梅格说：“他人好像蛮好的。你觉得他可以当我的新男友吗？”

○

有一个事实是，美国要到第一次在主要战役中落败后，才学会做一杯像样的咖啡，这是撰写咖啡文明史的很好的历史材料（我们不用提到乔菲的“咖啡扩张论”）。很不幸的是，它却被普遍认为是 20 世纪 60 年代抗议过度加工食品的事件之一。大家都认为全麦面包等于全豆咖啡。所以，一项特殊的咖啡运动在反传统文化之都的加州柏克莱发起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当时有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皮特（Alfred Peet）的绅士开了一家皮特之茶与咖啡咖啡馆（Peet's Tea and Coffee）。而这家咖啡馆就专门烘焙新鲜的黑咖啡，生意好到连他的商业伙伴也都纷纷到外面开店，譬如波士顿的联合咖啡（Boston's Coffee Connection）、佛罗里达的巴尼咖啡（Florida's Barney），当然也有西雅图的星巴克咖啡（Seattle's Starbucks），这些都是促成今天每年约 6 兆美元咖啡市场的功臣。

这个食物链的最上面一层就是无所不在的星巴克咖啡，现在星巴克商标上的美人鱼经常是笑话的话题：这个美人鱼就是星巴克商标上的美人鱼，而星巴克就是《白鲸记》里的大副。甚至有些网站是专门用来批评星巴克的。我不同意这些负面的看法，虽然星巴克咖啡是一家超大型企业，导致许多其他小型企业倒闭，但这就是大型企业的必然之道。重要的是它们制作的咖啡很好喝，而星巴克咖啡的店员通常也都是一流的

（我说这句话是装着鬼脸的，表示我的身体并不完全认同）。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我现在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荒野上看到一家星巴克，一定会喜极而泣，就如同几千年前的夏狄利发现咖啡豆时一样欣喜。

不管怎么说，一直到目前为止，在我们探寻的咖啡里，星巴克咖啡仍然不是我们要寻找的对象，因为它不再能制作好喝的美式咖啡，就像意大利歌剧家威尔第无法写出蓝调歌曲一样。星巴克制作的咖啡全都是运用浓缩咖啡与卡布奇诺等意大利式的方法，与美国式的传统烹煮咖啡的技巧完全不同。而这个结果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1887 年的一本非常普及而热门的《白宫食谱》（*White House Cookbook*）。在这本食谱里，收集了许多总统级的食谱，这本书的前言写着：“本书介绍的烹饪方法都是当今完美厨艺的代表作。”

在几百条食谱当中（包括松鼠汤在内），有一条对美国咖啡影响最深远食谱是：

〔烹煮咖啡〕

1. 将一杯磨好的咖啡豆与一颗蛋及部分蛋壳混合，加入半杯冷水。
2. 然后放入咖啡锅炉里，再加入一夸脱沸水（约 0.946 公升）。
3. 即将煮沸时，用银汤匙或叉子搅拌，然后继续煮沸 10~12 分钟。
4. 接着把火关掉，倒出一杯咖啡，然后倒回咖啡壶。不要再煮沸，让它保温 5 分钟，接着就可以送上桌，趁热饮用。

这是煮咖啡的坟墓，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咖啡豆可以承受这种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的恶劣做法，不管是高贵如牙买加的蓝山咖啡豆还是陈年的苏门答腊咖啡豆都一样。如果做法正确，它会煮成一种可怕的咖啡，这种咖啡就像得克萨斯州大草原一样，也就是我们现在开车正通过的大草原。

当我们越过俄克拉荷马州与得克萨斯州边界时，一位朋友在网络上留言：“孩子们，不用担心，你们会找到想要找的东西。那是一个盛产黄金咖啡壶的地区。当你们驶近普夫卢格维尔（*Pflugerville*）的时候，不

妨寻找一间达特咖啡馆（Dot's Café），试试它们的咖啡。我了解你的意思，虽然现在的卡车休息站所卖的咖啡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不过，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普夫卢格维尔到底躲在哪里，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一直开在 66号公路上，方便一路开到洛杉矶。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找不到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一直到我们开到大草原上的一条六车道的 I-40公路，才隐约发现一旁有一条两个车道，铺着柏油的小公路，好像一个小弟弟想跟大哥哥玩而一直跟在旁边。

原来那条 66号小公路因为新的 I-40高速公路的兴建而没有画在地图上。那条 66号公路是 50年前大萧条时代许多美国人为了找工作而往西部移动时的路线，路上的许多小镇，如阿马里洛、麦克林、杰利科、康威等，都是当年的小型休息站，大家都会在休息站加油或喝咖啡。今天，这里不过是一条长达 1000英里的鬼域，一路上散布着许多已荒废的加油站与封闭的咖啡馆。

星期六我们开了一整天，一路上的风景都是一样，到了星期天早晨，我们看到一间已经关闭的旅馆上方，有一个褪色的蓝色广告牌，上面写着：“阿德里安咖啡馆”（Adrien's Coffeeshop）。我们于是开下主要干道，看看那间咖啡馆是否有开业，接着又看到一个手写的指示牌，上面写着：“欢迎来到阿德里安！你现在位于 66号公路上，刚好在芝加哥与洛杉矶的正中间！欢迎光临！”

我们进入这家咖啡馆，店里的装饰是一个牛的骷髅头与“耶稣爱你”的车牌，洗手间外面设有一道屏风。我们点了咖啡，后来发现这是第一家纯美式的咖啡，不但黑色、浓稠，而且味道强烈。服务生用派热克斯玻璃咖啡壶倒咖啡给我们，味道强烈到让我们难以招架。真是难喝无比。

舌头一阵颤抖之后，我开口说：“其实没那么糟。”

“是最棒的！”梅格说。

教会活动刚刚结束，当地居民陆陆续续走进咖啡馆，女生穿着花裙，男生则戴着大牛仔帽。连牧师也来凑热闹。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年人与他二十几岁的胖儿子一起走进来，他们两人都穿着三件式的西装，脸上带着很愉快的笑容，看起来一副要竞选总统的样子。甜美的服务小姐端上牛排与薯条，让我们大快朵颐。甜点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黑莓水果派，刚烤好，上面还放着一球香草冰淇淋，简直是天赐的甘露。

“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派。”梅格说。于是我们又点了一份派。“你不觉得这是最棒的地方吗？”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吧！不过我还是同意了：“的确不错。”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梅格恳求着说，“我们不要再找了好不好？拜托！”

梅格的精神看起来并不是很好。我们每天大约喝 12 杯黑咖啡，再加上大量的麻黄素（**ephedrine**）——一种卡车司机常用的合法安非他命。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其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将含有咖啡因的麻黄素列为违禁药物，因为它们会让人产生一些症状，如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妄想，以及忧郁沮丧¹。而这些症状正是我们两人已经开始发作的症状。我的眼球甚至已经开始抽搐、跳动，就像原子动力潜水艇上的官兵常见的症状，因为他们都是咖啡因狂。我也发现，梅格微突的蓝色眼睛比平常还要更突出，好像快要爆出头颅似的。

“好吧，这正是我们要找的美国最好的咖啡！”我说。

“你是说美国最难喝的，对吧？”

“是最糟的咖啡里面最好的一种，这样就够好了。”我说。

到过阿德里安咖啡馆之后，我们对得克萨斯州就更了解了。车内收音机播放的基督教诗歌，听起来就像我们车内的冷气一样没有什么用处。得克萨斯州人可以穿紧身的牛仔裤，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轻松自在地过着和平的日子。美国，阿门。我开车时精神不是很好，只差那么几英寸就擦撞到一辆载满小孩的旅游车。不过他们并没有生气，因为他们是得克萨斯州人。当他们把车子开到靠近我们的车旁时，他们还向我们表示耶稣爱世人，而他们那怪异的笑容似乎是在感谢我们差一点就送他们上天堂。

“我知道我很适合住在这里，我可以后半辈子都待在这里。我想我已经爱上得克萨斯州了，或许我的上辈子就是一个女牛仔。”梅格不断重复地说着。

我跟她说，在天气好的夜晚，牛仔会将他们的卡车车头往内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打开大灯，接着将所有卡车的收音机频道全都调到同一个

音乐电台，再一起跳舞。

梅格听完我说的话后，好像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了。“你可不可以直接就让我在下一个镇下车呢？”她半开玩笑地问道。我们从阿德里安咖啡馆开往新墨西哥州的陶斯（Taos），原来的草原开始慢慢变成红岩的峭壁，空气也越来越干燥了。当阿德里安咖啡馆带给我们的幸福感慢慢消失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刚刚的感受。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着同样的餐厅、同样的建筑物，还有同样的食物，就算是来自美国东部的新鲜冷冻的食品，同样可以运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加热，以原味提供给客人享用，这就是美式做法。你可以在某个荒郊野外买一块地，然后将它规划成许多商店，把它们清理得非常干净，不但一尘不染，而且没有异味，不需要有什么特色，只要把它放在那里。等过一阵子，当你将这个地区的竞争对手都干掉后，就可以开始涨房租了。但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因为只要我一踩油门，窗外的景色就立刻变换；如果我在计算机键盘上按个钮，计算机屏幕也会立刻跳动，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篇新的文章。

我们到了亚利桑那州时，看到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写着：“咖啡因让我更接近我的神，不过他现在开始离我越来越远了。咖啡豆我越加越多，现在已经加到饱和的程度，无法溶解了。我需要纯咖啡因，请救救我！”

○

开车经过荒凉的纳瓦霍（Navajo）印第安保护区时，我猜想每一个年代咖啡豆的用途都是因人们对现实的认知而使用。埃塞俄比亚与中东最早的咖啡宗教认为咖啡是通往神的窗口，18世纪的欧洲人权主义者更是以咖啡制造一个理性的社会。而重视效率及速度的美国人，只是利用咖啡来提神，到更多地方做更多事，没有顾虑它的后果。

剩下来的旅程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片模糊。我记得我跟梅格凌晨三点还在一家幽暗的饼干咖啡馆内笑服务生不帮我们续杯，当时我们两人是仅有的顾客。我还记得拉斯维加斯的马戏团吃到饱餐厅里其臭无比的咖啡，还有隔壁桌一位女士一边哭一边计算她输掉的钱，也记得一路上有一堆丑陋、愚蠢、贪心的人，以及来自老挝的发牌者赖瑞。还有更多的麻黄素、更多的咖啡与酒，而梅格总是坐在一旁，不是唱歌唱到走音，就是爆笑笑到发抖。现在轮到她坐在驾驶座上，跟随我们在公路上行驶的还有几百辆车。

我们在前往洛杉矶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终于到了西岸！可是梅格无法停止发笑，她已经笑到无法掌握方向盘了，于是她把车速放慢，最后干脆停在高速公路上，其他洛杉矶的开车族都像蝗虫一样，快速地从我们的车旁绕过去，而且愤怒地大声吼着，作势挥拳，用力猛按喇叭，似乎在抗议我们竟然敢把车子放慢！不准慢下来！快走！快！快！快！可是，此时梅格哪儿也去不成了，因为她已经失神了。她露齿大笑，笑得眼泪直流，勉强缩着嘴唇，像极了一只生气的狗儿。

1 来自也门的老朋友卡特草与麻黄素有密切关系，两者都含有活性化学成分，也都会产生类似的副作用。美国地下毒品市场有一种称为 meta-qat 的新型毒品，俗称 Jeff、Mulva 或 Cat。

致谢

谢谢，danke（德语），merci（法语），asante sana（非洲语）！

以下是我要感谢的人：我的太太妮娜（如果她愿意跟我结婚的话）、塔尼娅·拉塔兹（因为她拒绝与我结婚）。

我还要感谢我的哥哥特洛伊与他的太太保拉，因为他们让我借宿三个月，也要感谢汤姆没有把我赶出家门（虽然他有权利可以这么做）。谢谢编辑茱莉·游耶维克，她给我简洁有力的意见（啊！真是一个细心的专业人）。感谢我的经纪人费利西亚·艾斯对我一直很有信心。

谢谢杰夫提供我很多信息。感谢安娜贝尔·本特利永远那么慷慨大方。还要特别谢谢哈拉的埃布尔拉，以及我在也门时碰上的也门人（我永远不知道怎么念他们的名字），当然还有杨吉杰出的骗人技术。谢谢约瑟夫·乔菲敏锐的洞察力，还有我在旅途上碰到过的上百万讨厌鬼，当然还要感谢网络上大量网友为咖啡与咖啡因提供很多宝贵数据，不管正确或不正确，这些数据都可以使人惊奇好几个世纪。

特别感谢位于瑞士苏黎士的约翰·雅各布博物馆（Johann Jacobs Museum）、伦敦布拉默茶与咖啡博物馆（Bramah Tea and Coffee Museum）、凯瑟琳·柯特罗（Catherine Cotelle）的档案数据库、大英博物馆亚洲部门、法国国家图书馆、纽约研究图书馆、加州大学的图书馆、伯克利学院图书馆、洛杉矶大学图书馆、亚的斯亚贝巴市立图书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图书馆、也门萨那的无名图书馆、伦敦市政厅图书馆、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旧金山与洛杉矶的市立图书馆等，或许还有一些其他的图书馆。总之，谢谢大家。